

# 读书

# 1

---

读书无禁区 (李洪林)

---

马克思恩格斯的书评 (仲民)

---

略论大仲马的《基度山伯爵》

(张英伦)

---

科学和民主的赞歌 (郑文光)

---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琐谈

(王蒙)

---

在汽笛的长鸣声中 (艾青)

---

彭德怀 (斯诺)(董乐山译)

---

1979

DUSHU

# 读书

---

2 读书无禁区 李洪林

8 〔笔谈〕解放“内部书”(雨辰 8)——制止“侵吞”(辛山 8)  
——海关这一关(黄仑 10)——借书难(黄克 10)

---

12 马克思恩格斯写的书评 仲 民

14 作家与书评(纽约航讯) 董鼎山

---

20 探索现代化的中国风格 张慈中 于 麟

---

25 解放思想·突破禁区 卞 哲

中国近代史著作中的问题漫谈之一

31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应当改革 子 起

35 怎样正确理解生产关系 吴学灿

---

39 读马雅可夫斯基《列宁》诗的断想 良 化

41 略论大仲马的《基度山伯爵》 张英伦

50 《报》 杨静远

57 林肯这个人 邓蜀生

63 克劳塞维茨和他的《战争论》 吴艾军

67 科学和民主的赞歌 郑文光

---

73 “控诉文学”及其他 林大中

---

77 书讯

---



1979 1

四月出版

---

81	漫谈鲁迅研究	荒 芜
84	“幽岩”质疑	陈 江
87	鲁迅和章锡琛	振 甫

---

89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琐谈	王 蒙
93	在汽笛的长鸣声中	艾 青

---

109	《天平之薨》重译记	楼适夷
-----	-----------	-----

---

112	1978年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艾萨克·辛格	梅绍武
113	卡静论辛格(西书随笔)	冯亦代
119	人类总会走向大同	苏叔阳

---

123	《论新型的社会主义民主》(书摘) 卡德尔(金作善节述)	
130	彭德怀(《西行漫记》选录)	斯诺(董乐山译)
135	胡愈之谈《西行漫记》中译本翻译出版情况	
143	埃德加·斯诺作品介绍	裘克安
148	一个奴才的成长(书摘) 亨利希·曼(傅惟慈节述)	

---

153	文史工具书及其用法(一)	武 雷
-----	--------------	-----

---

152	编者的话	
-----	------	--

---

159	一九七九年新书部分目录	
-----	-------------	--

---

封面设计 丁聪

# 读书无禁区

李洪林

在林彪和“四人帮”横行的十年间，书的命运和一些人的命运一样，都经历了一场浩劫。

这个期间，几乎所有的书籍，一下子都成为非法的东西，从书店里失踪了。很多藏书的人家，象窝藏土匪的人家一样，被人破门而入，进行搜查。主人历年辛辛苦苦收藏的图书，就象逃犯一样，被搜出来，拉走了。

这个期间，几乎所有的图书馆，都成了书的监狱。能够“开放”的，是有数的几本。其余，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从莎士比亚到托尔斯泰，通通成了囚犯。谁要看一本被封存的书，真比探监还难。

书籍被封存起来，命运确实是好的，因为它被保存下来了。最糟糕的是在一片火海当中被烧个精光。后来发现，烧书毕竟比较落后，烧完了灰飞烟灭。不如送去造纸，造出纸来又可以印书。这就象把铁锅砸碎了去炼铁一样，既增加了铁的产量，又可以铸出许多同样的铁锅。而且“煮书造纸”比“砸锅炼铁”还要高明。“砸锅炼铁”所铸的锅，仍然是被砸之前的锅，是简单的循环；而“煮书造纸”所印的好多书，则是林彪、陈伯达、“四人帮”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以及他们的顾问等等大“左派”的“最最革命”的新书。这是一些足以使人们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新书，其“伟大”意义远远超出铁锅之上。于是落后的“焚书”就被先进的“煮书”所代替了。

如果此时有人来到我们的国度，对这些现象感到惊奇，“四

人帮”就会告诉他说：这是对文化实行“全面专政”。你感到惊讶吗？那也难怪。这些事情都是史无前例的。

是的，对文化如此摧残，确实是史无前例的。

两千多年前，秦始皇烧过书。他烧了多少？没有统计。不过那时的书是竹简，写在竹片上的，按重量说大概很不少，但是从种类和篇幅说，肯定比不上林彪和“四人帮”对书籍这一次“革命”的战果如此辉煌。

烧的烧了，煮的煮了。剩下一些劫后余生的书籍怎么办呢？大部分禁锢，小部分开放。

在“四人帮”对文化实行“全面专政”的时候，到底禁锢了多少图书，已经无法计算。但是可以从反面看出一个大概。当时有一个《开放图书目录》，出了两期，一共刊载文科书目一千多种。这就是说，除了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书籍之外，我国几千年来所积累的至少数十万种图书，能够蒙受“开放”之恩的，只有一千多种！

除了秦始皇烧书之外，我国历史上清朝是实行禁书政策最厉害的朝代。有一个统计说清代禁书至少有二千四百余种。蒋介石也实行禁书政策，他查禁的书不会少于清朝。但是，和林彪、“四人帮”的禁书政策相比，从秦始皇到蒋介石，全都黯然失色。理工农医书籍除外（这类书，秦始皇也不烧的），清朝和国民党政府查禁的书，充其量不过几千种，而“四人帮”开放的书，最多也不过几千种，这差别是多么巨大！

在“四人帮”横行的时期，凝集着人类文化的各种各样的图书，绝大部分终年禁锢在寒冷的库房里，只能和樟脑作伴。如果图书都会呼喊的话，当人们打开书库大门的时候，将要听到多么可怕的怒吼啊！

历史是公正的。对人和书实行“全面专政”的“四人帮”，被愤怒的中国人民埋葬了。在中国的土地上，春天又来临了。被禁锢

的图书，开始见到阳光。到了一九七八年春夏之交，一个不寻常的现象发生了。门庭冷落的书店，一下子压倒美味食品和时式服装的店铺，成了最繁荣的市场。顾客的队伍从店内排到店外，排到交叉路口，又折入另一条街道。从《东周列国志》到《青春之歌》，从《悲惨世界》到《安娜·卡列尼娜》，几十种古今中外文学名著被解放，重新和读者见面了。那长长的队伍，就是欢迎这些精神食粮的行列。

这件事也引起外国客人的注意。通过重印世界文学名著和学术名著，更重要的是通过我们在文化、教育、科学、艺术各个方面拨乱反正的实践，外国朋友们看出来：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共产党已经决心领导中国人民回到世界文明的大道，要把人类已经获得的全部文化成就，作为自己的起点，用空前的同时也是现实的高速度，实现四个现代化。

象极度干渴的人需要泉水那样，一九七八年重印的一批名著，瞬息间就被读者抢光了。经过十年的禁锢，中国人民多么渴望看到各种各样的好书呀！

但是，书的禁区还没有完全打开。因为有一个原则性的是非还没有弄清楚，“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的流毒还在作怪，我们一些同志也还心有余悸。

这个原则问题就是：人民有没有读书的自由？

把书店和图书馆的书封存起来，到别人家里去查抄图书，在海关和邮局检扣图书，以及随便把书放到火里去烧，放到水里去煮，所有这些行动，显然有一个法律上的前提：人民没有看书的自由。什么书是可看的，什么书是不可看的，以及推而广之，什么戏是可看的，什么电影是可看的，什么音乐是可听的，诸如此类等等，人民自己是无权选择的。

我们并没有制定过限制人民读书自由的法律。相反，我们的宪法规定人民有言论出版自由，有从事文化活动的自由。读书总

算是文化活动吧。当然，林彪和“四人帮”是不管这些的。什么民主！什么法制！通通“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这些封建法西斯匪徒的原则很明确，他们要在各个文化领域实行“全面专政”，人民当然没有一点自由。问题是我们有些同志对这个问题也不是很清楚。他们主观上不一定要对谁实行“全面专政”，而是认为群众都是“阿斗”，应当由自己这个“诸葛亮”来替人民做出决定：什么书应该看，什么书不应该看。因为书籍里面，有香花也有毒草，有精华也有糟粕。人民自己随便去看，中了毒怎么办？

其实，有些“诸葛亮”的判别能力，真是天晓得！比如，《莎士比亚全集》就被没收过，小仲马的名著《茶花女》还被送到公安局，你相信吗？如果让这种“诸葛亮”来当人民的“文化保姆”，大家还能有多少书看？究竟什么是香花，什么是毒草？应当怎样对待毒草？这些年让“四人帮”搅得也是相当乱。例如，《瞿秋白文集》本来是香花，收集的都是作者过去已经发表过的作品，在社会上起过革命的作用，是中国人民宝贵的文化遗产，这已成为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是，后来据说作者有些什么问题，于是，这部文集就成了毒草。谁规定的呢？没有谁规定《瞿秋白文集》应当变成毒草，而是“四人帮”的流毒，使人把它当作禁书。

文学书籍，被弄得更乱。很多优秀作品，多少涉及一些爱情之类的描写，便是“毒草”，便是“封、资、修”。便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四人帮”这一套假道学，到现在也还在束缚着一些人的头脑，因为它道貌岸然，“左”得可怕。以致有人象害怕魔鬼那样害怕古今中外著名的文学著作。本来在社会生活中，“饮食男女”是回避不开的客观现实。在书籍里面，涉及社会生活的这个方面，也是完全正常的现象，许多不朽的名著都在所难免。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即使其中有不健康的因素，也要看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什么。不要因噎废食，不要“八公山上，草木皆兵”，把很多香花都看作毒草。

对于包含香花和毒草在内的各种图书，应当采取什么政策？

任何社会，都没有绝对的读书自由。自由总以一定的限制为前提，正如在马路上驾驶车辆的自由是以遵守交通规则为前提一样。就是在所谓西方自由世界，也不能容许败坏起码公共道德的黄色书籍自由传播，正如它不能容许自由抢劫、自由凶杀或自由强奸一样。因为这种“自由”，势必威胁到资本主义社会本身。任何社会，对于危及本身生存的因素，都不能熟视无睹。无产阶级的文化政策，当然更不会放任自流。

不过一般地讲，把“禁书”作为一项政策，是封建专制主义的产物。封建主义利于人民愚昧。群众愈没有文化，就愈容易被人愚弄，愈容易服从长官意志。所以封建统治者都要实行文化专制主义，要开列一大堆“禁书”书目。其实，“禁止”常常是促进书籍流传的强大动力。因为这种所谓“禁书”，大半都是很好的书，群众喜爱它，你越禁止，它越流传。所以“雪夜闭门读禁书”成为封建时代一大乐事。如果没有“禁书政策”，是不会产生这种“乐事”的。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全部人类文化，不是采取仇视、害怕和禁止的态度，而是采取分析的态度，批判地继承的态度。同时我们也有信心，代表人类最高水平的无产阶级文化，能够战胜一切敌对思想，能够克服过去文化的缺陷，能够在现有基础上创造出更高的文化。因此，我们不采取“禁书政策”，不禁止人民群众接触反面东西。毛泽东同志在二十二年前批评过一些共产党员，说他们对于反面东西知道得太少。他说：“康德和黑格尔的书，孔子和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46页）毛泽东同志特别警告说，对于反面的东西，“不要封锁起来，封锁起来反而危险。”（同上，第349页）

连反面的东西都不要封锁，对于好书，那就更不应当去封锁了。

当然，不封锁也不等于放任自流。对于书籍的编辑、翻译、出版、发行和阅读，一定要加强党的领导，加强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对于那种玷污人类尊严、败坏社会风气，毒害青少年身心的书籍，必须严加取缔。因为这类图书，根本不是文化。它极其肮脏，正如鲁迅所说，好象粪便或鼻涕。只有甘心毁灭的民族和完全腐朽的阶级，才能容许这种毒菌自由泛滥。当然这种毒品是极少的。对于研究工作所需而没有必要推广的书籍，可以少印一点。但是不要搞神秘化，专业以外的人看看也是完全可以的。世界各地的各种出版物，都要进口一点，以便了解情况。有的要以批判，有的要取其有用者为我所用。不要搞锁国主义，不要对本国保密，当然也不是去宣传。至于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则应当充分满足人民的需要，这是提高我们民族文化水平和思想境界不可缺少的养料。不要前怕虎，后怕狼。要相信群众，要尊重历史，要让实践来检验书的质量。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人民群众喜爱的书籍，必有它存在的价值。这是我和书打交道时必须承认的一个客观现实。

在书的领域，当前主要的问题是好书奇缺，是一些同志思想还不够解放，是群众还缺乏看书的民主权利，而不是放任自流。为了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我们迫切希望看到更多更好的书。应当打开禁区，只要有益于我们吸收文化营养，有助于实现四化的图书，不管是中国的，外国的，古代的，现代的，都应当解放出来，让它在实践中经受检验。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纯”。空气里多少有点尘埃，水里多少有点微生物和杂质。要相信人的呼吸器官能清除尘埃，消化道也能制服微生物。否则，只好头戴防毒面具，光喝蒸馏水了。打开书的禁区之后，肯定（不是可能，而是肯定）会有真正的坏书（不是假道学所说的“坏书”）出现。这是我们完全可以预见也用不着害怕的。让人见识见识，也就知道应当怎样对待了。

## 解放“内部书”

雨辰

前些天，听到一位同志偶尔谈起内部发行图书的情况。据说，从一九七五年到一九七七年，光北京的各出版单位内部发行的图书就将近一千五百种，有的出版社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图书都是内部发行。内部发行的书太多，读者看不到，买不到，也就显得这些年来“书荒”现象更为严重。

一些书之所以被定为内部发行，据说“理由”颇多。

“理由”之一，是“唯心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不宜公开。”被列入

这类的是否都是吓人的毒品，姑且不论。就算是吧，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在受了多年马列主义教育的人民的面前，这些东西就那样可怕吗？例如，马赫《感觉的分析》，伯恩斯坦、考茨基这些老修正主义者的言论集，难道人们一接触，就染成不治之症？其实是杞人忧天。我看，让我们的青年（当然是能读而且愿意读这些书的青年）接触这类反面教材，也算是经风雨见世面，不做“温室的花朵”，有何不好？至于研究工作者需要这类书，就更不

当前，在我们的文化生活中存在一种奇特的现象。一方面，纸张严重缺乏，许多有价值的书印不出或印数很少。另一方面，却有大量书刊被浪费！比如，一些单位用公款购买各种各样的书，而且多半是大部头，不分对象，不讲需要，每人发给一套。有许多领导机关，经常动用公款买书刊送给领导，什么常委以上，付主任以上，副书记以上，按级发。特别是遇到新华书店拨来几十部热门书，就更不讲需要与否，照例是常委每人买一套，专需此书的宣传部门、理论部门连影子也看不到。这些书刊送来之后，有

## 制止“侵

的还荣幸地被主人“光顾”一下，有的则随便往什么地方一扔，等待它们的命运是尘封鼠啃，或者回炉化浆！如果大大削减被这些办公室所“侵吞”而且白白浪费掉的书刊，用节约下来的纸张印刷其他更有价值一些的书，供给人民学科学、学文化，其作用不是更大得多吗？我们为什么不能这样作，为什么不学会这样作呢？

最近翻阅《列宁全集》，才知道，



待说了。

还有不少可以斟酌的“理由”，这里不一一罗列。叫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象《通鉴纪事本末》、塔列尔的《拿破仑传》、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这类研究历史的资料书、学术论著，有什么理由不能公开发行？

多年来，内部书要按级别分配，也是一大发明。某些书“限省军级”，某些书“限地师级”，似乎级别越高，保险系数越大，而真正需要它们的研究机关和研究工作者，却常常望书兴叹！这些要“保险”的书，成了政治待遇，有权购买者不见得去浏览，而不少则流入一些青年之手，辗转传借，以至不明下落。有位同

志慨乎言之说：“内部书在知识青年中泛滥成灾。现在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内部书。此风不戢，如何得了。”我倒不是说这些青年不可以接触内部书，而是证明按级分配往往同力求保险者的原意大相径庭。

最近，听说出版部门在扫荡“四人帮”的妖氛毒雾之后，思想大为解放，原来内部发行的《战争风云》准备公开发行了，照老框框本要内部发行的《西行漫记》、《尼克松回忆录》，也决定公开发行。这确是读书界的一大喜讯。我希望出版界的同志们思想更解放些，让更多的“内部书”突破框框，解放出来，公诸读者。

---

## 吞”

辛 山

原来这也不是一个新问题，列宁在二十年代初期就已为这个问题发过议论，写过文章，下过指示。列宁严厉地批评过大量书报“被‘苏维埃官僚主义者’侵吞了”、“被拿去‘卷纸烟了’等等”现象，主张削减分配给公务人员的份额，让广大追求知识的群众得到他们所需要的书刊。列宁说：“工农群众追求知识的热情是巨大的，想受教育和建立图书馆的愿望是强烈的，这是真正的‘人民

的’愿望。但是我们还极不善于保持和巩固人民的这种愿望，极不善于正确地满足这种愿望。”如果我们也能按照列宁的方法去做，减少免费供给各办公室的书刊的份额，压缩一切不必要的用纸；如果把“苏维埃官僚主义者”浪费的书刊纸张节省下来，就可以“给人民提供重要的和有价值的文献材料，普通教育的教科书，农业教科书和工业教科书。”这样做，既节约了纸张，又满足了人民学习的要求，还打击了“苏维埃官僚主义者”身上的官僚主义习气，何乐而不为之！

# 海关这一关

黄 仑

国家要现代化，科技在引进，文艺也有个借鉴的问题。回想“四人帮”时推行愚民政策，禁锢思想，广大读者与外国隔绝多年，致使我们对外界情况知之不多，有时甚或一无所知。这种状况大不利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大不利于日益频繁的国际交往，大不利于青年作家和批评家的成长。打倒“四人帮”，

这种状况开始改变，然而也有至今不变或改变不大的。其中，海关便是一个。

近年来，国外的朋友们曾寄来大批外文图书，许多都被海关以“不合规定”的罪名打了回去。什么规定呢？对不起，“内部掌握”，不能出示。过去的“文艺书籍一概不准”，姑置勿论；“四人帮”垮台，中文莎士比亚解放，洋文莎士比亚才获准入境。可惜不是所有外文书都有中译本！既不准进，当然也就无从译。先有蛋？先有鸡？还是那个老

---

## 借书难

黄 克

既然买书难，而书又不能不读，求其次，只好去借。

但是，阅览时间便似乎故意和你作难。你上班，它开门；你下班，它闭馆。这对于利用业余时间进行研究、自修的，不啻拒之于门外。即或得以升堂入室，交上索书卡后的那漫长的恭候时间，也十分难熬。好不容易借到了手，可以攻读了，然而又已处在闭馆铃声威胁之下。日前看了影片《并非一个人的故事》，有一个细节曾引起会心的一笑。那位科研人员为了不中断翻检资料，竟要求将要下班的管理员把他反馈在阅览室里。想来，这种愿

望大概也“并非一个人”所有吧。

六分之五时间工作，六分之一时间学习，本也无可责难。如果图书馆的服务对象只限于本机关，那更无影响。但如果面向的是一个系统、一个城市、一个地区，以至全国，那末，你的六分之一和大多数的六分之五，就会发生尖锐的矛盾。试想，那些废寝忘食以孜孜攻关者、那些千里迢迢前来查阅资料者，对你们的六分之一又要作何感想呢？人们自然会问：为什么不把图书馆员的学习时间调整一下，而偏要集中于一天呢？

借阅图书，动辄要证明、看级别，好象读者不是来看书，而是来接受政治审查的。随后要分类，文艺、理工、农医……，犹如报考大学一样，分科精严。定某科，看某

故事。现在的“规定”何如？笔者日前去探问，答复是：“好书可以，有问题不行。”

看来，海关大概拥有我国最大的一支外国文学研究队伍。他们时间充裕，能将所有寄来图书逐页审查；他们学术精深，一言便可定论；他们用心周到，唯恐不谙世事的纯朴人民受到“污染”……

可是，居然又发生过连韩素音女士的友好客观的作品也要被禁的笑话……

我们要请问海关，你们的那套

科书，不可越雷池一步。在“边缘科学”已成为尖端的今日，实有“对着干”之嫌。

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限制，如孤本、善本，乃无价之国宝，目前又没有条件全部影印、复制，施以适当限制，本无可。可怕的是那些“特藏书”，一当入册，不知要经过多少审批手续才得一见，简直令人望而生畏，不敢问津。“特藏”之所以必要，谓其涉及反动、黄色，或保密之需。有一友人得窥“特藏”之秘，他借的是《古文观止》，问何以“特藏”起来，原来系香港出版，真是让人啼笑皆非。难道古人书也因沾了“港气”而必须予以“特”而“藏”之吗？至于说到“反动”，其界限也颇为含糊。文化大革命期间，批一本，“特藏”一本；批一人，“特藏”一

“规定”（如果真有什么成文规定的話），究竟源出马列经典何卷何篇，所本中国宪法哪章哪节？这种作茧自缚的办法之愚不可及，大概只有连打字机录音机都不准寄进差可媲美。为什么迟至今日，还不能根据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要求，制定出一部堂堂正正的“书籍进口法”，公诸于众，俾有所遵循？

我们真诚地希望，一切从四个现代化出发，真正相信自己的人民，思想要解放一点，步子要快一点，还是以这样为好。

堆。弄得除去经典著作和一些样板戏、小册子之外，几无读物。这是林彪、“四人帮”制造出来的“空白”，然而，图书馆却成了禁书馆，谁还敢问其项背呢？

图书馆面向广大读者，它是开放单位，而不是专政机关；它只能客观而又充分地提供研究参考用书（虽然不排斥为青年积极引导），却不能划定禁区。禁来禁去，已经禁成了个愚昧无知、孤陋寡闻，这一教训难道还不深刻吗？

现在“四人帮”虽然已经打倒，图书馆的禁忌却还没有完全扫除。开放时间、分科办法等等，更是由来已久，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改革。希望各方面都来督促才好。

笔谈

# 马克思恩格斯写的书评

仲  
民

如果从头说起，那是七、八年以前，在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时候的事了。劳动之余，我想到应该读点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由于多年来干的是出版这一行，还曾做过一个书评刊物的编辑，对书的情况比较关心。马克思恩格斯所写的书评，特别是他们在书信中对许多书提出了精辟、深刻的评论意见，引起了我的注意，便陆续作了些摘录。离开五七干校以后，积累的这些材料藏在箱底，一放几年。

为什么重提这些旧事呢？

当我翻阅着过去摘抄的这些东西的时候，就不由得想起，在那些日子里，连读点马克思恩格斯的书，居然也成了禁忌。同时，也深深感到，马克思恩格斯写的书评，真象是一座丰富的宝藏。它反映了两位革命导师在科学研究工作中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光辉顶点的历程；反映了他们是怎样在批判继承人类历史所留下的一切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的共产主义理论的。

从广义来说，马克思恩格斯的许多著作，都和书评有关。例如，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一书，就是针对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一书的观点所作的批判。在这一著作中，马克思第一次以论战的形式，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 worldview，阐述了他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研究成果。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是批判杜林利用《哲学教程》、《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等书所构成的“体系”而写作的，正如恩格斯在该书

三版序言中所指出的：“消极的批判成了积极的批判，论战转变为马克思和我所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比较连贯的阐述，——而这一阐述包括了相当广泛的领域。”于是，《反杜林论》实际上成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

马克思恩格斯直接写的书评文章，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有三十余篇，其中包括他们早期为批判德国的青年黑格尔派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写的书评；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失败后，发表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上的书评；以及《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恩格斯为了打破资产阶级学者和官方报刊以“沉默”来扼死《资本论》的企图，所写的九篇书评。在《资本论》书评中，恩格斯以不同的身份出现，利用资产阶级报刊，把马克思的观点介绍给读者，在所谓“最不得罪人的文章”中，他强调指出马克思这部著作的科学性，引导人们注意它的革命性的结论，并且用各种方式向资产阶级学者提出挑战。

此外，马克思恩格斯对许多书籍的评论意见，还散见于他们的大量论著和书信中。据不完全统计，为了写作《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钻研过一千五百多种书籍，而且作了提要。从《剩余价值理论》中可以看出，他对政治经济学史上的重要代表人物，从重农学派的魁奈到亚丹·斯密，从李嘉图到马尔萨斯，对他们的著作，都作了全面的、历史的分析。

对于在历史上，在各个领域中作出了贡献的作家，即使是一点一滴的成就，马克思恩格斯都是积极地予以肯定，热情地加以推崇。对于同志和朋友的作品中的缺点和错误，他们严肃认真地，实事求是地批评和帮助。只有对于形形色色的反动思潮，特别是那种以假冒真的江湖骗子，才展开无情的揭露和抨击。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写的书评的一个鲜明的特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评中，不止一次地提到，黑格尔不仅是一个富有创造性的天才，而且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物，他在每一

个领域中都起了划时代的作用。黑格尔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他的《精神现象学》、《美学》、《哲学史》等著作中，到处都贯穿着这种宏伟的历史观。当有些人把黑格尔当作“死狗”抛在一边的时候，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里，公开承认自己是这位大思想家的门人。恩格斯在1865年写给朗格的一封信里，提到黑格尔的数学知识极为丰富，他遗留下来的大量数学手稿，只有马克思足以胜任来整理出版。他说自己虽然不再是黑格尔派了，但对这位伟大的老人仍然怀着极大的尊敬和依恋的心情。

对费尔巴哈，马克思早在1844年写的一封信里，就指出他的《未来哲学原理》和《信仰的本质》两书，给社会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恩格斯在谈到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一书出版时的解放作用，说大家都非常兴奋，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到。

至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恩格斯是作为自然界的三个伟大

纽约航讯

## 作家与书评

——《纽约时报》的影响

本刊特约记者

董鼎山

我有一个友人，近来完成了第三部小说，原定于去年十月出版，但当时纽约各报大罢工，停刊了好几个星期，因此出版商、编辑与作者三方同意，延期出版此书。报纸停刊与出版小说有何关系？事实是关系极大。一个无名作家的作品，出版了以后，如要引起读者注意，至少必须经过两种宣传活动。一是广告介绍，在日报、周刊及专门杂志上登载新书广告。另一是书评，出版商将样书提前分寄与各报、杂志及著名文学批评家，请他们发表书评。但美国每年出版之书，数以千计，一般报章不能每书皆评。即

发现之一，并且和马克思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相提并论的。恩格斯还推崇美国民族学家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认为他的伟大功绩在于找到了一把解开古代欧洲历史上极重要而未解决的哑谜的钥匙，即证明了父系氏族社会从母系氏族社会而来。“摩尔根是第一个具有专门知识而想给人类的史前史建立一个确定系统的人”，他所提出的分期法，即以生产工具的发明、创造作为划分原始社会时期的标志，“在没有大量增加的资料认为需要改变以前，无疑依旧是有效的”。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副题是“就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作”。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许多地方批评过魏特林的空想共产主义理论，但是对他的著作《和谐与自由的保证》却始终给予肯定的评价，称之为“德国无产阶级巨大的童鞋”。

甚至象戴维·乌尔卡尔特这样一位反动的英国保守派政治家在1835年出版的《公文集》，由于它不断公布沙皇俄国政府侵略

---

使是声誉极高的《纽约时报》，日刊载书评二、三篇，星期日的书评周刊登载数十篇，也无篇幅包罗一切，做到有书必评的地步。美国虽有好几千家报章杂志，但只有《纽约时报》占有独特地位，受人重视。这便造成了“如果《纽约时报》停刊，出版界几乎不能存在”的现象。

这句话当然有点过份夸张。但《纽约时报》受人重视原因有数个：一、美国因地势广大，各地都有报纸，而没有一个全国性的报纸。《纽约时报》由于包罗各种新闻，记者分布世界各地，便成为全国性报纸的替代。一般高级知识分子，虽不住

在纽约，也必须订阅《纽约时报》，否则就不明国家大事，世局动态。二、《纽约时报》在历史上就一贯是家质、量并重的报纸，它的读者包括政府、工商界、学术界、文艺界的领导人物。高级知识分子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它的读者。任何材料，无论是文章、书评、广告或读者来信，一登《时报》，就受到社会上举足轻重的人物的注意。三、报纸质地佳与读者质地高，是互相有帮助的。报纸质地越好，读者越要看。读者质地越高，报纸的影响力越大。四、《纽约时报》的销路不如他报，例如小型的《纽约每日新闻》销

扩张野心的秘密文件，直到 1889 年恩格斯还指出：“这本《公文集》至今仍是关于沙皇政府力图使西欧各国彼此发生争吵，从而使它们全都服从自己的统治的那些阴谋的历史的主要资料之一，至少是最可靠的资料。”（见《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一文）

马克思恩格斯所写的书评，总是抓住关键问题，具体分析，对作品作出基本评价，从来不搞什么片言只语，断章取义，影射攻击，无限上纲。所谓批判，也是有所扬弃，有所继承，总结了前人思想中的精华，研究了当前的实际，提出新的结论。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书评的又一特点。

还是举黑格尔作例子。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对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一书中阐述国家问题的第 261—313 节作了详细的分析和批判，这是黑格尔法哲学中最保守的部分，约占全书三分之一，对全书则没有涉及。马克思本来打算就这一问题写成一本专著，但是在《导言》发表以后，他考虑到把单纯对思辨思维

---

路就比它大过好几倍，但它的读者多是小市民阶层，文化水平低，喜欢看黄色新闻。这样的报纸登了文学书的广告，无人注意，又有何用？

在《纽约时报书评周刊》(NY Times Book Review) 上如能争取到一篇佳评，就等于包售了数百本、数千本的新书。由于新书出版之多，该刊对一些平庸的作品，不屑一评。所以即使是新书不得好评，但能在《纽约时报书评周刊》篇幅上占一席之地，对一般的默默无闻的作家也算是一种荣誉，因为至少它的编辑们已注意到你的书。一般而言，《纽约时报》避免评论一般

通俗小说，或没有文学价值的书。但没有书评，出版商却仍不惜化了高价，在《纽约时报书评周刊》登整幅广告，引人注意，招徕生意。

《纽约时报书评周刊》另有受人注目的一页是《最佳畅销书目》(Best Seller List)。这书目分为小说 (Fiction) 和非小说 (Non-fiction) 两栏。每栏列十五本本周销量最大的书名，按每周向全国各地大书店征集来的数字的多寡先后排列。当然，越是列入这一书目，越是有可能引人注意；越是销路大，作者的版税标准也因而越高。能够列入这《最佳畅销书目》的大多是



的批判和对不同事物的本身的批判结合起来的作法，是很不适当的。所以，他放弃了这一意图，保存下来的只是手稿。实际上，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包含很多有价值的思想，例如“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这个有名的辩证法的命题，就出自《法哲学原理》。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不同的学科方面，总是互相帮助的，对同一本著作有时存在着不同意见，经过讨论甚至争论，在实践的检验中不断改正自己的错误。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写的书评的又一重要特点。

1866年8月7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介绍法国自然科学家比·特雷莫的《人类和其他生物的起源和变异》是“一本很好的书”，说这本书比起达尔文来还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进步，在运用到历史和政治方面，比达尔文更有意义和更有内容。恩格斯在回信中不同意马克思的评价，他说自己还没有读完这本书，“但

---

有名的作家，无名作家一旦榜上有名，便立即一举成名，文坛登龙，身价百倍。比如去年澳大利亚一个家庭妇女麦可乐，写了一本关于澳大利亚牧区的家史小说《荆棘岛》，连续二、三十个星期位居《最佳畅销书目》之首，销路达五、六百万册，单是平装本版税就得了一百九十万元，可说一夜之间就成了百万富翁。但是一般无名作家的所谓“第一部小说”，能销上几百本乃至几千本的已经不错了，所得稿酬有低到二、三百元的，要靠此生活是不行的。

美国各地著名大报如《华盛顿

邮报》、《圣路易快递报》、《洛杉矶时报》等也都有周末书评附刊，但身价都不如《纽约时报》。其他受到学术界和文艺界重视的是《纽约书评周刊》(N. Y. Review of Books)，此刊乃是十余年前纽约各报首次发生大罢工(为时三个月)时所产生。当时文学界人士不能等待《纽约时报》复刊，乃自行创办一个书评杂志。在开始时甚受人重视，但其内容逐渐改变，现在所登之文章着重于政治性甚于文艺性。

其他各种周刊、月刊等书评栏也相当受人注意的有《大西洋月刊》、《哈泼氏月刊》、《纽约客》、

是可以断定，光是下面这一点就说明他这一套学说是空洞的：他不懂地质学，也不会作最起码的历史文献批判。”恩格斯认为“这本书没有任何价值，是与一切事实相矛盾的纯粹的虚构；作者所举出的每个证据，都需要再用新的证据来加以证实。”在第二天的回信里，马克思反驳了恩格斯的看法，说这种评语，可以在既是大地质学家，又是自然科学家中少有的历史文献批评家居维叶的《论地球表面的灾变》一书中“一字不差地找到”，但是这并不妨碍居维叶是错误的。恩格斯的回信说他本来只读了三分之一，而且是最糟的三分之一，第二个三分之一好得多，最后的三分之一是结论，又很糟。他肯定了特雷莫的成绩，其中有的评价和马克思接近，但也不完全赞同马克思的意见，他具体分析了作者的论据，认为特雷莫强调了至今还没有被注意的方面，是他的功绩，他的假说在一定范围内或许是正确的，但他所做的进一步的结论，如果不是完全错误，就是非常片面的夸大。以后，马克思在

---

《新共和》、《时代》、《新闻周刊》等。但这些刊物的书评，一共加起来，还不及《纽约时报》一家的份量。

美国出版界乃是一项巨大的商业。一本畅销书可以使一个无名作家一夜之间成为百万富翁。但这类作家的进益不是单靠售书的版税，而是也靠卖给好莱坞拍电影或广播公司拍电视的所得。但那是另一篇故事，以后有机会再谈。

（一月十日寄自纽约）

## 美国的书商

---

美国每年出版的新书中，有40%由书店经销。一年按出版新书四万种计算，就有约一万七千种书在书店出售。另外，全国图书市场上销售的多年来一直在重版的书有四十余万种，其中40%即十七万种以上的书也由书店出售。两者加起来，一个书店从理论上说，每年出售的可达十九万种以上的图书。

向路德维希·库格曼推荐这本书时，说“这本书虽然写得很粗糙，充满了地质学上的错误，历史文献方面的批评也很差，但是总的说来，它还是比达尔文前进了一步。”经过讨论，马克思对这本书的缺点方面，同意了恩格斯的意见。

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的书评中，对同一著作存在着不同意见的争论，自己的看法前后不一致的情况也是有的。这是研究工作中的正常现象。怎么能把革命导师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观点当作金科玉律，当作永远正确的呢？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有力量，就在于它是科学，就在于它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通过实践而逐渐达到比较全面、正确的认识。

问渠那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来。

这正是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写的书评所得到的教益。

---

可是，实际上比较大的书店每年也只能陈列五千至一万种书，大多数零售店还到不了这个规模。因此，不少图书积压在仓库里，有图书过剩的现象。

与此同时，一些美国公众却抱怨说，他们去书店常常买不到想要的书，例如古典名著、烹调书等等。他们在书架上看到的往往是全国范围内二三十本畅销书。

如果将这种情况完全归咎于书商，也不太公平。书商在挑选该进什么书的时候，经常遇到左右为难的局面。他们如果听信出版社推销员的宣传，进了大批可能成为畅销书的图书，结果往往并不美妙。当

然书商有权退还出版社那些卖不出去的“畅销书”，可是为这些书花掉的仓库保管费和退货时的运费，不能不是一笔损失。但如果不进那些可能的“畅销书”，一旦它们畅销起来，书店老板又会措手不及。脱销一本畅销书不仅使书店少赚许多钱，而且也有损书店的名誉。所以美国的多数书店宁愿追求“大型”书和畅销书，而放弃那些有价值的书。

在这种情况下，有的书店就实行“专门订购”的制度。顾客提出要求，书店派人到出版社仓库里挑，包装寄出。这样，顾客所花的钱常常是书价的几倍。（罗）

# 探索现代化的中国风格

——部分书籍的装帧设计观感

张慈中 于麟

“开卷有益”，这是我国自古以来的名言。其他国家也有许多赞美书籍的警句。随着社会在前进，书籍同人类生活的关系无疑会愈加密不可分。然而无需证明，任何书籍都得有一定的形式，没有形式的书籍是不存在的。人们在“开卷”之前，第一眼看到的只能是书的相貌装束，即书籍的形式，术语称之为装帧。一本书，有了精美的装帧，会给人以读书之乐。反之，装帧低劣，纵使内容不错，也会使人产生美中不足，兴味索然之感。可见，书籍装帧在千百万读者之间起的作用。书籍装帧作为一门艺术，在国际上早已受到普遍的重视，它正随着社会的发展而逐渐完美。我们只要接触到一点外国的图书，就不难理解它正在怎样飞速地发展。

目前，当祖国大地结束了酷寒冰封之后，最先一批迎春而开的装帧艺术花朵，正陆续出现。它们虽不算多，却冲破了先前那种贫乏、枯燥、全无生气的局面，以其新意和活力，给人以鼓舞，预报着即将到来的万紫千红。

封面是书籍装帧的重要而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搞好封面设计，不断创造新的形和新的色，以更好地体现书籍的内容，增强艺术感染力，吸引和满足读者，这是改进装帧工作的重要方面。令人欣喜的是，目前在各类书籍的封面中，都

能够看到用过心思的设计。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新世界的儿女》（阿尔及利亚长篇小说），封面的构思和表现手法都有新意，特别是它的构图和色彩。设计者根据小说的主要内容——阿尔及利亚妇女在革命中的觉醒和成长，集中概括出一个引颈迎向朝阳的年轻妇女的侧面头像：面部为霞光染得分外鲜明，头像富有雕塑感，顶天立地，头顶直抵封面上缘，颈部连接大地，浑然一体（地面上的仙人掌使人联想到非洲）。黑色为主要色彩，覆盖着封面的一半以上篇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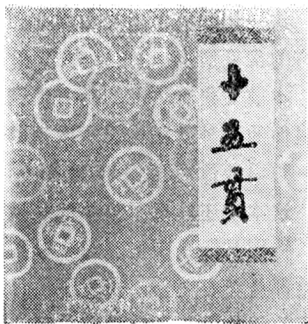
但并不显得昏黑，在黄(背景)、橙(面部)两色的对比下，反而显得十分鲜明、强烈，加强了画面的艺术效果。这样的构图，以及这样的色彩，体现出“新世界的儿女”的基本精神面貌，同时象征着希望和力量。

从表现手法上说，如果这本书的封面设计是运用写实手法的成功，那么，云南人民出版社的《于无声处——一批冲破禁区的好作品》的封面设计，则从运用写意手法方面取得了成功。它的特点是构图简洁，意境深远。单一的蔚蓝色作底色，右下角一个黑色长方块印着书名，作为封面要求，这实在难以再简化了。此外只有一只白色粗线条一笔勾勒出来的飞鸟，连同它飞行的示意曲线，完全是写意的。然而正是这个一笔写意画，吸引着读者琢磨、回味：鸟儿向天空飞翔，不久即由于某种原因不得不转起圈子，而最终又以无可阻挡之势奋力冲向高天。当读者回顾某些人对这批冲破禁区的作品的议论，再看这只飞鸟的路线，会感到设计者说了很多很多。

广东人民出版社的《丽日南天》(散文集)，在装帧设计上也是颇具匠心的。到过祖国南疆的人一看便知，那被阳光镶起明亮边缘的浓黑粗大树干，从树干间隙露出的清澈艳丽的蓝天，盛开如火的木棉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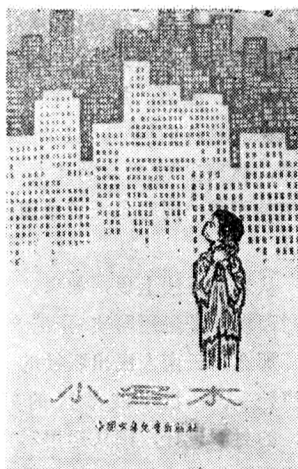
朵，这一切构成了逆光中观察烈日南方的常见情景。书的内容提要说明，本散文集有浓郁的南方情调。而封面的这种新颖构思所展现的意境，圆满地体现了内容提要的介绍。这本书还注意了整体的装帧设计，特别是题头图案。每文一画，多数都是精心之作，表现了设计者丰富的想象力和熟练的装饰手法，足以引发读者的寻味、联想。

从目前见到的一些经过认真设计的封面中，不难发现一个普遍的倾向，也是新的特点，就是在探索现代化的中国风格。它们既有图案古朴雅致，体现出鲜明的传统民族风格的设计，同时正在较多地出现构思大胆、新颖，具有现代化气息的作品。象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变色龙》、《十五贯》(都是连环画)，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小冬木》(叙事诗，有插图)，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姑苏春》(长篇小说)，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小灵通漫游未来》(科学幻想小说)，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外国文艺》(期刊)、《黑潮》(日本长篇小说)，吉林人民出版社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连环画)，都是在封面设计上具有特色的作品。它们的设计者根据书的内容和读者对象，进行了风格、样式各异的设计。其中《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从封面开始，到扉页，到正文，浑然一体的传统民族形式，必定使读者深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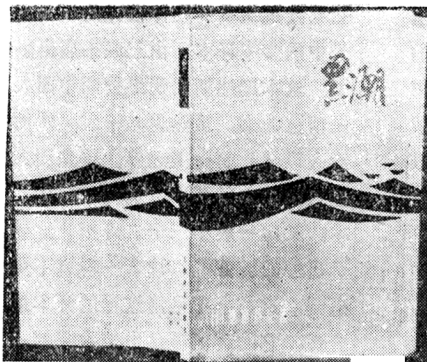
兴趣。紫色的封面上，一个孙悟空的三角形写意头像，一行竖写的白字书名，在如此简洁新颖的设计吸引下，读者准会翻阅下去。而翻开封面，概括了故事精华的扉页设计更加引人。而《外国文艺》、《黑潮》则着眼于外国文艺作品这一特定内容，在封面设计上做了大胆突破。它们以自己所带有的一些“洋”味，同样赢得了读者的称赞。

在不算短的一个时期内，很多人似乎感到，政治书和科技书的装帧设计是难以搞出也不必搞出什么名堂来的，甚至有些误解以及在误解之上做出的误事的决定。比如认为，这两类书既然要朴素大方，封面设计则越简单越好，标准设计是光板一条字(书名)，而且这一条字只能横排，不准竖着，以至于还圈定了封面的用色范围，等等。政治书和科技书就一定排斥精心的装帧设计吗？朴素大方就是越单调越好吗？目前已有几本书的封面设计做出答案和示范。



人民出版社的《唯物辩证法大纲》，改变了这类书常见的把书名、作者名、出版单位在一个轴线上横排三行的老例，把书名移到封面右上角，而且把据说是不能转行的书名分做两行，还把书名的下半段跟作者姓名排在一行，出版单位也排到封面左下角。如此对老例做了一点冲击，此外并无再多花样，这本书的封面竟顿时显出生气。难道书的严肃性和学术价值因此而降低了吗？当然一点也没有。

科技书的内容有很大一部分是难以用形象来表达的，有的虽能表达，然而形象不美。要设计好科技图书的封面，一个十分重要的途径是把科学原理通过形象思维加工概括，使之图案化。人民邮电出版社的《微波通信系统设计和设备》、《LC滤波器和螺旋滤波器的设计》



两书的封面设计，有助于启发人们进行这一方面的思考。《微波通信系统设计和设备》，书名只占封面上端一条不大的狭长地位，很大的篇幅是一幅优美引人的图案；这是对两种正在发射的微波通信天线——锅形天线和扇形天线的概括和形象化。设计者使这一图案处于既是它又不是它的状态，内行人看着明白，外行人觉得美观，确实为这本书增色不少。

《LC滤波器和螺旋滤波器的设计》，也是图案占封面绝大部分。图案由三组造型相同、色彩有别的局部构图交错排列构成。每组构图都是滤波器符号加上经过美化的曲线图。这本书经过图案的美化装饰，连外行人都要盯住那一条条富有个性的曲线，企图看出一点奥妙来。

这两本书的封面设计，突破了以往常见的把实物的照片或科学原理的图例直接搬上封面的作法，是

有所创造的。

冶金工业出版社的《稀土》，封面也别具一格，看后令人难忘。这是由于设计者不满足过去简陋设计这一类图书的惯例，宁愿自找麻烦，精心思考的结果。十七个小方格的安排，取得了平淡中见奇异的艺术效果，显然要经过内容、构图和色彩上的反复琢磨。这些小方格，不仅与书名相配合起到鲜明、和谐的装饰作用，同时引人注目地展示了稀土的各个元素，并巧妙地区别了元素的分系。

上面所列举的封面设计，有一部分在制版、印刷方面是有较大难度的。可喜的是，制版、印刷工人为了提高我国书籍的装帧水平，勇于克服困难，精心制作，为再现这些封面设计增添了新的光彩。

诚然，叙述至此一直未离开封面，而这正是当前我国书籍装帧薄



薄弱环节的反映。书籍装帧的完整概念，当然是对书籍进行整体设计的全面要求，好的装帧设计必然考虑到书的形式各个方面，并使之成为统一而和谐的整体。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书籍装帧的现状，还存在许多不足。比如书脊，许多书，特别是厚一点的书，书脊很不讲究，白底印上几个黑铅字的实在不少，讲究一点也不过加印一个底色而已。这样，封面即使设计得再好，一上书架，顿时隐去“真面目”，书架上看到的不过是一排印着黑铅字的白纸。外国书十分讲究对书脊的设计，不肯轻易使书脊比封面逊色，这是值得我们参考的。正文的版面设计，多数还未做到根据书稿性质的不同，在格式、字体上采取相应的变化。应该看到，美化装帧是包含着版面设计这一工作。开本，目前也十分单调。根本原因固然是纸张规格、印刷条件的限制，但是在现有条件下，也值得考虑书籍的内容特点和读者对象，有意识地搞一部分非三十二开本，以活泼我国书籍的面貌。

就象出版工作者对读者的期望作出回答，当本文正准备结束时，

装帧经过认真的整体设计的《“我热爱中国”》中译本，由三联书店出版了。这本记述斯诺病终前同中国人民情谊的书，虽然也是平装，然而给人以精致而完美之感。首先引人注目的是它的开本，属小三十二本，又比一般小三十二开窄，这就显出修长、秀气，读者一看就不免感到，这类书正是用这样的开本最合适。它的装帧项目也较为完整，考虑到了包封、封面、环衬、扉页、插页，并对各个项目都做了比较细致的设计，如包封，统一照顾到它的封面、书脊、封底，使之浑然一体。书的封面采用了压纹卡片纸，设计者利用其质感和包封，并在扉页连环衬的衬托下，竟使本书产生出半精装的效果。版面设计，突出地对章节号做了非同常规的安排，用罗马数字，并放在正文右上角，从而显得生动活泼。总之，这是一本凭装帧就惹人喜爱的书。它足以再次证明，只要解放思想，开动机器，我们就可能利用好现有的条件，并且创造出可能的条件，为现代化中国风格的书籍装帧，而更有成效地工作。

（本文另有图片见插页。）





新世界的儿女

阿西里·杰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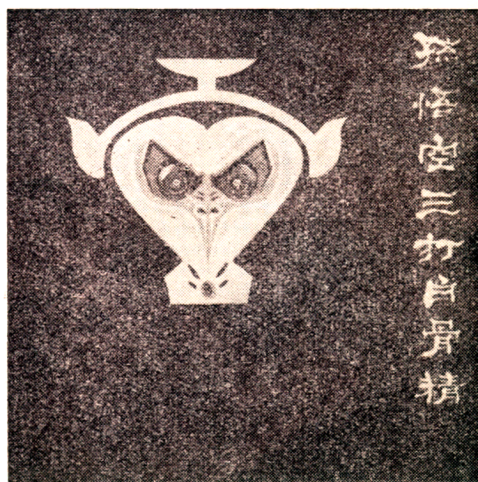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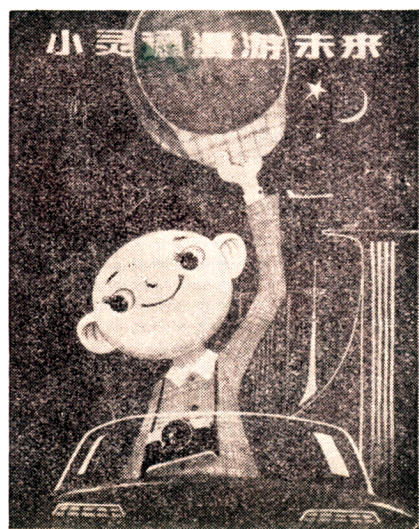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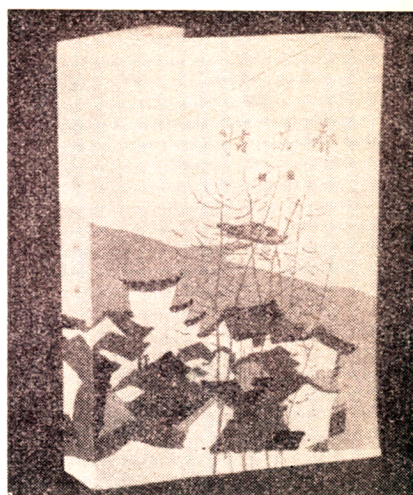
于无声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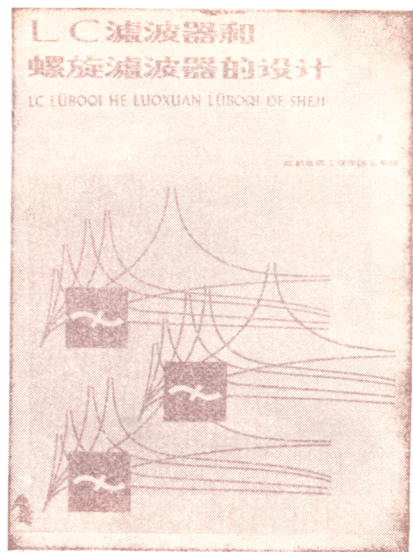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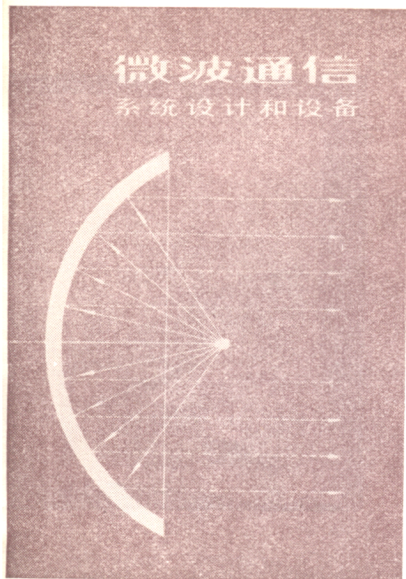
一批冲破禁区的好作品



丽日南天







# 解放思想，突破禁区

——中国近代史著作中的问题漫谈之一

卞 哲

在“四人帮”长期文化专制统治下，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同其它社会科学的研究一样，禁区遍地，禁条林立。“四人帮”被粉碎了，可是人们心有余悸，身有余毒，禁区还没有完全被突破。如果那些精神枷锁不砸碎，禁区不突破，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要取得更丰硕的成果是不可能的。

再说“四人帮”以前，禁区就有了。回顾历史，看看中国近代史研究存在着哪些禁区，对于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提高近代史著作的质量是不无意义的。

解放后，中国近代史研究最有成绩的是太平天国历史的研究。可是，就是在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研究中，对于这次伟大的农民革命的评价，普遍存在着拔高的倾向。只能歌颂，不能一分为二，甚至对某些明显的错误也未能加以分析。近年来的著作，较多的倾向更是变本加厉，以致将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某些问题搞得面目全非，不能真正地反映这次农民革命的真实面貌，自然不可能科学地总结它的经验教训了。

太平天国制订了很多政策、制度，在革命发展过程中曾起过重大作用，这是首先应当肯定的。太平天国尽管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农民革命的顶峰，可是，它毕竟是旧式的农民革命，它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它的政策、制度，不能超脱农民阶级的思想，也

不能离开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因此，不能将太平天国的政策、制度理想化，以致与无产阶级的政策、制度相提并论。《天朝田亩制度》是一个伟大的农民革命纲领，它鼓舞了千百万农民群众向清政府以及整个封建地主阶级展开了英勇的斗争。但是不能否认，这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却完全违反了社会发展规律，在实质上是带有反动性的。它既不同于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更与无产阶级的土地纲领有着本质的区别。太平天国金田起义后，实行了圣库制度（平均分配）、男女分居、废除商业买卖等，这在起义时由于革命的需要，确起过很大作用，但定都天京后，再继续实施，便不能促进生产，调动广大将士的积极性。我们某些著作将圣库制度歌颂得完美无缺，称为共产主义性质的供给制度，显然是不对的。太平天国的外交政策深受儒家的天朝上邦、夷夏之别的思想影响，不可能是完全平等的。太平天国也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天王、东王、北王等都有很多后妃，洪秀全的大量诗歌都存在严重的男尊女卑思想。

太平天国革命涌现出大量的英雄人物，太平天国革命领袖洪秀全便是其中之一，他的一生是光荣的、伟大的。但洪秀全毕竟是一个旧式农民革命的领袖，他在领导太平天国革命中，不可能没有缺点和错误，尤其是后期，他深居后宫，耽于逸乐，不问政事，脱离群众，他的有些错误是严重的。我们应当历史地、科学地、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总结经验教训，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可是，近年来一些著作和文章，却将洪秀全描绘得高大无比，完美无缺，思想与行动甚至可与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并驾齐驱。这样，便不是历史上真正的洪秀全了。

对于太平天国的另外一些领袖，如石达开、李秀成究竟应该如何看待更科学？一些著作和文章因为他们晚节不终，将他们一开始便写成是混进革命队伍的坏人，将他们对太平天国革命战争的贡献从历史上抹去，或一笔抹煞，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石达开参加革命是否一开始就想搞复辟？打算搞阴谋分裂？李秀成十几岁参加革命，他的意志是不是就不坚定？他在苏浙实行的是否便是一条投降、尊孔、复辟的错误路线？这些问题都应该认真讨论清楚，拨乱反正。对石达开、李秀成在太平天国革命战争中的功绩，写历史不能也不应该回避或抹煞。农民起义的领袖动摇变节的事例在中外历史上并不罕见。俄国著名的农民起义领袖蒲加乔夫有过这样的行为，但经典作家仍给予一定的历史地位。我国历史上的黄巢、张献忠等也有过向敌人妥协的事实，经典作家仍把他们称作起义农民的领袖。同样的情况，为什么石达开、李秀成的历史，就不能有分析地看待呢？甚至韦昌辉的问题也可以进一步研究。韦在1856年发动天京政变，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反革命分子，但是，太平天国之所以能在金田发动起义，同韦的毁家发难、大力支持不能说没有一点关系，而在过去的大部分论著中都把韦昌辉写成一开始便是钻进革命队伍的地主阶级分子，这样便将历史人物写得过于简单化、脸谱化了。

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清朝的一些官僚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在国内推行洋务，最初的目的是为了镇压人民起义，维护清封建统治的军事需要，后来则是为了攫取更大的权益。作为一场运动，无疑是反动的。但是洋务派与顽固派的论争是否都是一丘之貉？洋务派后期办的民用企业是否也有资本主义因素，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一些条件？洋务派办学堂，派留学生，建译书馆是否对学习和传播西方文化也起过一些作用？尽管这不是他们的主观愿望。这些问题都是可以，也是应当研究和讨论的。洋务运动的中后期，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近代资本主义企业，产生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中国最早的近代产业工人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经营企业而产生的），成了清政府的掘墓人，这与洋务派本来的愿望正好相反，也是洋务派所料不到的。对洋务派的人物也要作具

体分析，不要一提洋务人物，都简单地戴上汉奸卖国贼的帽子，有些洋务派代表人物也做过一些有益于中国人民的工作，不能一笔抹煞。如左宗棠收复新疆，有助于中国统一；刘铭传在台湾坚持抗法；曾纪泽在中法条约和伊犁条约谈判中据理力争等等，都应该肯定。

戊戌变法时的光绪皇帝，范老在《中国近代史》一书中称他由“封建皇帝变成维新元首，是值得尊崇的”皇帝。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了《清宫秘史》这一影片后，光绪皇帝在近代史著作中便成为卖国的头子了。戊戌变法是一次进步的改良主义运动，康有为是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的代表之一，光绪皇帝支持康有为变法，不论出于什么动机，在客观上同维新派和国家利益应完全一致。因此，光绪皇帝如何会成为卖国贼？为什么不是爱国的呢？即使在义和团运动时，西太后主战，光绪帝主和，从表面看，西太后爱国，光绪帝卖国，但实际上西太后置国家、民族前途于不顾，为了私利，利用人民的爱国热情，煽动义和团盲目排外，给国家和民族带来无限灾难。八国联军侵入中国，光绪帝虽无实权，但他在西太后召开的御前会议上表示反对义和团抵抗外国侵略者，这是严重的错误。但是以光绪为首的帝党不同意与八个国家同时开战，这并不是没有一点点道理。战争失败，最后被迫签订屈辱的《辛丑条约》，这次条约本是西太后主持签订的，谁都知道，戊戌变法失败，光绪帝便被囚禁，失去了任何权力。可是，前几年有的著作却将这个卖国条约作为光绪帝卖国的罪证。这当然是睁眼说瞎话。

义和团反抗外国侵略者是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但是许多近代史著作对这次运动的评价也存在拔高的倾向。义和团的“扶清灭洋”口号在民族矛盾尖锐下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应看到在这个口号下，混进了大量地主阶级分子、清朝官僚，篡夺了义和团组织的部分领导权。义和团也不能如某些著作所说的矛头直指



清朝皇帝。所谓杀“一龙二虎三百羊”并不是义和团的口号，而是端王等人为了打击光绪帝、利用义和团提出的。义和团在反对八国联军侵略战争中是英勇的，同时，很多清朝爱国将领如聂士成、罗荣光、寿山等也英勇地抗击了外国侵略者，最后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些爱国将领为什么不能给以应有的评价呢？义和团迷信落后，组织松懈，笼统排外，提不出正确的纲领、口号和斗争策略，为清政府所利用，可是在我们的著作中不去正确地、科学地分析这些问题，却采取了回避或盲目拔高的态度，这是不妥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戚本禹之流便利用了义和团运动制造舆论，煽动红卫兵火烧英代办处，与西太后煽动义和团攻打外国大使馆一模一样。现在必需实事求是地给义和团运动以全面的评价，不能同过去一样，以义和团为标志来划线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反对义和团，也应加以分析。他们害怕群众运动和帝国主义是错的，但是反对义和团对洋人和中国教民乱杀，对教堂乱烧，不能一概认为是错的。

辛亥革命研究中的禁区也是不少。很多著作将立宪派作为反动派，但是立宪派作为资产阶级的一翼，他们虽与封建地主阶级、帝国主义有较多的联系，但应当也有两面性。在革命派提出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来时，他们坚持君主立宪制虽然是反动的，但他们在经济上要求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比起封建制度，是否也有它的进步性？立宪派的争路权、争矿权，虽然为了本身利益，但客观上是符合人民利益的，不能全部否定。立宪派的代表人物中也有左中右，不是铁板一块，因此不能见立宪派人物便一概骂倒。云南的蔡锷和湖北的汤化龙不一样，浙江的褚辅成在后来比革命派的朱瑞还好，前者走向革命，后者投降了袁世凯。

辛亥革命中革命派的领袖也是完全可以讨论的。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他的一生是伟大的。但孙中山究竟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他的思想和行动必然会反映民族资产阶级的两

面性。他不可能完美无缺。同盟会的分裂，一些武装起义的失败，南京临时政府的垮台等等，革命派的其他领袖有责任，难道孙中山没有一点责任？陈其美在上海独立中有过贡献，后来成为右派，但不能因此避而不谈前期的事迹。辛亥革命时的某些显要人物，后来政治上起了变化，可是，要写一部翔实的辛亥革命的历史和孙中山的传记，又不能避开他们。如何科学地对待这些问题，亟需研究、解决。建国三十年了，没能写出有分量的辛亥革命的历史和孙中山的传记，这不能不是原因之一。

## 加 强 文 化 民 主

实现四个现代化，文化上需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

怎样加强呢？我想至少要做到——

一，养成批评和反批评的习惯。四人帮时期的棍子、帽子等等，当然要不得，现在不去说它；就以正常的批评而言，至今也还往往不能展开，好象一个作品挨了批评就不得了，作者也就抬不起头来。其实，批评得对不对，或者是否完全对，都还是问题，为什么不能由作者来个反批评呢？就算批评得对，但作者不服，为什么不能由作者来申述他自己的理由呢？只许批评者发言，不

许被批评者发言（或者只能让被批评者作检查），这跟四人帮时期的棍子、帽子又有什么不同呢？只有养成了批评和反批评的习惯，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才能生动活泼地发展。

二，提倡自由结社。结社，本来是宪法所赋予的民主权利，应当受到鼓励。各种各样的学术团体、文艺团体，过去都要经过批准立案，才有合法地位。我看这并不好，因为尽管没有限制之心，却容易造成限制之实。不如不经过批准也可以成立。事实上这种团体已经有了。（扬）

#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应当改革

子 起

一天，几个年青人偶然在学校图书馆管理员的宿舍里聚会了，他们谈到了政治经济学的教学问题，下面是这次聚谈的追记。

图书馆管理员（以下简称图）：

老 G，你说得对，社会主义制度有优越性，可是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总是超过了社会主义国家呢？

大学生 G：社会主义国家嘛，优越性是肯定的，就是它落后了，生产上不去。

图：这就奇怪了。社会主义国家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资本主义国家不然，照理应当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发展得快，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没有发展，或者发展得慢，停滞，而现在看来，不是这个样子。

大学新生 S：<sup>1</sup> 我看的确这样。不但生产上是社会主义国家落后，而且，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比资本主义国家先进，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比资本主义国家高，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生活水平比资本主义国家好。所以我想，社会主义国家

的优越性到哪里去了？

G：社会主义国家的落后是有历史原因的。比如拿我们这个国家来说罢，“四人帮”的时代搞得那样乌烟瘴气，生产能上去么？不但生产上不去，而且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图：四人帮是有罪，罪恶滔天，可是我们原来就落后，赶不上人家。就拿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来说，拿朝鲜来说，比我们好，但是也没有人家那样，没有日本那样。

S：我总在想，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大概只能和以往比，和旧时代比。要是和当前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比，就比不上。

图：S，你是刚上了大学的，你们的老师也不能回答这种问题。

S：我们的老师是照本宣科为主，教科书上没有讲的他就不好好讲。

G：我们的老师虽然也没有讲清楚，但是我想，社会主义制度的

确有优越性，只是没有发挥出来。

助教（以下简称助）：历史原因，这个说法很好。你们看，中国也罢，罗马尼亚也罢，南斯拉夫也罢，朝鲜也罢，原来是怎么样的国家呢？都是一些不发达国家，都是落后的。——朝鲜原来是日本的殖民地，资本主义也不发达。——就是沙皇俄国，原来也是一个军事封建帝国主义，不是资本帝国主义，不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和欧美的资本主义国家比起来，生产是落后的，科学技术是落后的，劳动生产率是落后的，人民生活水平是落后的。当它们变成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起点就低了，生产等等又不可能一下子就跳到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前头去，那怎么能叫它们不落后呢？问题倒在于：为什么这些落后的国家倒成了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不能否认列宁、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是个社会主义国家。——我看，列宁的话很对，他说过，在我们俄国，革命开始了，打倒沙皇，打倒资本家，这比较容易，要建设社会主义，却很难，很不容易。我们现在来体会列宁的话，很亲切，很有意思。

S：你的意思是……

助：我想说的是这么一点，就是：当形势的发展，已经逼得你无产阶级不能不起来领导革命，而且革命的胜利已经就在你的面前的时

候，你无产阶级能说，这革命我放弃领导，这胜利我吃不消么？当然不能，当然不可以把这个革命和它的胜利让给资产阶级去享受。但是，当你夺得了这个胜利以后，你要建设社会主义，却并不象打倒沙皇，打倒资本家，打倒国民党反动派那样比较容易。

G：建设不容易，对，我也是这个意思。

图：照老助的说法，我们是……

助：我们是起点低，但这没有什么。我们可以积极而谨慎地干，我们一定能够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赶上人家，超过人家。可是不幸的是，在一九五七年以后，我们犯了一些错误。中间当然也有正确的东西，但错误的东西不少。加上林彪和“四人帮”，于是，我们不是前进，而是更加落后了。

图：苏联变修了，我们犯了错误，那社会主义国家……

助：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犯了错误，但并不是没有希望。我们打倒了林彪，打倒了“四人帮”。从今年起，要把工作中心转变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图：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已经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也正在逐渐缩小，但是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已经消灭了三大差别的。可见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任

务是很重的。

助：不。照我看來，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象美国，城乡差别、工农差别有明显的消灭趋势，可是还不能说已经消灭。现代美国的农业资本家，很大大地提高了农业机械化的程度，资本在农业中是大大地扩大了作用，已经转到广泛地使用机器的轨道上来，并且使用上电子计算机了，但是仍然是农业，并没有“工厂化”。

G：唔，这里有分歧。我不知道你说的“工厂化”是什么意思。如果农业中的“产业革命”已经实现，如果农业中从前是低位构成占优势，而现在已经不然，那么我们应当说工农差别是消灭了。

助：好吧，我们先不谈这个。我们可以说说三大差别。照我的看法，即使象老图所说，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三大差别有两个已经消灭，一个也正在逐渐缩小，而社会主义国家却都还谈不到，这也没有什么奇怪的。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原来就是要建立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的废墟上的，没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我们现在说的社会主义国家，原不过是说它，第一，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第二，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努力。并不是说它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包括列宁、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在内，要建成社会主义，就必须获得一种高

度发展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所已经拥有的。我们一定要走完这个距离，才能建成社会主义。从这个观点来看，斯大林在三十年代说他建成了社会主义是太早了一点。我们今天，是在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走去，并不是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换句话说，我们是在过渡时期，向着社会主义过渡，并不是已经造成了一个社会主义。

G：是啊，我们称呼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过表示我们是朝这个方向努力，并不是说我们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到今天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

助：可是，我们的教科书却不讲这一点。我们的教科书甚至也不讲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是如何为三大差别的消灭提供了基础。其实，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在自己的著作里说过，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是闹城乡对立、工农对立、体脑对立，另一方面是出现了三大差别的消灭趋势。没有那几个对立，不成其为资本主义社会；没有那几个差别的消灭趋势，也不能成为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

G：我们的教科书真应当改革。

S：现在的教科书是教人糊涂。没有这种教科书，我们倒好些。有了这种教科书，教的是一套，我们

想的是又一套，对不上号。

助：教科书要改革，但没有是不行的。翻开现在的教科书，马克思的时代，列宁的时代，这些现成的东西也没有很好地拿过来。如果要发表一点新见解，那就更难了。我想，教科书也应当百家争鸣，自

己的话自己负责。虽然教科书多半是编的，毕竟也可能有自己的话。那就自己负责好了。

图：老助，看来你有话要说，你就说罢。

助：不。今天已经很迟了，我们下次再谈。

---

## 政治与学术

政治与学术的关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在阶级社会中，任何理论学术、文化艺术，总是为一定阶级利益服务的；完全脱离阶级利益的纯学术、纯艺术确是没有的。即使是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也有一个为谁服务的问题。但是，政治不能代替学术、文化，它们是两个不同范畴。

由于在我国现阶段，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已经在阶级立场和世界观的改造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们在政治上为谁服务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他们是在为社会主义祖国服务的大方向下，积极地从事科学研究和艺术创作的。因此，广大知识分子在科学、艺术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不是政治问题，而是学术问题。即使

在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中出现政治上的错误，也应当进行具体分析。从过去二十几年的情况看，有的并不是什么“政治错误”，而是诬陷不实之词；有的是由于执行一条错误的政治路线的影响而造成的；有的则是由于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不自觉地造成了错误。即使是政治上的错误，大量的也还是人民内部问题；打着学术文化的幌子进行反革命政治活动，那是极个别的。

毫无疑问，我们要努力提倡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但是，我们不能把世界观方面的问题武断地归结为政治立场问题，更不能把政治问题都归结为敌我矛盾的问题。在文艺、学术问题讨论中，粗暴地做政治上的结论是最有害的。（摘自1979年2月2日上海《文汇报》）

# 怎样正确理解生产关系

吴学灿

于光远、苏星两同志主编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上册,现正重印,依据的是一九七七年版本,只是对绪言作了一些改动。其中主要改动的一处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生产关系的表述。本文想谈谈这方面的问题。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总称为社会关系。社会关系包含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指的是人们在生产总过程各个环节中的相互关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这是人所共知的。但是,生产关系的内容是什么,怎样研究生产关系,在经济学界却有种种不同的说法。此书的绪言一直沿用的生产关系的定义是“三分法”,这种“三分法”定义,是从五十年代初一直流行至今的。实践证明,它虽然不失为对生产关系的一个简洁的概括,但是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特别是对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研究,决不能按“三分法”进行。这是因为:

第一,所有制不仅包含人和人之间在生产资料的所有上相互发生的关系,而且包含它的实现形式。所有制关系不是一种独立的关系。不能把所有制这个具有丰富内容的、实际的、具体的生产关系问题,简单地归结为名称,变成空洞的概念。马克思很早就批评过普鲁东:“要想把所有制作为一种独立的关系、一种特殊的范畴、一种抽象的和永恒的观念来下定义,这只能是形而上学或法学的幻想”。<sup>①</sup>马克思还指出过,给所有制下定义,不外是把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描述一番。生产总过程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要讲清所有制,必须把生产总过程四个环节中人和人的关系统统描述一番。在任何一种所有制关系下,生产资料所有者都要实行对劳动从而对生产过程的支配和对产品的占有,否则,他们对生产资料的所有就不具有现实的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80页。

意义。奴隶主占有生产资料并且占有奴隶，如果他不使用奴隶，即不支配奴隶劳动，他就不成其为奴隶主。不久前，有人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对马克思这方面的有关论述作了不正确的解释。事实上是：马克思曾经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话：“主人不是在奴隶的购买上，而是在奴隶的使用上，证明他自己是主人”，接着，马克思就指出：“资本家也不是由资本所有权——那给他以购买劳动力的权力——而是由劳动者即工资雇佣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使用，来证明他自己是资本家。”<sup>①</sup>难道马克思讲得不对吗？难道这能说成是“四人帮”炮制的“谬论”吗？

第二，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中，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关系居于起决定作用的地位，其次就是分配关系。虽然如此，却不能排除交换关系。流行的说法把交换（流通）排除在生产关系之外是不对的。和分配、消费分为生产本身的分配、消费与产品的分配、消费一样，交换也分为生产本身的交换与产品的交换。生产本身的交换，就是“生产本身中发生的各种活动和各种能力的交换，直接属于生产，并且从本质上组成生产。”<sup>②</sup>同样，生产要素的分配与生产资料的消费也是直接属于生产，并且从本质上组成生产的。于是，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生产总过程的生产、

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中，生产是首要的决定的环节，分配、交换、消费则是由生产产生并由生产所决定的。分配、交换、消费中所包含的生产本身的因素应该是合并到了生产中去的，而与生产并列的只能是产品的分配、交换和消费。

第三，所有制同人们在社会总生产过程四个环节中的关系是不能并列的。流行的说法，把生产、分配等关系同所有制并列在一起，就无法正确理解什么是所有制了。所有制是什么呢？所有制是通过人对生产的物质要素，包括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劳动力或劳动者本身的关系建立起来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它具体体现在社会总生产过程四个环节中人与人的关系上面。因此，所有制就是生产诸关系。

总之，我们必须正确地理解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 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该象现在《绪言》里讲的那样，它“包括人们在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关系，分配过程中的关系，交换过程中的关系和消费过程中的关系”。同时，《绪言》还指出：“所有制同人们在生产四个环节中的关系是不能并列的。所有制是通过人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1966年版第43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1页。



们对生产中物的要素的占有发生的人和人的关系，它具体体现在生产四个环节中人与人的关系上面。”

二十多年来，由于我们恪守“三分法”，狭隘地、简单地理解所有制，以致把所有制问题仅仅归结为生产资料的归属问题，而不去研究社会生产统一体中的生产关系，即不研究它在和生产力的矛盾统一体中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不研究它的本质和发展规律性。于是，公有制成为形式上的公有制，按劳分配——公有制的实现，也还只是停留在形式上。由于不能理解所有制的实质，因而把生产资料的归属看成是独立的决定一切的东西，以为在完成了三大改造，建立起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以后，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就只是进一步把集体所有制提高为全民所有制了。这样做的结果，使得生产关系、所有制脱离生产力的实际情况。不是由生产力的实际情况决定生产关系、所有制，使其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需要，而是人为地规定生产关系，根本不顾生产力的实际情况，以为凭主观臆想出来的“革命”，就可以促使生产大大发展，社会大大前进。这就陷入了唯心主义的唯意志论的泥坑。现在是我们走出这个泥坑，向新长征迈开大步的时候了。

我国是有几千年封建社会历史的国家，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又是

建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的基础上的。面对极其落后的生产力，我们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应该如何建立并不断发展，才能真正符合生产力的实际情况，从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呢？二十几年的实践迫使我们重新思考这个问题。从二十几年的情况看，全民所有制实质上成了国家所有制，曾经出现过的几次变动，只是把国家的中央政权的一部分权力交给国家的地方政权，没有进行过实质性的改革。在全民所有制企业中，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不管生产搞得如何，都是同样级别同样工资。“干不干，一天三顿饭”，“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就是群众对这种制度的形象描绘。这种制度，不是生产决定分配、交换、消费，而是彼此无关、毫无联系。在集体所有制企业中也一样，生产队的自主权遭到破坏，社员物质利益没有保障。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后，公社成了一级地方政权，公社的负责人是有固定工资的国家干部。这些负责人工资的多少与公社的生产情况没有关系，被农民称为拿“铁饭碗”的人。由于公社的生产与负责人的收入分配没有关系，因而容易使这些负责人对生产瞎指挥，造成生产被破坏，社员生活贫困的恶果。但是，这种破坏生产力的做法，却被有些人称赞为“使

## 江丰为北京“新春风景静物画展” 所写的《前言》

在艺术为人民群众、为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服务的大前提下，为了促进艺术创作百花争艳蓬勃发展的繁荣局面的到来尽一份力量，我赞成举办这个以油画为主的风景、静物展览会。

参加展览会的作者（包括已去世的），有老一辈画家和中年青年画家，共四十多人。这批自由结合起来的画家的展品，大家协商不设审查制度，是为了更好地加强画家个人对社会对人民的政治责任感。

这个展览会定名为“新春”。画家们正在热烈地讨论酝酿，可将这种展览方式固定下来，甚至可以自由组成“画会”，计划每年举行一次或数次各种题材作品的展览会。

这个作法很好。自由结社，是在我国宪法上明文规定赋予人民的合法权利。而且画会是一种有利于艺术发展的组织形式：一、繁荣创作；

二、促进艺术作品的风格、体裁和题材多样化；三、可以起鼓励画家们在艺术上互相学习，互相竞赛，互相提高的作用；四、有更多的机会把艺术作品拿到群众中去，接受群众的评论；五、还可以标价出售，以解决画店不收、宾馆不挂油画这种不符合百花齐放方针的作法，而造成画家再生产的经济困难问题；六、这种展览将来还可以逐步达到经费自筹，无须政府补助。对发展艺术创作有这么多好处的“画会”的这种组织形式，应该大力提倡，办得越多越好。这一定会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赞助和支持。

我热烈地预祝这个展览会成功，并希望油画界同志们更加团结，深入生活，解放思想，敢于创新，勤劳工作，多出作品，为油画艺术的大活跃、大提高努力奋斗！

---

集体所有制具有全民的因素”，“为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创造了条件”。

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中，要使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地总结过去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提出符合实际情

况的观点和意见，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掌握社会主义公有制促进生产发展的规律。这样，我们的经济理论工作才算是为四个现代化尽了一分义务，做出了一分成绩。

# 读马雅可夫斯基 《列宁》诗的断想

良化

被斯大林称为“苏维埃时代最优秀的、最有才华的诗人”的马雅可夫斯基曾写了不少热情讴歌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及其革命的诗篇。长诗《列宁》就是他最著名的一篇作品。

这首长诗，是在1924年列宁同志逝世后不久写出的。它以澎湃深沉的感情和战鼓般的节奏，唱出了对无产阶级伟大导师的崇高赞誉和深切怀念。在所有的对列宁的颂歌中，它称得上是写得最好的。就是在五十多年以后，我们读起它仍然深受感染。尤其可贵的，是长诗在赞颂中所勇敢坚持的科学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

列宁是个伟大的人物，但他的诞生并非由于某种超自然的意志或偶然的幸运。诗人把领袖的出现放到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通过对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所有制矛盾发展的概括描述，看成是当时欧洲和俄国阶级斗争客观发展的必然产物，

是时势造英雄。对于列宁主义的建立和发展，诗人同样摒弃那种宗教式的“天才”论点，不是当作天上掉下来的信条，而是看作从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中总结、集中起来的客观真理。诗中写道：“充满着群众

的力量和思想，列宁也和阶级一同成长。”

特别是，诗人以大无畏的气概和尖锐的笔锋，反对了把列宁同志帝王化、神仙化、偶像化的唯心主义、机会主义态度。他写道：

难道描写列宁

也能够

来这么一手：

“啊！上帝恩赐的

天才领袖？”

不！假如他真是

帝王、

救世主，

我会由于狂怒，

一切都不顾，

我会冲入

送葬的队伍，

把顶礼的人群

迎头拦住。

我要把

最响亮的

诅咒的字眼

找到，  
当我  
和我的呼声  
被踩成肉酱的一刹那，  
我要把  
读神的话  
炸弹似的  
掷上云霄，  
向克里姆林宫  
怒吼：

“打倒！”

这些年来，每当我读到这火一样真挚、强烈的诗句，总感觉自己的心扉被它深深地感染和敲动。列宁同志当然不是帝和神，正如马雅可夫斯基所描述的，列宁是“在人间生活过的所有人中，最深入人世的一个”，“他不论大事小节，都和人民一致，他比面包还要朴实，他比钢轨还要正直。”

作为一篇诗，即使是长诗，作者也不可能系统地理论上阐述列宁在阶级队伍中成长的过程和列宁主义从实践中丰富发展的全貌。但是，《列宁》诗中难能可贵地用诗的语言表达了科学的精神，始终把列宁作为一个人去塑造。这不但在文学创作中是不多的，而且在其他形式的对领袖的宣传上也为近些年来所少见。这一点，是我们今天阅读《列宁》所感受最深的。

在宣传中，包括在文艺创作中，

是把领袖变成神，还是当作一个人，是持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还是抱宗教迷信的态度，这不是一个小问题。说到底，这是维护还是损害革命领袖的问题，是真高举还是假高举的问题。马雅可夫斯基把列宁写成一个人，并没有减少列宁的威信和光辉。而且我想，《列宁》诗之所以打动人心，脍炙人口，很重要的就是由于坚持了科学精神。可以说，要想形象、亲切、生动、丰厚地再现领袖人物的光辉形象，必须坚持科学精神。这种严肃的创作态度，这种科学的宣传方针，是于领袖有益的，是于革命有益的，是受人民欢迎的。

这些年来，林彪、“四人帮”假高举以骗人，借高举以营私，在宣传上大搞极左、形而上学，把领袖当成“神”去歪曲，干了大量的坏事。毛主席早就对此十分反感，说是“讨嫌”！他们这样做，当然不是拥护领袖，更不是什么“高举”，事实的发展已经做了最有力的否定。他们那种不老实、反科学的宣传，一损领袖形象，二害革命事业，三为人民群众所厌弃，真是有百害而无一利。这种反科学的宣传方针，亟待我们从理论和实践上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恢复科学。

重读马雅可夫斯基诗《列宁》，  
此其时矣！

---

# 略论大仲马的 《基度山伯爵》

张 英 伦

---

法国作家亚历山大·大仲马（1803—1870）的长篇小说《基度山伯爵》（旧译《基度山恩仇记》），一向受到我国读者的喜爱。最近，这部小说的中译本再版，又引起人们浓厚的兴趣。

但是，由于一种不可靠的传说，使一些读者对是否能够肯定这部书产生了疑惑；有人甚至简单地推论说：如果敌人说它好，那么它想必坏。

其实事情并不这样简单。一部好书，人民群众理所当然地赞扬它，同时反动阶级也别有用心地为它捧场，这种情况在中外文学史上都是屡见不鲜的，《基度山伯爵》的遭遇不过是其中一例。但是，只有人民群众才是文学作品的最权威的评判者。一百多年来，小说《基度山伯爵》一直在世界范围内拥有广泛的读者；无产阶级文学家高尔基称赞它是一部“令人精神焕发的书”<sup>①</sup>；而革命导师马克思最喜爱的小说家之一就是《基度山伯爵》的作者大仲马<sup>②</sup>。这一切表明，人民早已给这部小说作了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肯定评价。

人民评判一部书的好坏，总是首先检验它对人民的态度，看它在历史上有无进步的作用。《基度山伯爵》的中心内容，是水手

---

① 高尔基：《文学书简》给伊·亚·格鲁兹节夫，第84页。

② 见拉法格《回忆马克思恩格斯》和梅林《马克思传》。

邓蒂斯被告密而遭迫害，越狱后化名基度山伯爵报恩复仇的故事。按主人公邓蒂斯——基度山伯爵的经历，全书可分为蒙冤和报恩复仇两大部分，跨越波旁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两大时期。我们就结合这两段时代背景，分别考察一下小说两大部分的社会意义。

一八一四年，欧洲封建君主的反法联盟搞垮了拿破仑帝国，把在一七八九年资产阶级革命中被赶下台的波旁王室重新扶上王位。拿破仑帝国政府按其实质是资产阶级的政府。波旁王室复辟是历史的一个严重倒退。人民痛恨复辟政权，于是把流放在爱尔巴岛的拿破仑当作反复辟的象征，盼他归来。封建复辟与人民反复辟，构成波旁复辟王朝时期的主要社会矛盾。

大仲马笔墨所至，对王室复辟初期的这一主要社会矛盾作了不少点染和勾勒。在第一章（《船到马赛》）中，我们可以看到，水手邓蒂斯和船长摩莱尔对拿破仑的敬爱之情溢于言表。而在第六章（《代理检察官》）和第九章（《订婚之夜》）中，我们又可以听到贵族社会对反复辟人民的憎恨和惊恐的言谈。马赛代理检察官维尔福说：“爱尔巴岛上的拿破仑，离法国是太近了，由于他近在咫尺，他的党徒因此就有了希望。马赛到处是领了半饷休养的官儿（指前帝国官员——笔者），他们每天都为极轻微的小事借口和保王党吵架，所以上层社会之间常常闹决斗，而下层社会则时时闹暗杀。”其实尖锐的政治对立不仅在社会上存在，而且渗入了维尔福自己的家庭：维尔福死心踏地攀附复辟政权，他父亲诺梯埃却在主持推翻复辟政权的密谋。

然而，复辟初期的阶级斗争，在小说中主要还是通过水手邓蒂斯的蒙冤来表现的。

就在波旁王室复辟近一年后，拿破仑从爱尔巴岛回国“百日”复位前夕，邓蒂斯因为在返航途中曾去爱尔巴岛，替那不勒斯国王穆拉特（拿破仑的妹夫）送一个包裹给拿破仑；并且受拿破仑之托，还将送一封密信给正在策划起事的巴黎拿破仑党人，不幸

被人告密并被打入死牢。货船押运员邓格拉司和渔民弗南告发邓蒂斯，代理检察官维尔福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虽然有这样那样的个人动机——邓格拉司妒嫉邓蒂斯即将升任船长，弗南怨恨他“抢去”自己心爱的人，维尔福怕他传送密信的事泄露，牵连其父，殃及自身。不过，驱使他们这样干的根本原因，是他们在政治上都站在反动的复辟政权一边——邓格拉司和弗南，正如他们在告密信中自我供认的，“系拥护王室及教会之人士”；而维尔福本来就是复辟政权镇压人民的鹰犬。另一方面，受害者邓蒂斯固然不了解包裹和密信的内容，但他在感情上倾向于拿破仑，行动上参与了拿破仑的“百日”事变。邓蒂斯的蒙冤，象一个腾跃的浪花，以小见大地反映了激荡复辟王朝社会的政治波涛。

大仲马生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一位著名将领的家庭。从小就对资产阶级革命怀着亲切的感情，对封建制度深恶痛绝。波旁王朝复辟后，他曾冒险去狱中，给两个因密谋反对国王路易十八而被监禁的前帝国将军送去武器和金钱。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爆发，他又拿起枪参加过街头的战斗。大仲马把他的资产阶级革命信念和反封建复辟的强烈情绪，都渗透入邓蒂斯蒙冤的故事中去。小说一开始，他笔下的正直、善良邓蒂斯就博得读者的好感，而阴险狡诈、爱拨弄是非的邓格拉司则引起读者的嫌恶。随着邓蒂斯冤案的铸成和发展，读者对蒙受飞来横祸的邓蒂斯越是同情，对耍弄阴谋诡计的邓格拉司、维尔福之流就越是痛恨。就这样，通过对邓蒂斯蒙冤故事的描写，大仲马鲜明地站在反封建的进步立场，猛烈抨击了复辟势力对反复辟人民的残酷迫害。

邓蒂斯在死牢里捱过十四年，于一八二九年即复辟王朝覆灭前一年越狱。但他直到一八三八年才得偿复仇的夙愿，这时已是七月王朝的中期。七月王朝时代掌握统治权的不是整个资产阶级，而只是其中的一个集团——金融贵族。“他们盘踞王位，他们在议会中强订法律，他们分配从内阁直到烟草局的各种官

职。”<sup>①</sup>其他各阶级与金融贵族的斗争，居于社会矛盾的首位。

从邓蒂斯蒙冤到复仇的二十三年里，他的三大仇家步步高升。邓蒂斯化名基度山伯爵来到巴黎时，他们正是七月王朝金融贵族统治集团中红得发紫的人物：邓格拉司是金融界巨头、众议员，弗南以马瑟夫伯爵的名义从事实业、厕身于贵族院，维尔福高踞于巴黎首席检察官的宝座。这三位金融、政治、司法界的显贵，构成七月王朝统治集团的一个典型的缩影。

对于这些被七月王朝上流社会引为骄傲的“精华”，大仲马以犀利的笔勾划了他们每个人发迹的丑恶历史。邓格拉司在拿破仑从爱尔巴岛归来后就畏罪逃到西班牙，靠倒卖军粮成为暴发户。复辟王朝末年，他为行将垮台的国王筹款而得宠，受封为男爵。在金融贵族掌权的七月王朝，这位银行家更是纵横捭阖，大显神通，甚至让妻子勾搭内政部长的秘书，探测政治风向，以利金融投机。弗南于拿破仑“百日”复位期间在战场投敌。波旁复辟时他成为少尉。这个西班牙移民，在法西战争时竟去对祖国人民作战，并因帮西班牙保王党上台有功，升为上尉，获伯爵头衔。土希战争中，他身为希腊总督的三军总监，当上了中将。维尔福在一手铸成邓蒂斯冤案以后，就去向国王报告拿破仑打回法国的计划，受到嘉奖。第二次复辟期间，他更卖力地为王室效命，向人民实行反攻倒算，步步升迁。此刻，他又成为七月王朝镇压人民的刽子手。在大仲马笔下，这些当权者的历史满纸卑污，他们的金钱、纹章和顶冠，无不浸透着人民的鲜血。

《基度山伯爵》写作和发表于1844—1845年，那时是七月王朝统治的后期，它敢于通过这三个反面人物的刻画，对本朝统治阶级的罪恶作这样切中要害的针砭，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邓格拉司等人的丑史，作为形象的历史材料，也有助于我们领会马克

<sup>①</sup> 马克思：《1848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94页。



思的论断：七月王朝金融贵族不过是“流氓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社会上层的再生”。<sup>①</sup>

《基度山伯爵》以大部分篇幅描写它真正的主人公基度山伯爵的报恩复仇活动。他巧妙而又严厉地惩罚了自己的三个仇人：他让爱金钱胜于生命的银行家邓格拉司在金融投机中一次次蚀本，直至彻底破产；他揭发好以其高贵身世自炫的马瑟夫伯爵叛卖希腊总督的卑劣行径，使之身败名裂；他把以“铁面无私”的执法者自居的维尔福作为杀人犯推上被告席。

“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sup>②</sup>正是在基度山伯爵的报恩复仇行动中，蕴含着大仲马所要弘扬的社会哲理，也就是小说的主题思想：赏善罚恶。

赏善罚恶的观念，古已有之。不过，不同时代、不同阶级、乃至不同个人，分辨善恶的标准和赏善罚恶的主张是千差万别的。

中世纪法国宗教文学把笃信虔诚、安贫守命视为善，而把不敬神灵、犯上作乱视为恶。它的“赏善罚恶”是维护古代封建社会的理论。

大仲马同时代人欧仁·苏在长篇小说《巴黎的秘密》中，也宣扬赏善罚恶，但他要罚的大多是社会底层的人，而且他不仅把惩罚的权柄，也把奖赏的权柄交给司法部门。这种依赖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赏善罚恶的方法，显然是虚伪的。所以马克思斥之为“维护社会的新理论”<sup>③</sup>。

大仲马的《基度山伯爵》则不同。它的主人公专门惩罚反动统治集团中的大人物，这些人是他的私敌，也是广大人民的公敌；

---

①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96页。

② 《恩格斯致斐·拉萨尔（1859年5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43页。

③ 《马克思论艺术》第3卷第78—79页。

他以“复仇之神”的姿态，对那些做尽坏事而不受惩罚的统治阶级“施行我的法律”，这恰恰是对反动统治阶级“赏善罚恶”的否定。总之，小说《基度山伯爵》通过主人公的赏善罚恶，反映了广大人民对七月王朝赏恶罚善的不平世道的愤懑，表达了他们对实现社会正义的渴望，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

以上表明，这部小说的主流是好的。但也应该指出，由于大仲马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局限，这部小说的思想内容存在着不容忽视的严重缺陷。

首先，尽管基度山伯爵的赏善罚恶是正义的，但他的方法却是实际上不可行的。他声称“我用两种东西来达到我的希望——我的意志和我的金钱。”实际上，他能复仇，全仗着他有一座“比金山还值钱”的小山。在他报恩复仇的每个关键环节，都是金钱起决定作用。他甚至可以干脆用无限透支搞垮邓格拉司的银行。他所揭示的，归根到底是用金钱来赏善罚恶的方法。金钱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诚然有极大的魔力。小说中邓格拉司为便利金融投机，甘心让妻子私通内政部长的秘书等情节，就是对金钱魔力的很好的写照。但是，当大仲马要用金钱来纠正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世道时，他就陷入了妄图用金钱势力反对金钱势力、用金钱统治代替金钱统治的矛盾。忘记了他笔下的邓格拉司这句颇有道理的话：“要弄倒我，必须有三个政府垮台”。幻想在不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下达到社会主义，这是大仲马资产阶级局限性的最主要表现。

任何唯心主义都必然要导致相信灵异。大仲马也没有逃脱这个规律。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明明“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sup>①</sup>而他偏要主人公拥有一笔干干净净的金钱；明明只有反动统治阶级占据着大量财富，而他偏

---

<sup>①</sup>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29页。

要正义者成为最大的富翁；明明金钱只能作恶，而他偏要金钱行善。为了使这一切违反现实的事情显得“天经地义”，他便请出上帝：是上帝从天上掷下一笔干干净净的金钱，让它落到正义者手边，用它去罚恶赏善。邓蒂斯原不相信上帝，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上帝。不曾遇到过任何事物可以使我相信他的存在。”但是，自从他奇迹般地获得狱友馈赠的世间“闻所未闻的绝大财富”以后，他不但信仰起上帝，而且俨然以“救世主的一个使者”自命了。基度山伯爵每一次赏善罚恶，都是按照“上帝的伟大计划”行事的。随着他赏善罚恶行动的进展，小说笼罩着越来越浓厚的神秘主义气氛。全书结尾，大仲马甚至通过基度山伯爵之口劝告人们：“在上帝揭露人的未来以前，人类的一切智慧是包含在这四个字里面的：‘等待’和‘希望’。”这种宿命论的说教，更是荒谬而又有害。

每个阶级的作家都按照本阶级的理想塑造英雄人物。因此毫不奇怪，大仲马赋予了基度山伯爵以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超人意志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信条。基度山伯爵是“超人”，他象天马行空，独往独来，无所不晓，无所不能，甚至能起死回生，预卜吉凶。他又是阴谋家，他的某些行为，例如教唆维尔福的妻子下毒，结果害死老仆和儿童，不仅超出了复仇的限度，而且做法也极其卑劣。

对《基度山伯爵》思想内容上这些严重谬误，我们必须给以有分析的批判。但是总观全书，毕竟瑕不掩瑜。

谈到这部小说的艺术性问题，首先要指出，大仲马是个报章连载小说家，《基度山伯爵》同他的大部分小说一样，专为报章连载而写。这就决定了它的基本艺术特点。

报章连载小说受两种因素制约：第一，它必须面向尽可能广泛的读者，适合他们共同的爱好，而读者大众的共同爱好是听故事；第二，要使爱听故事的读者们每期都“有所得”，它必须有大

量连续不断的情节。

小说《基度山伯爵》正是以情节取胜。它充分显示出大仲马设计情节和编排故事的出色才能。蒙冤的主人公入狱后是死是活？越狱后能否报仇，如何报仇？这是读者最关心的。大仲马就紧扣着这条主线，密布下一连串的情节。在婚筵高潮上，邓蒂斯突遭飞来横祸；在绝望的死牢里，他又获得不期而至的遗产；在罗马广场上，临刑的犯人当众从绞架上得救；在邦杜加客栈里，卡德罗斯夫妇图财害命的腥风血雨；维尔福活埋亲生子的可怖之夜；马瑟夫伯爵出卖希腊总督的往事；吝啬的邓格拉司在匪窟受敲詐的大快人心的场面……数以百计的这类精彩情节，出人意外而又入情入理，富有奇遇色彩而又不给人荒唐之感，以强烈的吸引力牵动着读者步步入胜。

在这部小说里，很少大段的心理描写和长篇的景物描写。它基本上只有两种要素：人物的言语和动作。但其中的人物并不因此而缺少性格特征。大仲马这位早年曾以戏剧创作闻名的作家，极善于通过人物的一句话、一个表情来揭示其内心世界和内在品质。试看第一章《船到马赛》。抵达港口的邓蒂斯和邓格拉司只不过分别同前来接船的船主交换了三言两语，然而他们迥然不同的品质和性格已跃然纸上。小说也不因此而使人感到背景空虚。因为随着主人公的奇遇，一忽儿是阴森的地牢，一忽儿是光怪陆离的匪窟，一忽儿是人迹罕到的海岛，一忽儿是大都会巴黎，一忽儿是狂欢节的罗马，一忽儿是备受战祸的希腊，场景不断变迁，使得全书的地方色彩和环境气氛显得相当浓烈。

作为讲故事的能手，大仲马写来滔滔不绝，有声有色，娓娓动听，但决不雕凿，决不追求绮丽的词藻或故作艰深，而是力求明晰、流畅。

总之，《基度山伯爵》并不具备高超深奥的哲理、光焰万丈的气势、详征博引的史料，它只是以通俗的文学形式表达了普通人

关于善恶的人之常情。“通俗小说”——资产阶级轻蔑地这样称呼它。“通俗小说”——我们也这样称呼它，但带着赞赏的意味，因为这是一部从内容到形式都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书。

## 《李四光文集》

李四光同志是我国卓越的地质科学家。他首创的地质力学，对我国矿产资源的普查勘探、地震的预测、地热的利用，特别是我国东部新华夏系各大油田的发现，起了重要作用。

在李四光同志逝世后，根据周总理指示成立的李四光遗著整理小组，曾整理了部分著作。在此基础上，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地质力学概论》、《天文·地质·古生物》、《中国第四纪冰川》、《区域构造分析》、《旋扭构造》、《地震地质》、《地质力学工作方法》等书；地质出版社出版了《论地震》和部分内部讲话材料。

但据初步了解，李四光同志关于地质科学的论文、专著有一百八十余种(篇)，数百万字。他的早期著作，主要是关于地震、古生物的，特别是关

于瓣科的，一般都用英文发表，散见于国内外地质科学刊物上，或以单行本出版。中、后期主要是有关冰川和地质力学的著作，有以英文发表的，也有以中文发表的。这些著作都应该收集、整理，予以出版。

现在国家地质总局已成立《李四光文集》编委会，收集、翻译和整理这些著作，将依发表时间顺序，分为若干卷出版。

编委会以李四光的学生、地质学家许杰同志为首，参加者还有李四光的学生、地质力学研究所的孙殿卿同志和李四光的女儿李林同志等。编辑工作者有地质力学研究所、国家地质总局规划院、武汉地质学院地质力学系等的有关人员。

# 《根》

杨静远

1976年秋，美国出版了黑人作家亚历克斯·哈利所写的一部家史小说《根》。作者自称他经过十二年的考证研究，追溯到他的六代以上的祖先昆塔·肯特，一个从非洲西海岸被白人奴贩子掳到北美当奴隶的黑人，描述了他在非洲的自由人生活，他和他的子孙在美国奴隶制下的苦难历程，以及这个家族获得自由后的经历。这书一出版，就成为脍炙人口的畅销书。同时，它也引起了截然相反的评价，成为激烈争论的焦点。因此，关于《根》的问题，是一个带有高度社会意义和学术性质的事件，值得研究和探讨。

## 三本畅销书，一个老问题

《根》的主题，美国的黑人奴隶制问题，是美国历史上持续最久、争论最烈的一个论题。

从十七世纪初第一艘载着掳自非洲的黑人的运奴船驶抵北美洲海岸以来，迄今三百多年，黑人奴隶制和黑人受压迫的现象就一直是美

国社会的严重问题。早在独立革命前，美国南部的种植园黑人奴隶制就是美国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一个逆世界历史潮流的社会经济制度。到十九世纪中期，这种制度已成为美国政治和社会发展的最大障碍。维护奴隶制的反动势力和反对奴隶制的进步势力进行了旷日持久的反复较量，无穷的舌战和笔战所未能解决的，最后由真刀真枪的流血战争解决了。1861—1865年一场空前酷烈的国内战争，结束了这种“有史以来最卑鄙、最无耻的奴役人类的形式”<sup>①</sup>。然而，奴隶制的阴魂却象一团不祥的乌云，从来没有从美国大陆的上空消散。有形的枷锁不存在了，无形的枷锁——对黑人的压迫和歧视——仍然沉重地压在美国黑人的头上，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一个耻辱”<sup>②</sup>。奴隶制是美国老大难的种族关系问题的历史根源。因此，虽然奴隶制已被废除一百多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344页。

② 《列宁全集》第19卷第127页。

年之久，今天它仍具有现实意义，是人们所极为关注和不断探索的一个题目。

三百多年间，围绕着黑人奴隶制的争论而产生的政论和文学作品不可胜数。在美国文学史上，以奴隶制为题材的作品形成了一个专门的类别。它们的观点和色彩尽管千差万别，但总的可以分为揭露、谴责奴隶制的和歌颂、辩护奴隶制的两大类。其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可以举出三本代表作：一本是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汤姆叔叔的小屋》，一本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飘》，第三本就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这本《根》。这三本书，就其对各自时代的冲击来说，都是奇迹式的，它们不仅风靡了美国，而且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

虽然这三本书有着共同的题材，但它们的态度和观点却大相径庭。《汤姆叔叔的小屋》出现在美国内战前十年，它从基督教博爱思想和人道主义出发批判了奴隶制。虽然它的主旨并非倡导以革命方式消灭奴隶制，而是规劝奴隶主放下鞭子，但它以生动的艺术形象和强烈的爱憎揭露了奴隶制的野蛮残暴，对于北部的废奴运动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无怪林肯开玩笑地恭维它的作者斯托夫人是“写了一本书、酿成了一场大战的小妇人”。奴隶制废除七十年后，出现了《飘》。

这本名噪一时的小说从赤裸裸的反动奴隶主立场讴歌内战前南部生活，对被打倒的奴隶主寄以无限同情，成为美化奴隶制的所谓“木兰花与班卓琴流派”的顶峰与楷模，因而受到反动势力的喝采。四十年来，尽管有人不遗余力地加以哄抬，使之成为“一切时代的畅销小说”，但没有人否认，它是透过奴隶主的眼光来看奴隶制的，因而是地地道道的反动翻案文学的代表作。又过了四十年，《根》把《飘》翻过的案重新翻了过来，再次对奴隶制进行揭露控诉。这三本书所走过的“之”字形的道路，约略地勾划出了历史潮流的趋向。但历史不是简单的重复或循环。《根》的时代背景，比起前两本书来，是一个更为复杂的现象。它纵贯着几百年关于奴隶制的是非的争议，横联着黑人解放运动近期的发展和前景。因而，有关《根》的讨论，超出了一本书的范围，牵涉到许多社会、学术问题，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和实践检验的课题。下面仅从一个读者的角度谈一点粗浅的认识。

### 《根》是一本什么性质的书？

在讨论《根》时，首先需要明确的一个前提是：《根》是一本什么性质的书？是历史，还是小说？是一个单独的黑人家族的故事，还是美国奴隶制度史？这个问题本来是十

分清楚的。但由于《根》的出版者和宣传者们不知出于什么考虑，把这本分明是文学创作的书算作非小说的历史书籍，并且把它的意义抬高到代表全体美国黑人的经历，这就造成了概念上的混乱。现有的一些对《根》的批评，实际上是针对一本严谨的科学著作提出的。但《根》并非科学著作，它虽然部分地反映了黑人奴隶的苦难，却并不能概括二千多万美国黑人几百年经历的全貌和实质。如果从实际出发，承认《根》是小说，那就允许虚构和想象，而不必深究材料是否完全准确和立论是否绝对科学。如果承认《根》仅仅是一个单独的黑人家族的故事，那就允许有特殊性，而不必要求它具有代表全体美国黑人的典型性和普遍意义。《根》作为一本历史题材的小说，从一个黑人家族的遭遇和感受来反映奴隶制，站在被压迫者的立场上谴责和控诉压迫者和人压迫人的制度，把白人种族主义的历史观颠倒了过来。它不是通过抽象的概念，而是通过活生生的人的故事表现了被奴役者的痛苦和求解放的强烈愿望，批驳了那种广泛流传的把奴隶制描绘成田园牧歌的乐土，把奴隶表现为乐天知命、俯首帖耳的奴才的反动谰言，是有它的积极意义的。从这一点上说，《根》继承了《汤姆叔叔的小屋》的废奴文学传统，并有所创新，在美国

文学史上应占一定的地位。但是，如果把这本书的意义拔高为全体美国黑人民族的历史，夸大哈利所探索的“根”的普遍意义，并且把它看成是解决美国黑人现实问题的正确出路，那就言过其实，反而起到相反的影响。

### “根”在哪里？

贯穿着《根》全书的一个主题思想是：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知道自己是什么人，是从哪儿来的，而奴隶制最大的罪恶，是不让黑人知道这一点。哈利说，“我们因缺乏归属感而觉得身为黑人是可耻的”，因此，黑人要获得真正的解放，就必须找到自己的“根”。

哈利经过十二年的苦心探索，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根”——十八世纪非洲的村落和祖先昆塔·肯特。显然，他是把十八世纪非洲的生活理想化、浪漫化了。作为文学作品，这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哈利的意图是要打破那种把非洲人诬蔑为半人半兽低等动物的“人猿泰山”式的捏造，而还其人的尊严和价值，他的出发点和大方向是正确的。作者热情地歌颂了他的祖先——非洲劳动人民，抒写了他们如何英勇顽强地同大自然搏斗，团结一致，爱护集体，尊重传统，珍惜自由，严格地教育训练年青一代等优良品质。他以丰富的想象力塑造了少年昆塔



这个朴实而饱满的人物形象，刻画了他充满青春活力的个性，他对生活和自由的热爱和憧憬，给人以深刻印象。这是全书精华所在，堪称美国文学中独具一格的珍贵篇章。

但问题还要回到“根”这个主题思想上来。非洲是否就是美国黑人所梦寐以求的“根”？找到了这个“根”，美国黑人求解放的问题是否就迎刃而解？

固然，美国黑人和非洲有着渊远流长的血缘和传统的联系，他们无疑应该知道并且尊重自己的非洲起源。但非洲只是美国黑人人种学上的“根”，而不是社会学上的“根”。几个世纪在异国土地上受异族统治的历史，在美国社会的特定环境中共同的命运和斗争，已把美国黑人组合为一个新的民族，面对着不同于非洲环境下的新的问题。欧美有些研究者认为，黑人的处境之所以比一些欧、亚少数民族后裔更差，就是因为他们失去了民族传统和文化渊源，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但是，美国印第安人并没有失去自己的民族传统，他们却从北美大陆的主人沦为濒临绝种的民族，遭遇尤为悲惨。可见，割断民族传统，并不是统治阶级奴役被压迫民族的唯一的或主要的方式。美国黑人之横遭凌虐，不应归因于他们对自己的非洲起源缺乏知识和自豪感，而是由于美国奴隶制及其恶

果——种族压迫和歧视，以及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阶级压迫这个双重负担。片面地强调非洲的心理上的“根”，会使人忽视美国的现实的“根”。

是积极反抗，还是消极反抗？

如果说昆塔在非洲的自由生活是《根》的序幕，那么他和后代在美国被奴役的经历就是戏的中心和主体。关于这个关键部分的关键性争论，是围绕着《根》是否真实地反映了奴隶制的反动本质和奴隶的反抗精神。

每个奴隶的后代回顾往昔，都有一部斑斑血泪的家史。《根》既是从一个家族的遭遇和感受来反映一个历史时代，自有它真实的方面。书中体贴入微地刻画了被夺去自由和人权、受人鱼肉宰割的人们的痛苦和愤怒，特别是奴隶制强行拆散黑人家庭造成骨肉分离的惨剧，是动人心魄的。昆塔和他的子孙从来不甘于被奴役的命运，渴望自由，这也表达了所有奴隶的情绪。但是，如果把哈利家族的故事看成整个奴隶制的缩影，那么这面镜子却不够全面，也不够真实。因为它没有表现出美国种植园奴隶制最本质的方面——作为资本原始积累的手段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组成部分的野蛮的剥削制度，只消七年就耗尽一个奴隶脂膏的极度残酷的血

汗榨取。哈利的祖先不属于南部种植园中直接从事生产劳动的奴隶的主体——大田奴隶。他们是奴隶中地位较为特殊的人——园丁、车夫、厨娘、家仆、驯鸡手、铁匠等。由于他们脱离奴隶生产大军而从事非生产性个体劳动，以及同奴隶主朝夕相处的密切关系，他们往往享有某些优惠待遇，比起大田奴隶来受压迫的程度较浅，因而反抗性也较差，算不上是奴隶制这种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昆塔说：“白人干的最恶的事是不让黑人知道自己是什么人，不让他成为完全的人。”既然这是奴隶制的主要罪孽，那么自然也就是奴隶反抗的主要目的和形式了。于是在书中，主要的反抗表现为：每一代人把家族的非洲起源的知识传给下一代，让他们不要忘记本。然而这只能说是反抗的一种思想准备，还不是反抗的行动。事实上，一部奴隶制度史，满载着奴隶的无数次反抗，从最高形式的有组织的密谋起义（共二百多次），到逃亡、怠工、破坏工具财物等等。正是这些反抗，动摇了奴隶制的根基。《根》没有直接反映这些积极的反抗。书中虽然间接地提到海地奴隶起义以及震撼南部的几次大起义，但哈利的家族对待这些起义的态度或是消极的旁观，或是不以为然，唯恐起义引起的主奴关系的紧张化会给他们带来灾难。历史上的

奴隶逃亡，无论是通过“地下铁路”的有组织的逃亡或个别的逃亡，都是卓有成效的大宗的反抗形式。但哈利的六代祖先中，除来自非洲的昆塔试图逃跑而失败外，以后几代根本没有动过念头。第二代的吉西对抗主人的凌辱的唯一行动，只是告诫儿子不要对白人父亲抱幻想。第三代鸡公乔治则进而同主人兼父亲亲密合作。书中用了大量篇幅描写斗鸡的情节，虽然文笔生动而引人入胜，但观点上却带有浓厚的阶级调和论色彩。它抹杀了主奴之间的阶级矛盾和种族矛盾，把读者的兴趣吸引到斗鸡场上的胜负上面，那里，乔治和李老爷利害相关休戚与共，而乔治一家自由的命运则仿佛系于一只鸡身上。第四代铁匠汤姆来到了内战年代。这在历史上是南部黑人空前活跃的时期。奴隶们大批逃离种植园（共计五十万人），跑到联邦军中参加战斗，或在南部同盟军后方打游击搞破坏，有效地配合了联邦军的作战，为联邦的胜利和自身的解放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这些事实在《根》里也没有得到反映。当广大黑奴在进行如火如荼的斗争时，汤姆却在附首帖耳地替同盟军钉马掌，全家一心一意为赎买自由而拚命攒钱，直到林肯的一纸命令解放了他们。《根》所宣扬的这种以“沉默的尊严”对抗压迫的精神，只能算是消极的反抗。

比内战后经历的结尾部分，比起前面来，更有江河日下之势。内战结束后至今一百多年来，美国黑人广大群众饱受残害和欺压的苦况和他们不屈不挠的斗争，是举世皆知的事实，他们的积忿，爆发为六十年代震动世界的黑人抗暴运动。象哈利的家族那样买地发财、上升为中产阶级白领阶层的人，只是少数例外的幸运者。他们所走过的道路不能代表广大黑人走过的道路，更不足以指明黑人解放的出路和方向。

### 《根》的时代意义

《根》动笔于六十年代，完成于七十年代。六十年代是美国黑人解放运动惊雷乍起的十年，黑人长期受迫害受歧视的苦况，通过他们自己的斗争，引起了全世界的重视和义愤。毛泽东同志在1963年和1968年两次发表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的声明，表达了中国人民声援的强烈呼声。黑人的抗暴斗争和其他斗争，取得了不可忽视的成果，但并没有获得完全的平等和解放。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领域仍然处于受压制受排挤的不平等地位。在意识形态领域，反动种族主义势力仍不甘退场，千方百计为奴隶制翻案，为继续欺压黑人制造理论根据。1975—1976年，为纪念《飘》出版四

十周年重印了该书的豪华版，同时重映同名影片，大作宣传，无异是对黑人运动的示威。1975年，出版了一本名叫《时光与十字架》的伪科学著作。该书企图利用电子计算机的运算来证明奴隶制是一个“高度合理和有效”的制度，说它使南部经济高度发展并使全体南部人（白人和黑人）都享有很高生活水平，公然颠倒黑白，为奴隶制叫好。相形之下，《根》揭露和谴责奴隶制，给予这些反动叫嚣一个反击，在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中是能够起到一定积极作用的。但是，如果象有些人所宣扬的那样，认为《根》把黑人解放运动引向了一个更高的水平，那么这种估计却未必恰当。考虑到六十年代黑人运动已经达到的水平，考虑到黑人在有组织抗暴斗争中所表现的阶级觉悟和民族觉醒的程度，《根》所宣扬的非暴力主义和以家族为核心的个人奋斗道路，与时代的前进潮流相比，不能不说是一个后退。哈利从写马尔科姆·艾克斯的传记，到写《根》，也似乎是一个后退。

《根》引起如此巨大的轰动，原因何在？这似乎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在六十年代急风暴雨的黑人解放运动期间，黑人问题一度成为美国国内政治生活的中心。此后，黑人的政治和社会地位有所上升。近

年来，黑人更多地参与政治和文化生活，研究黑人，写黑人，表现黑人，成为一种时尚。黑人的历史也成为重新估价的对象。广大黑人关心自己的过去，要求把反动派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还黑人历史的本来面目，其他民族人民也要求获得这方面的更真实的知识。象《根》这样一本以黑人为主人公的历史小说，对奴隶制的反动性有所揭露，并具有一定的艺术特色和感染力，自然会引起广泛的重视。

然而，《根》作为一部历史小说虽有一定的价值，但和围绕着它所造成的宣传上的效果相比，则是不相符的。在这种明显的不相称的现象后面，必定存在着某种深一层的社会原因。据分析，由于黑人要求平等解放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赤裸裸的白人种族主义越来越不行时，意识形态领域的某些不希望运动走向革命化道路的当权者，也不得不顺应潮流，力图把黑人问题引向带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或改良主义色彩的轨道。这种分析不无道理。1978年2月话剧《保罗·罗伯逊》的上演就是一个例子。享有世界声誉的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在五十年代时由于他的共产主义信仰而遭到美国反动派的严酷迫害，流亡国外。然而在他逝世以后，美国资产阶级戏剧中心百老汇却演出了歌颂他的一生的话剧。该

剧抽掉了罗伯逊的革命者的灵魂，宣扬他作为足球明星、法学家、歌唱家、演员而功成名就的道路，避而不谈罗伯逊自己不断强调的一点：他首先是一个革命家，然后才是艺术家，他把自己的一切成就服务于黑人同胞的解放事业。这种给黑人问题涂上一层温和色彩的倾向，近年来蔚然成风。《根》之所以受到如此的重视和大规模的宣传，是否也是这种潮流的一个表现？这表明，和穷凶极恶地迫害黑人的年代相比，风向是在转，但转向何方，仍然值得研究。无论如何，这种现象本身也说明黑人通过自己的斗争获得了重要的进展，社会前进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

## 《屠场》的出版

二十世纪初，辛克莱写了一本揭露资本主义的小说《屠场》，找不到出版者。于是他和几个朋友组织了一个小出版社，出版这部小说。辛克莱亲自征求预约，杰克·伦敦也特地发表声明呼吁纽约市的社会主义运动给予支持。书出版后受到读者好评，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辛克莱后来又写了一些小说，也是由这个小出版社出版的。（扬）

# 林肯这个人

---

邓蜀生

发生在十九世纪中叶的美国内战(南北战争),是美国人民革命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这一伟大历史事件,给予了崇高评价。甚至在战场上的硝烟还没有消失净尽的时候,历史学家们和文学家们就迫不及待地开始用不同文字描绘这一激动人心的历史画卷,记录这一跌宕有声的壮丽诗篇。一百多年来,美国内战是得到最广泛评论和重视的世界性历史事件之一。

山东师范学院刘祚昌同志从1954年动手写作,迄1977年才最后完成的《美国内战史》,是我国史学界研究这一事件的力作。由于作者以锲而不舍的治学精神务期其成,我们才得以读到这本四十余万字、全面论述美国内战的专著。《美国内战史》的出版,是我国研究美国史的一个新成果。

本文不打算逐篇逐章来评介这部旁征博引、史料丰富、论述广泛的著作,只打算就评介内战时期历

史人物问题谈点读后感。

作者在《前言》中写道:“在美国内战中,黑种和白种劳动人民是革命的战斗力量及革命动力,他们的革命斗争象一条红线一样贯穿着整个革命过程。”因此,“作者力求在书中突出人民群众特别是黑人在革命斗争的每一阶段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只有黑种和白种劳动人民,才是创造美国内战历史的动力。”对于上升时期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作者认为应该坚持两分法,比如对林肯,“既肯定他之发布《解放宣言》的进步意义,又批判了他的动摇性和不彻底性;既肯定他在领导反对奴隶主叛乱者的武装斗争中的坚决性,又批判他在南方重建问题上对叛乱者的妥协性;既肯定他反对奴隶制的一面,又指出他在这里所表现的资产阶级局限性;他是从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及资产阶级的利益的角度去反对奴隶制度的。”

作者也的确在评介历史人物方面倾注了很大的笔力。对十九世纪

上半期的美国维赛、特纳等领导的著名黑奴起义，道格拉斯、加里森、洛夫乔伊等废奴主义者的献身精神，塔布曼、费尔菲尔德等“地下铁道”战士英勇机智的斗争，美国国会中以史蒂文斯为代表的急进派的活动等，作者作了不同程度的介绍。粗略计算，作为历史事件的重要角色而被描述到的有三十多人。读者欢迎这种把历史人物穿插在历史事件中的写法。读史而不见人，就如同观看舞台上空荡荡的“演出”；见人而不见主要的人物，就好比只见舞台上熙熙攘攘，看不出个所以然，纵有刀光剑影的阶级斗争，这样的历史也只能把读史者带进不同时代的庙会气氛中，看起来热闹，看不出门道。美国内战的中心人物是谁？林肯。

本书对林肯的总的评价（见《美国内战史》第481—483页）是中肯的。但是这些总的评价与前面关于林肯的大量论述缺乏逻辑的连贯性，有些问题的提法也还可以商榷。

评介林肯，不能脱离他所处的地位，他不是野的废奴派，也不是代表某一个州的国会议员，而是联邦总统；也不能离开当时的环境，这个联邦发生了南方奴隶主阶级打着州权论的旗号进行分裂联邦的武装叛乱，实质上是要把奴隶制加强给整个美国；在联邦主义和脱

离主义之间，还有几个地位重要而又动摇不定的边境州，这就是林肯所处的历史环境。林肯作为联邦总统坚决反对分裂联邦的任何行为，同时他作为美国新兴资产阶级的杰出代表，归根到底是不能容忍与奴隶制度“和平”共处（这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或长期处于对峙状态（这同样是不可能的，上升时期资本主义的特点在于它的活跃和进取，必然要为自己的扩张开辟道路），概括说，维护联邦的统一，代表当时是朝气蓬勃的资产阶级向奴隶制宣战，这是历史赋予林肯的任务。特定的地位、环境和任务，决定了林肯政治活动的主要方面。

在林肯的言论和行动中，维护联邦统一这一点是立场坚定态度鲜明的。可是在奴隶制问题上就不是那样前后一贯，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史家有不同的评论。林肯在他就任总统前两年多（1858年）发表的“裂屋”演说（这篇演说同他就任总统两年多以后即1863年在葛底斯堡发表的为时五分钟的著名演说齐名）中，朴素而明确地说道：“一幢裂开了的房子是站立不住的”。我相信这个政府不能永远保持半奴隶和半自由的状态。我不期望联邦解散，我不期望房子坍塌，但我的确期望它停止分裂。它或者将全部变成一种东西，或者将全部变成另一种东西”（着重号是引用者加的，下

同)。在这里林肯明确提出问题的实质是两种不同的制度谁战胜谁、谁来统治的问题。到1862年8月在他发表预告性奴隶解放宣言前夕，他又宣布：“我在这个斗争中的首要目的便是拯救联邦，既非拯救奴隶制度，亦非摧毁奴隶制度。……假如我对于奴隶制度或有色人种做什么事情的话，我之所以做，是因为我相信它将有助于拯救联邦，而假如我忍耐着不做什么事情的话，我之所以忍耐，是因为我不相信它将有助于拯救联邦。”在这里，林肯又把摧毁奴隶制度的任务从属于拯救联邦。如果考虑到南方诸州中有不少反对脱离联邦的奴隶主，在北方阵营里也有身为奴隶主的联邦主义者，此外还有在北部和南部之间观望风向的边境州等等，那末，把林肯的上述表态理解为出于策略上的原因，这并不是没有根据的。最有力的根据就是在他作上述表态四个月之后，1862年12月他在致国会咨文中明确指出：“假如没有奴隶制度，叛乱就绝对不会发生，而且没有奴隶制度，叛乱就不能继续下去了。”接着，正式的解放奴隶宣言发表了，这是在埋葬奴隶制的棺木上钉下的一枚巨钉。两年后，1865年1月31日，在林肯被刺前的两个多月，在他的领导和努力下制定的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在国会获得通过，从而在法律上埋葬了奴隶制度。

林肯在废除奴隶制的斗争中，排除阻力，稳步前进，最终完成了他所代表的阶级赋予他的使命。十分明白，发生在十九世纪中叶的美国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它的真正的领袖，不是作者在本书前面（第210页）所说的撒迪厄斯·史蒂文斯，而是作者在本书后面（第483页）所说的林肯。林肯是代表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行动的，未必是如作者所说只代表北方资产阶级中的“中间派”（美国作家桑德堡也持“中间派”论的观点）。急进派中不乏北方资产阶级中的先进分子，他们提出比林肯更激烈的纲领，但从全局的意义上，并不一定立即可行，因为还需要有一个排除阻力动员舆论创造条件的过程。这使人联想起另一位美国总统富·罗斯福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后期和四十年代初期的政治活动。罗斯福在国际法西斯势力日益猖獗并威胁到美国本身利益的情况下，却难以有所作为，国会内外孤立主义势力对他形成强大压力，而美国公众舆论也普遍要求美国隔重洋以自保。尽管罗斯福认识到美国势必要投身于这场反法西斯战争中，但他也只能谨慎地、稳步地缓慢前进。最后，还是珍珠港的炸弹声帮助他完成了艰巨的动员人民的工作。美国内战，在某种意义上说，更加复杂，敌我阵营不若对外战争分明，往往是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在联邦军中有南方脱离州的人，在南部同盟军中也有北方各州的人。参议员克里坦登的两个儿子，一个是北军少将，一个是南军少将。林肯的夫人有三个兄弟死在南部同盟军中。至于经济上的千丝万缕关系就更扯不清了。这些都是林肯行动谨慎的一些因素。1861年9月，急进派催促林肯发布解放奴隶宣言，林肯回答说：“一个人在前面走得太快而使全国跟不上，是没有好处的。”

评价历史人物看主流。林肯发布《解放宣言》，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作为美国总统，恐怕很难超越这个限度了，因此，马克思称《解放宣言》是联邦成立以来美国史上最重要的文件。本书作者认为林肯发布《宣言》“动机是很不纯的，完全是客观环境逼迫所致”（第278页），因为“动机颇为不纯，所以《宣言》本身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很大局限性及不彻底性”（第279页）。这种评价未免失之过苛。实际上本书作者对《宣言》发布的前因后果已经作了相当好的描述，无论如何很难与动机纯不纯这种提法挂上钩，应该说，这是本书的败笔。

林肯作为一个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我们不应该无视他所执行的政策剥削阶级烙印和偏见。比如他在当选总统前与道格拉斯的辩论中，表白在种族优劣的看法上他与

道格拉斯是一致的，他不认为黑种人白种人在社会和政治一切方面都能平等，他不同意给黑人以选举权、陪审权、担任公职权和黑白通婚。他的资产阶级种族偏见在后来的火热斗争中有所改变。比如在黑白通婚问题上，他在后来的另一个场合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我是不会同一个黑人妇女结婚的。如果一个白人愿意娶一个黑人妇女作妻子，就让他娶吧——只要黑人妇女支持他娶。”在1863年著名的葛底斯堡演说中，他公开宣布美国独立战争时杰弗逊的名言“一切人生来平等”，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一切人自然包括黑种人在内。虽然在黑人问题上，林肯是一步一步在前进，但是直到他1865年4月被刺身死前，他没有能解决或者说没有来得及解决黑人的选举权和分配土地问题。

此外，在林肯对待南方叛乱分子和暗藏在北方阵营中的反革命分子的政策是否过于宽大问题上，看法也不尽相同。本书作者认为林肯过于宽大。但是美国史学界中认为林肯在执行镇压权力方面已超过宪法所规定的权限者也大有人在。如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摩理逊、康马杰和鲁吞堡认为：“在内战期间林肯掌握的权力比任何英语国家的统治者——从克伦威尔到丘吉尔，所享有的权力都要大。如果林肯是柏拉



图所梦想的理想专制君主的话，那么从美国宪法的法律观点和实践意义来看，他却是一个独裁者。……林肯认为在联邦瘫痪的情况下，对宪法采取小心翼翼的态度是不明智的”（摩理逊、康马杰、鲁吞堡合著《美利坚共和国简明史》，1977年纽约版第284页）。林肯在说明他对破坏分子的坚决镇压政策时说：“难道我应该枪毙一个开小差的头脑简单的小兵，而不去触动他开小差的阴谋者的一根毫毛吗？”（出处同上。）据统计，在内战期间，联邦司法当局逮捕的表面效忠联邦实则进行破坏的“铜头蛇”分子达一万三千五百多人。对待被打败了的南部叛乱分子，林肯主张采取和平政策，以利于“迅速着手重建工作”。林肯的这一政策，与他维护联邦统一的思想是一致的。不论古今中外，在国内战争中，获得胜利的政权对自己的敌人采取和解宽大的政策以利于恢复和重建，是屡见不鲜的。当然这必须是战胜的一方确能牢牢地掌握住局势。象巴黎公社革命政权那样在自己的政权并没有巩固，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未最后解决时，对反革命分子采取宽容放纵的政策，那当然是致命的错误。但是，林肯在联邦军取得完全胜利的条件下，对参加叛乱的分子实行宽大，拒绝处死戴维斯、李将军等南部同盟首要分子，拒绝对南部实行

报复、惩罚和摧毁政策，以利于争取南方群众，消除敌对感情，这恰恰是林肯的高明之处。这是根据美国的具体国情和民情制定的政策，不能完全套用我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镇反、肃反以来的“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者受奖”等无产阶级专政政策。如果对南部采取类似对付战败国的办法，资产阶级中央政权未必能稳定，在动荡局势中，美国资本主义也未必会出现十九世纪后期的那种迅猛发展的局面。

林肯的功过是非最权威的评论者是美国人民。他去世已经一百多年，他的影响至今还存在。美国人民十分崇敬他。1962年美国《纽约时报杂志》举行过一次推选最得人望的美国总统的民意测验，林肯竟超越华盛顿居第一位，以下依次是华盛顿、富·罗斯福、威尔逊……。谈到这里，打算附带谈几句关于美国历史人物评价问题。评价历史人物总的原则当然是历史唯物主义，简言之就是实事求是。说来容易，做起来难。我们过去对美国历史人物或是避而不评，或是作简单化的政治鉴定。该肯定的不加肯定，因为是帝国主义头子。当然，在今天的形势下，也不要走到另一极端，一切都好，该批判的也不批判了。总之，要根据翔实的、充分的材料，经过认真研究，作出符合历史事实的评价。是白的不要说成黑

## 钱钟书的 《管锥编》

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钱钟书同志新著《管锥编》，已作为重点书列入中华书局的出书计划。此书是作者一生精力所萃的研究成果，它不限于比较文学，也接触到其他学术问题，但以文学艺术为主。讲到的书

有十部：《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史记会注考证》、《老子王弼注》、《列子张湛注》、《焦氏易林》、《楚辞补注》、《太平广记》、《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作者就这十部书中提出的问题，引用古代名著作比较，有时引用外国的名著或文艺论作比较。全书约八十万字。

的，是黑的也不要说成白的。我们应该坚决反对那种把历史比作千依百顺的小姑娘可以任凭人们去打扮的反动唯心史观。比如，硬要说罗斯福的“新政”散发着法西斯气味，这说不服人；同样，如果把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中的立场说成是公正无私仗义执言，也不能令人信服，因为都不符合史实。

话扯远了点，还是回过来再谈几句关于《美国内战史》的意见。本书的优点之一是史料比较丰富，但在材料的取舍繁简上还可作进一步的斟酌。第三篇《战后南方重建时期》占了一百一十多面，从1865年讲到1877年。这个问题严格说来已不属于内战史的范畴，而是另一个专题，如果本书不谈，另成专书，可能谈得更透更能有所发挥。书中最后部分《美国内战总结》，作者是

花费了气力的，对读者也有帮助。只是最后总结的五点教训，读来总觉得多少有点“穿靴”、“贴标签”的味道。在内战以南方的失败而告终后，美国奴隶制度已经被粉碎了。内战后美国南方的种植场经济已经不是过去意义上的种植场奴隶经济，它已经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一部分。1877年以后种植场主攫取了南方各州的政权，在以北方为主体的资产阶级中央政府的默认和纵容下，剥夺了黑人曾经争得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但毕竟不是复辟奴隶制度。本书作者用了许多“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在整个南方实现了复辟”等类辞句，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奴隶制度又回到奴隶主阶级手中了。事实当然不是这样。

1978年12月26日

# 克劳塞维茨和他的《战争论》

吴 艾 军

虽然很多人不曾读过专门的军事科学著作，但却有不少人熟悉“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句名言。它是德国资产阶级军事科学家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说的，曾被列宁评为马克思主义者探讨战争问题的理论基础（见《社会主义与战争》，《列宁全集》第28卷第284页）。最近，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这部《战争论》的中译本。

克劳塞维茨生于1780年，十二岁参加普鲁士军队，当士官生。1803年毕业于柏林军官学校后，即担任普鲁士奥古斯特亲王的副官。1806年参加了普法战争，当普军在奥尔施塔特会战溃败时被俘。1807年10月释放回国。1808—1809年任普鲁士军事改革委员会主席办公室主任。1810年10月起任柏林军官学校战略学和战术学教官，同时为王太子讲授军事课。1812年，因反对普鲁士臣服于拿破仑一世而转到俄军供职。拿破仑进攻俄国时，他参加过奥斯特罗夫诺、斯摩棱斯克和博罗迪诺三大会战。1814年4月回到普鲁士军队，后参加了林尼和滑铁卢会战。1818—1830年，克劳

塞维茨在任柏林军官学校校长的十二年间，致力于《战争论》一书的著作。他先后研究了1566—1815年期间所发生过的一百多个战例，撰写了许多评论战史的文章，整理了亲身经历的战争经验。1830年春由于调任炮兵部门工作，《战争论》的修订工作被搁置起来，1831年11月即因病去世。他的《战争论》手稿由其妻子玛丽于1832—1833年陆续整理出版。

克劳塞维茨所处的时代，正是欧洲工业革命、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相继发生的时期。工业革命改变了战争的工具与潜力，民主革命改变了军队的编组与精神，民族解放斗争改变了战争的性质与形态。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产生的新的社会关系，对于军事学术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正如列宁在《战争与革命》一文中指出的那样：“他们改造了全部战略体系，废除了战争方面的一切陈旧规章，创立了新的作战方法，废除了旧军队，建立了新的、革命的、人民的军队。”而当时的普鲁士还是一个落后的半封建的国家，普鲁士军队还保留着落

后的建军原则和军事学术原则与一支为数不多的雇佣军。在新型的法国军队的打击下，普军落后的军事原则遭到彻底的破产。这就促使普鲁士爱国的军人们用批判的眼光去重新考虑他们的战略战术观点。

克劳塞维茨虽然是普鲁士王国的军官，信仰的是落后的君主政治，对当时的法国革命持反对态度，但是他看到了法国革命对军事学术发展的巨大影响。1806年耶纳会战后，他就积极参加普鲁士军事思想和军事制度的改革，对封建主义的军事制度进行了尖锐的抨击。克劳塞维茨军事观点的理论基础是德国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特别是黑格尔的思想对他影响十分深刻。他接受了黑格尔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同时也接受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由于他深入地研究了战争的具体现象，使他在某种程度上违背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学说。他用辩证的思想方法在资产阶级军事科学中，第一次对战争和军事学术一系列现象的相互关系和发展过程作了详细分析。

《战争论》分第一、二、三卷。其中论述的问题包括战争的性质、战争理论、战略、战斗、军队、防御、进攻、战争计划等八篇，这些都是克劳塞维茨“经过多年的思考和对战争的热心研究所获得的果实”。（第一卷第13页）《战争论》

是在将近一个半世纪以前写成的，由于时代的限制，有些观点是过时了，但由于作者对战争问题的研究包含了丰富的军事辩证法，得出了许多至今仍然是正确的结论。

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一书最重要的贡献是通过战争与政治的关系揭示了战争的本质。他认为“政治是孕育战争的母体”，因为战争总是在一定的政治形势下产生，并由一定的政治动机所引起。不仅如此，政治还贯穿在整个战争行为中，对战争不断发生影响，因此，战争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是一种政治工具。当某种政治关系引起战争的时候，战争并不象人们通常想象的那样，使这种政治关系即告中断，出现一种只受本身规律支配的完全不同的状态，恰好相反，在这种情况下，“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第一卷第43页），战争不过是“以剑代笔”的政治罢了。在资产阶级军事科学中，克劳塞维茨第一次如此明确地阐明了战争的实质。

克劳塞维茨还深刻地揭示了精神因素在战争中的作用。克劳塞维茨批驳了那些忽视精神因素并把它排除在战争理论之外的庸俗看法，指出战争就是“双方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通过物质力量进行的一种较量”（第一卷第101页）。在战争中，精神力量与物质力量是完全融

合在一起的，相互作用，又相互助长，是“不可能象用化学方法分析合金那样把它们分解开的”。克劳塞维茨并且强调：物质力量只有在精神力量的鼓舞和充实下才能发挥作用，精神力量能够“使物质力量具有生命力”，“在战斗过程中，精神力量的损失是决定胜负的主要原因”。（第一卷第257页）克劳塞维茨揭示的精神因素在战争中的作用，对当时军事理论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

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对民众战争也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认为民众战争是增强对敌斗争的重要手段，在这种战争中人民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说：“一般说来，善于运用民众战争这一手段的国家会比那些轻视民众战争的国家占有相对的优势。”（第二卷第671页）由于人民参加了战争，于是战争获得了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性质，“战争要素从一切因袭守旧的桎梏中解脱出来，爆发出全部自然的力量”（第三卷第876页），带来了令人惊叹的成果。

克劳塞维茨在研究军事理论及其组成部分——战略学和战术学方面，反对军事学术中存在着“永恒的原则”。他指出，“各个时代有各个时代的战争”，而各个时代又有“自己的理论”（第三卷第877页）。这说明了战争理论要跟着时代的变

化而变化，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同时他认为理论的作用只应当是为指挥官提供思考问题的线索，不能作为代数公式到处套用；理论只能面向经验，根据战史提供的战例进行研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克劳塞维茨强调对军事理论必须具有批判的态度。他说：“如果认为理论能够把每一个抽象的真理都包括在内，批判的任务只是看看具体情况是否符合相应的法则，那也是一种幻想。如果规定，在批判时决不能侵犯神圣的理论，这就会是可笑的书呆子的作法。”（第一卷第146页）在论述战争的目的时，克劳塞维茨认为消灭敌人军队和保存自己军队是相辅相成的，是相互影响的，它们是“同一意图的不可缺少的两个方面”；但是他强调，“用流血方式解决危机，即消灭敌人军队，这一企图是战争的长子”（第一卷第64页）。在论述攻防关系时，他认为防御和进攻是整体中的两个要素，而不是孤立的两部分，它们是互相渗透，互为作用的，战争中“没有不带防御因素的进攻，而防御也照样包含着进攻的因素”。但是，克劳塞维茨强调防御是“一种较强的作战形式”，认为防御比进攻容易，它可以充分利用时机和有利地形，可以运用各种手段和抵抗方式。这种看法固然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从战争的全局来看，进攻是消灭敌人

的主要手段，是主要的；防御是消灭敌人的辅助手段和作为保存自己的一种手段，是第二位的。当然，克劳塞维茨在强调防御是较强的作战形式时，是坚决反对消极防御的。他说：“只有在力量弱小而需要运用这种形式时，才不得不运用它。一旦力量强大到足以达到积极的目的时，就应该立即放弃它”（第二卷第477页），“迅速而猛烈地转入进攻（这是闪闪发光的复仇利剑）是防御的最光采的部分”。（第二卷第495页）克劳塞维茨在资产阶级军事科学中第一个明确制定了交战和战局以至整个战争的实施原则，这里就不一一叙述了。

克劳塞维茨虽然能够把辩证法的基本原理运用于战争理论的研究，并得出一些正确看法，但他毕竟是一个资产阶级军事学家，一个唯心主义者，他的许多观点不能不受到阶级局限性的影响，他的辩证法是不彻底的，有些观点甚至是相互矛盾的。例如论述战争与政治的关系时，他把政治理解为政府或国家的对外关系，把政治看作是“整个社会的一切利益的代表”。他不了解任何政治和任何战争都渊源于经济，渊源于生产方式，渊源于社会制度，不懂得战争的社会性质和阶级本质，因此在论述具体战争时也就无法阐明战争的正义和非正义的性质。又如，他看到了物质力量

和精神的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看到了人在战争中的作用，看到了实践是真理的来源，但是，他又过分夸大统帅的作用，否认军事发展上存在的规律性，并断言战争是充满偶然性的领域和不确实性的领域，一切都必须靠天才来解决。这些显然是不正确的。

尽管克劳塞维茨存在着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但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对《战争论》一书仍然给予很高的评价。马克思在1858年1月致恩格斯的信中称赞克劳塞维茨的著作“有些著名的近乎机智的合理的看法”。恩格斯在同期致马克思的信中也写道：“目前我正在读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用哲理推究的方法是奇特的，但就书的本身来说是好的。”列宁在《社会主义与战争》一文中也称赞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手段（即暴力）的继续是至理名言，并且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始终把这一原理公正地看作探讨每一战争的意义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向就是从这个观点出发来考察各种战争的。”列宁还详细地研究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并作了摘录和批注。

遵照革命导师关于要努力学习和研究当代的和历史上的各种东西的教导，《战争论》中译本的出版，对于我们将会是有帮助的。

---

# 科学和民主的赞歌

写在儒勒·凡尔纳的科学幻想  
和探险小说重版的时候

郑文光

---

今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将要重版十九世纪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1828—1905）的八种科学幻想和探险小说（《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海底两万里》、《神秘岛》、《八十天环游地球》、《气球上的五星期》、《地心游记》、《蓓根的五亿法郎》、《机器岛》），我感到由衷的喜悦。五十年代，这八种译本陆续出版的时候，曾经受到当时的青少年读者很大的欢迎。但后来被那个所谓的理论权威下令禁止，这几种书就此停售停印。现在，在走向四个现代化的新长征路上，这些书也一定会受到新一代青少年读者的热烈欢迎的。

儒勒·凡尔纳的书，也许不能算世界第一流的文学名著，但是，它们无疑有着独特的艺术魅力，一百多年来，风靡了全世界。许多世界著名的科学家，包括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和星际航行技术的奠基者齐奥尔科夫斯基，都曾经生动地论述过，他们正是在儒勒·凡尔纳的小说的引导下，走上科学创造道路的。儒勒·凡尔纳的作品，是科学和艺术的水乳交融的结合，是生动地描绘先进的科学技术如何开拓新的世界的诗篇，又是科学和民

主的赞歌。

儒勒·凡尔纳的作品，为什么能够经过整整一个世纪、仍然在地球的各个角落受到欢迎而历久不衰呢？

首先，在儒勒·凡尔纳的科学幻想和探险小说里，包含有丰富的、各种各样的科学知识，而这些知识又不是枯燥的、刻板的叙述，而是生动地和作品的情节交织在一起。例如在《格兰特船长的儿女》里，书中的几位主人公沿着南纬三十七度线绕地球一周，他们经历过洪水、烈火、山崩、匪徒袭击、土人包围等险峻的考验，在这生动的故事情节中，字里行间渗透了十分丰富的地理知识。在《海底两万里》中，作者不管是对于海底生物界的描绘，或者对于潜艇的构造与运动原理的叙述（要知道，这本书问世的时候，潜艇还未诞生哩！），都是十分引人入胜的。《地心游记》是一部完全假想的科学幻想小说，其中认为通过火山口可以进入地球内部，而且地球深处又有已经绝灭的史前动物生活着，并没有什么科学根据，但是作者却以丰富的地层学和地质学知识把我们带进一个神奇的境界。《神秘岛》也是如此，一个气球可以携带五个人从北美洲一直飞到南太平洋，是很难令人置信的。（要知道，前不久才有人乘气球从美洲横渡大西洋到达欧洲！）但是，对于“林肯岛”的自然界，以及五个遇难的人为了征服自然所作的种种斗争，则是完全合乎科学的。《蓓根的五亿法郎》里提到德国的苏尔策教授发明了一种炮，它射出的炮弹每秒钟飞行十公里，这样的炮弹在力学上是不存在的（火药爆炸的推力使炮弹的前进速度不可能超过每秒三公里），但是这本书中关于“法兰西城”的设计和关于“钢城”的生产的描述却是完全真实的，作者十分准确地描绘了一个理想的和平城市和一个战争策源地的惊心动魄的对立。在《八十天环游地球》和《气球上的五星期》中看得更清楚，关于我们这个地球的各个地区的丰富的地理知识构成故事发展的主要线索。知识，在儒勒·凡尔纳的作品里，已经不是外加的东西，而



是情节的有血有肉的组成部分。

其次，儒勒·凡尔纳还在自己的作品里，塑造了栩栩如生的 人物。无论是《格兰特船长的儿女》中的法国地理学家巴加尔内，《海底两万里》中的尼摩船长，《神秘岛》中的五个遇难人，《地心游记》中的黎登布洛克教授，《八十天环游地球》中的旅行家福克和路路通，《蓓根的五亿法郎》中的马尔赛·勃鲁克曼、沙拉赛恩医生和那个念念不忘消灭世界上一切美的事物的战争狂人苏尔策，《机器岛》中的法国弦乐四重奏的四个音乐家，都写得十分有声有色。作者采用了浪漫主义的手法，把人物放在极其奇特的环境下活动，从而对人物性格作了多方面的、色彩浓重的刻划。例如黎登布洛克教授，他对科学事业的热爱、执着、顽强精神，古怪而暴躁的性格，是在深入地下探险这一特殊条件下展开的。他身上具有一切优秀的科学家的特征，我们从爱因斯坦到陈景润这许许多多科学家身上都感受到这种性格特征，但是，黎登布洛克又是十分独特的“这一个”。他生活的奇特的环境，个性化的语言，一个高潮接一个高潮的行动，都有助于充分展示一个不畏艰险、一往无前的科学先驱者的形象。相比之下，尼摩船长是另一个类型的科学家典型。他博学、冷静、沉着而机智，这是因为，他不是书斋里的学者，他是在反抗殖民主义斗争烈火中成长起来的民族志士，在祖国沦为殖民地后，他带领少数志同道合的同志潜入海底，继续帮助被压迫民族的斗争。这样，作者塑造了一个外表似乎是与世隔绝、“心如死灰”的隐士，实质上内心感情十分炽烈、时刻注视着世界政治风云的科学家的形象。马尔赛·勃鲁克曼又是一个另一类型的科学家，在一边是建设美好的和平生活、一边是处心积虑研制武器以毁灭这种生活的斗争中，他充当了一个深入敌巢、探索敌人机密的勇士，他仗着自己的胆略、技术知识和随机应变的灵活头脑掌握了敌人的机密，又终于逃脱了敌人准备施加的迫害，最后又一次深入敌穴，探明了敌人覆亡的秘密。因

此，马尔赛·勃鲁克曼的形象，是一个科学家兼战士的形象。

儒勒·凡尔纳也创造了一些形象鲜明的反面人物。《蓓根的五亿法郎》中的苏尔策教授，竟具有二十世纪法西斯战争狂人的若干特征，这是最可惊异的文学现象之一。要知道，法西斯分子的出现，是在二十世纪的德国，但是作者竟在这之前七十年就“预见”并且刻划了这个形象，我们在这个人物的身上发现了跟希特勒的惊人的相似性。整个《蓓根的五亿法郎》的风格，就象一篇寓言。

苏尔策这个典型人物的创造，是和作者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入的剖析分不开的，这又构成儒勒·凡尔纳作品的第三个特色：无情地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的本质，在作品里狠狠地鞭挞了贪婪的剥削和压迫、殖民主义的罪恶、政治上的巧取豪夺和欺诈。

《机器岛》在儒勒·凡尔纳的作品中是别具一格的。它写的是一个幻想的故事：美国的亿万富翁们建造了一个在大洋里航行的人造岛屿。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岛上两个大资本家分裂，这个人造机器岛最后不免于覆亡的命运。作者在这里十分辛辣地揭露了资产阶级表面上温文尔雅、背地里尔虞我诈的两面派嘴脸。

作者在许多作品中都大力谴责了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格兰特船长的儿女》一开始就是描写格里那凡爵士发现了格兰特船长的一份装在密封瓶子里的求救信，但是因为格兰特船长是苏格兰人，女王政府拒绝了由政府出面救援。作者十分尖锐地描写了统治阶级和人民之间的对立：

“求恩的人很少能走到王座面前的阶石下，因为英国人在王宫的大门上和他们在轮船的舵盘上一样，都写着：‘请乘客勿与掌舵人说话。’”

《神秘岛》和《海底两万里》中，作者借尼摩船长之口谴责了英

国殖民者在印度次大陆的殖民扩张罪行，并且热情地为这个被压迫和被奴役民族的代表者在大洋深处攻击英国军舰的正义行动辩护。在《神秘岛》中，作者态度鲜明地站在美国南北战争中力主黑奴解放的北方。在《蓓根的五亿法郎》中，作者正面阐述了他的理想：象法国医生沙拉赛恩一样建立一个和平美丽的城市——法兰西城，永远消灭疾病和贫困。

应当说，儒勒·凡尔纳毕竟是一个资产阶级作家，他有阶级的局限性。他生活和创作在暴风骤雨般的十九世纪后半纪的法国，他经历了路易·波拿巴的政变和法兰西内战，他亲眼看见巴黎公社在硝烟中诞生和失败，他也经历了普法战争与由于战争失败而导致法国人民的不满和愤懑。这些，在他的作品中都没有反映。他采取了另外一条创作道路。他用科学幻想和探险小说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些根本矛盾的反感，表达自己对民主自由和科学生活的向往。在他的作品中，科学和民主是不可分的两翼。他歌颂的是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境遇中绝不向命运低头的人，这些人的武器只有一个科学头脑和一双勤劳的手。他鄙视爵位和金钱。在他看来，金钱的用途如果不是用来为大多数人建立一种美好的生活，那就什么用处也没有。

儒勒·凡尔纳的创作所反映的时代离开我们已经有一百年了。他所描述的科学也已经过时。拿潜艇来说，尼摩船长的鹦鹉螺号比起今天的核潜艇来，几乎是小孩的玩具。搜索一个失事的船长，如今也决计用不着有如格里那凡爵士那样，经历横越南美大陆、澳洲腹地以及海上的颠簸。八十天环游地球在一百年前应视为壮举，如今却已经显得十分落伍了。《气球上的五星期》所描写的非洲大陆的景象，也和今天正在觉醒的非洲大不一样了。但是，科学上的过时，并没有使他的作品有所逊色。这点，就足以说明，儒勒·凡尔纳的作品，虽然包含了丰富的科学知识，但他并不是以科学知识取胜的，他的作品经久不衰的魅力，在于作品

中深刻的人民性，以及与科学知识结合在一起的民主主义精神。

儒勒·凡尔纳的创作思想的直接渊源，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思想、十八世纪法国唯物论的思想和十九世纪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因此，科学与民主之不可分，在儒勒·凡尔纳作品中是十分鲜明的特色。他所描述的科学，不是书斋里的科学，而是和探险、旅行、研究地球上丰富多彩的自然界的行动联系在一起，因此儒勒·凡尔纳的主角们也是这样一些掌握丰富科学知识而在世界各个地方行动着的人物。他们为什么而行动？有的，是为了救援难友，有的是为了寻求知识，有的是为了与大自然作斗争。儒勒·凡尔纳的主角们的主导思想是还处在资本主义上升历史阶段中的人文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因此，他们代表了当时历史上的前进方向。

当前，我国正处在历史的转折点，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斗争迫切需要科学，更需要民主，这点，在阅读儒勒·凡尔纳的作品中，是会获得教益的。

中国青年出版社原定的《儒勒·凡尔纳选集》中除了这八部作品外，还包括《从地球到月球》、《环绕月球》、《哈特拉斯船长历险记》、《十五岁的船长》等四部作品，因为文化大革命，出版计划中断了。我们希望，除了八部重版书外，其余四部，或者更多一些的儒勒·凡尔纳的作品（据说有两百多部！）将翻译出来，它们至今仍然是我国新一代青少年读者的优秀精神食粮哩。

## 日本的出版业

日本大约有三千二百多家出版社，其中十九家有一千人以上，六十四家有二百到一千

人，八十四家有一二百人。1977年出书三万七千种，70%是新书，其余是修订重版；杂志一千六百余种，发行量二十一亿十四万册，各种学报和官办刊物不包括在内。

# “控诉文学”及其他

(谈刘心武的《醒来吧，弟弟》)

林大中

刘心武同志发表了一些好作品，得到广泛的注意和肯定的评价。但有的作品也引起了一些议论，如《醒来吧，弟弟》。我们发表林大中同志的文章，希望能展开讨论。——编者

残害青少年的心灵，是“四人帮”最大的罪恶之一。对这一罪行的控诉，构成了《班主任》的重要主题。尽管偏重议论的手法限制了作品的艺术力量，但作者敏锐准确的目光和炽热激越的情感，使这篇作品获得了一定的思想深度和感染力。“救救孩子们”这一强烈的呼声，在广大读者中产生了积极的反响。遗憾的是，《班主任》以后的几篇作品，虽然主题依旧尖锐，语言依旧激昂，却掺杂了越来越多的虚假的声音，越来越牵强附会，脱离生活。《醒来吧，弟弟》，已经发展到虚构逻辑、背逆生活和艺术真实的可怕地步。

在“弟弟”身上，作者试图塑造一个充满矛盾的“沉睡的一代”的青年形象，一个由于对现实认识较深而看破红尘、消极遁世的青年形

象，一个“愤世嫉俗而又无所作为”的青年形象。作者试图指出：“四人帮”人鬼两面的卑鄙行径使弟弟学会了思索而开始“看破”，“四人帮”把毛泽东思想变成新宗教的滔天罪行又造成弟弟没有理想和信仰的空白心灵；对“四人帮”及其流毒的仇恨使弟弟“愤世嫉俗”，深受“四人帮”伤害而不能自拔又使弟弟只能“无所作为”。作者试图以此揭示“沉睡的一代”的悲剧本质，控诉“四人帮”的罪恶，唤醒沉睡的弟弟们。但是，在弟弟身上我们看到的，不是作为社会矛盾高扬的复杂形象，而是杂乱的概念复合中不能自圆其说的逻辑矛盾，是背逆生活和艺术真实导致的艺术逻辑的自相矛盾，尽管这些概念孤立地来看是正确的，有些甚至是尖锐大胆的。在作者和作者借“哥哥”之口强加给

弟弟的“沉睡”的标签下，我们看到一个被曲解了的“沉思的一代”的模糊影子，一个被任意支配的概念传声筒。

喝酒，弹吉他，听唱片，毫无目的地看一些书，经常三朋四友一起聊大天，或者独自一人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对一切都淡淡的，反对对任何事情太认真——这是一个弟弟，外在的、表象的弟弟。这个弟弟可以看作是沉睡的，也可看作是消沉的，但无论如何是漫画式的。

对报上那篇同“四人帮”斗争的青年英雄的报道，觉得“没什么大意思”，认为那个英雄“太认真了，结果闹到蹲监狱。其实有什么用处呢？”——这是作者开门见山“抛”给我们的弟弟，被作者试图先入为主地定下“沉睡”基调的弟弟。

从庆祝大会溜回来，喝酒聊天，闷声哼歌，却只因为庆祝的那个“大庆式企业”是假的；躺在床上出神发楞，却只因为朱瑞芹撕了车间谎报的产值表；听到卢书记说“朱瑞芹做得对呀！”“身子明显地震”，激动地、滔滔不绝地倒出了对“四人帮”流毒的尖锐抨击，倒出了对某些基层干部能否抛弃流毒的清醒怀疑；在和卢书记长谈的那一晚，思绪汹涌，不能成眠——这又是一个弟弟，作者着笔最多的内心深处的弟弟，不是对什么都不认

真，而是对一切本质东西十分认真，不是沉睡的，而是清醒的弟弟。

在卢书记面前回顾文化革命，回顾林彪、“四人帮”如何使他丧失了对一切神圣事物的信念而看破红尘；在哥哥面前同意说自己没有理想和信仰，“狂怒地一下子脱去背心”，插着留有伤疤的胸膛，大声喊出“受伤的不光是外头，是里头！”——这是作为作者概念传声筒的弟弟。

固执地责问卢书记“为什么这么卖劲？”又深夜找到哥哥问“老卢为什么不说不说那些个套话……”——这里弟弟又成了作者填补艺术空隙的工具。

倘佯街头，拿不定主意是不是走向“红尘”当质量检查员——这是最后被作者用“定身法”定在舞台上令人百思难得其解的弟弟。

沉睡的人不可能清醒，更不可能对任何事情认真。认为反“四人帮”的斗争没什么用处的人，又怎能发出清醒的抨击？——弟弟却既沉睡，又清醒、认真。消沉的人可能清醒，或安于消沉而自得，或因为消沉而苦恼，不一定认真。如果一个人仅仅因为看破了“四人帮”及其流毒的“假”而消沉，并且因为消沉而苦恼，苦恼到影响整个生活的程度，当他遇到象卢书记这样说真话、办真事的领导，当这个领导要

他走向“红尘”和大伙儿一块参加对“假”的斗争的时候，他不可能有所迟疑——弟弟却既因逍遥“红尘”之外而极度苦恼，又于这种时刻在“红尘”边缘徘徊迟疑。只有不自知沉睡的人才沉睡。因消沉而苦恼的人是因为理想和信仰受到了伤害。无论沉睡的还是因消沉而苦恼的人，都不会承认自己心灵空白——弟弟却承认。而且无论沉睡还是消沉的人，甚至那些妄图把老干部统统置于死地而后快的人，都不会对复出工作的老干部的干劲感到奇怪，更不会想去责问——弟弟却去责问。

让弟弟责问卢书记，是为了从卢书记口中引出那句“我爱咱们中国……”的点题警句。把弟弟“定”在街上继续徘徊，是为了慷慨激昂、最后画龙点睛地喊上一句：“醒来吧，弟弟！”叫弟弟讲卢书记“没说套话”，是因为卢书记分明象“四人帮”的“样板戏”中的“英雄”一样可笑地说了“套话”。让弟弟沉痛地回顾“看破”的历史又愤怒地承认失去了信仰，不过因为作者要借弟弟之口控诉“四人帮”和揭示真理。而最终因为什么，刘心武会写出这样一个既头脑清醒又十分认真，根本没有沉睡却又强迫他不要醒来的消沉者呢？为什么会制造这样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复合物呢？

因为他试图把一切归结为一个

概念：“四人帮是万恶之源”。因为他笔下一切生发自一个概念：“四人帮是万恶之源”。因为他把革命文艺的暴露使命仅仅理解为“控诉”。

在《班主任》具有一定深度暴露性的慷慨激昂的议论文字下面，就已潜伏着这样一种危险：把一切罪责简单地归于“四人帮”，用“控诉”代替“暴露”。可惜批评家们没有指出或许也没有看出这种危险，于是刘心武迅速地沿着这条危险的道路——同时是最便捷的道路——走了下去。

暴露，触及真实，那会触动多少还没有既定的概念，那太可怕了。控诉，从既定概念出发，从“四人帮是万恶之源”的概念出发，尽情地控诉，一切会多么简单明了！

沉睡的和消沉的人们，沉睡的和消沉的青年，这是社会存在，但却是多么复杂的社会存在。刘心武不成功地触及的“沉思的一代”，是过去那场革命最宝贵的产物之一，也是最复杂的产物之一。他们中的一批勇敢者推动了伟大的“四五”运动，他们的复杂又不下于那场革命本身。并且不只这代青年，在整个中华民族中，因沉思，因探索，因清醒而消沉的人，在“四人帮”窃踞国家权力时曾比比皆是，在流毒仍控制一部分权力时还将存在，他们绝对不应是鞭策和唤醒的对象。需

要鞭笞和唤醒的，首先应当是那些毒液渗到了血液中，在毒液中沉睡还自以为清醒，横陈在四化前进道路上只会用“帮”方法思想的沉睡者。

想大胆触及沉睡和消沉人们的主题，想尖锐指出它的罪恶渊薮，却又没有触动真实的勇气而只限于尽情控诉。想塑造沉睡者的形象，却又需要沉睡者协力一致尖锐大胆地控诉。于是有了这个永远不会睡醒的清醒的消沉者。这个被任意支配的传声筒和工具！这个“控诉文学”的奇特事物！

控诉当然也是一种武器。当“四人帮”窃踞权力时，起来控诉他们的罪行就能产生巨大的力量。当“四人帮”刚刚倒台时，普遍的、群众性的控诉也曾产生巨大的力量。但是当我们为肃清流毒继续奋战以争取前进，需要从理论上深入揭批“四人帮”时，文艺，作为一种影响广泛的宣传工具和社会意识，只是把“揭批”限于“控诉”，只是把过去和残存的一切罪恶简单地归于“四人帮”，只是大声疾呼地控诉“四人帮”，会产生什么呢？会产生从概念出发的图解作品。图解不通时就会产生背逆生活和艺术真实以至违背艺术逻辑的作品。只有深入到复杂的社会现象中，深入到不是既定概念可以图解的有时是可怕的真实

中，挖掘出“四人帮”所以能够受害，流毒所以难于根除的社会根源，为新时期的伟大建设启示必要的历史教训和清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文艺才能尽到揭批“四人帮”的神圣使命。两年来揭批“四人帮”的文艺作品一般限于图解性“控诉文学”，可居然有人把它们作为“暴露文艺”加以反对，更有许多人写了大量文章捍卫它们。但只限于捍卫，这一切又会产生什么呢？会产生这样的舆论，这样的影响，会给整个社会和文艺界定下这样的基调：这些已经很不错，很大胆，走得很远了。因此而堵死真实的道路，堵死现实主义的道路，极大地削弱和限制了文艺的战斗性。

在拨乱反正的过去的两年里，这种状况可以理解。在新的伟大转折面前，应当有勇气承认和改变这种状况。

刘心武，如果继《班主任》之后，不断加深暴露的深度，加强歌颂的力量，努力学习现实主义小说技法，把议论化为形象，本来很有希望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但可惜，我们的批评……。希望刘心武正对现实，不务虚名，在新的伟大转折面前，也来一个转折，从光滑的地板走向坚实的土地。

1979.1.12



## 书 讯

《“四人帮”哲学批判》，陈晏清著，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312页。

“四人帮”是一伙不学无术的政治骗子，没有什么专门的哲学著作，但这并不说明他们不重视用哲学武器同无产阶级作斗争。本书首先分析“四人帮”打着“批判”机械唯物主义的旗号鼓吹主观唯心主义，在“反对”经验主义的幌子下用先验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接着又具体解剖“四人帮”同实用主义的渊源关系，以实用主义向党进攻。本书还揭露“四人帮”怎样把辩证法的两点论诬蔑为折中主义，并在“批判”折中主义的名义下攻击辩证法，怎样用夸大和歪曲阶级矛盾的手法，将阶级矛盾代替一切矛盾，怎样挥舞所谓“斗争哲学”的大棒推行反革命的捣乱哲学，以及怎样在“维护”新生事物的幌子下扼杀新生事物，在“反复旧”的幌子下搞复旧。本书又有两章专门批判“四人帮”推行托洛茨基式的“不断革命论”和大搞其诡辩术。

在批判“四人帮”的反动历史观部分，本书批驳了他们所散布的“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阶级关系新变动”、“无产阶级专政不需要物质基础”等谬论，指出上层建筑决

定论是“四人帮”历史唯心主义的总表现。“四人帮”否定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最终决定作用，就是整个否定历史唯物主义。他们鼓吹的“路线决定一切”是彻头彻尾的历史唯心主义。正如本书指出的，上层建筑决定论的实质和核心是法西斯的权力意志决定论。

“四人帮”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其崩溃的根本原因，正在于它违反经济发展的方向，阻碍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陈晏清这部二十万言的著作，将对肃清“四人帮”的流毒、端正思想路线起到积极作用。（震）《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统计指标基本知识》，北京经济学院人口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出版，231页。

要了解和研究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生产发展水平、国家经济实力、人民生活水准，预测经济发展趋势，经常要考察和分析某些经济统计指标。由于各国的社会制度不同，统治阶级的利益各异，各国公布和使用的经济统计指标的涵意、统计范围、计算方法，是有所不同的。不了解这些，就很难准确地分析和把握外国的经济情况。人民出版社1977年出版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统计指标基本知识》一书，就是从资本主义国家统计中选择了四十组基本经济统计指标，详细介绍了美、英、日、苏等国各项指标的

内容，分析对比，指出了研究时应当注意的问题。

这本书有两个显著的特点：它不仅限于介绍指标的涵意，而是从理论上讲明它的依据；在文体上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引人入胜。

不妨举一简例：国民生产总值。它是综合反映一国经济活动的最概括最重要的指标。在资本主义国家，一般都把它当作制定各项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也是判断经济危机的直接标志。该书在介绍这一指标时指出，由于资本主义国家以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为其理论基础，一是把劳动、资本、土地说成是生产三要素，认为凡是生产要素都创造收入，从而将利润、利息、地租和工资均视为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的组成部分，这就掩盖了利润、利息和地租是剩余价值转化形态这一阶级实质。二是把“服务”（或称“劳务”）也包括在生产性和生产性劳动概念中，认为举凡经过市场的服务收入都是生产收入，计入国民生产总值，结果出现了重复计算。书中举例说：假定某个资本家拿他的利润中的100块钱雇了一名家庭教师，家庭教师又用这100块钱付了医药费，医生又拿了这100块钱雇了一个保姆，本来只是100块钱，这么三倒两倒，最后竟变成了300块钱而计入国民生产总值，虚夸了200块钱。

读完这本书给人一个感觉：有关经济学的书并不都是枯燥无味的。（善）

《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册，近代史研究所编，人民出版社出版，342页。

《中国近代史稿》是由郭沫若同志生前主编的《中国史稿》第四册修订而成，叙述的内容从一八四〇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止。由于字数较多，分为三册：第一册一八四〇至一八六四年；第二册一八六四至一九〇一年；第三册一九〇一至一九一九年。修订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部分同志，最后由刘大年同志负责定稿工作。

第一册是在原书第一章基础上修订的，字数扩大了约三倍。新增加了“一八四〇年以前的世界和中国”一章，增加了揭露沙俄侵占中国东北、西北大片领土的罪行，以及各地各族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等内容。其他各章也都补充了大量事实，使全书内容比原书更加丰满。书中还增加了注释、插图、年表和外人译名对照表等。

本书除全面、系统地叙述一八四〇至一八六四年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英勇斗争，以及帝国主义和清朝反动政府如何走上勾结的道路外，还具有较大的特点：书中较详尽地论述了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变

化，十九世纪中叶的思想、学术、文学以及太平天国的革命文化。这样，使读者对这一阶段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有比较全面和系统的了解，改变了以政治、军事为主的革命史或政治史的体裁。书中还对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研究中的一些学术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全书结构严密，叙事简明扼要，史料、文字比较准确。（公义）

《解放区短篇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编选出版，754页。

本书选了四十六位作家的五十篇作品，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的讲话的成果和见证。

其中《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卫生组长》、《老阴阳怒打“虫郎爷”》、《满子夫妇》、《纠纷》、《我的两家房东》、《红棉袄》、《传家宝》、《村仇》等篇合起来，可以看到一幅色彩鲜明的新农村图景。新生活的风暴，势不可挡地荡涤着统治农村千百年的封建势力，以及它所造成的婚姻不自由、男女不平等、迷信、文盲、不团结、不卫生等旧习。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减租减息、土地改革和其他的反封建斗争中，美的、光明的事物逐步取得了胜利。

《月黑夜》、《雨》、《地雷阵》、《荷花淀》、《“无住地带”》、《嘱咐》、《无敌三勇士》、《新战士时来亮》、《政治委员》、《他回来了》、《老营长》、《战

地婚姻》等篇，给我们描绘了人民子弟兵的智勇双全、无畏无敌。作者们不仅善于从生活中提炼出具有特征的细节和语言，而且以其战斗的激情和胜利的信心鼓舞着我们。

还有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作品写了从落后转变为先进的人物，如《黑女儿和他的牛》、《土地的儿子》、《钱》、《莫忘本》等。这些人物往往带有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落后东西，但在党的教导下，他们改造了自己，成为革命的动力。

这些小说大都语言清新，富有生活气息。它们读起来是好小说，讲起来是好故事，不仅在主题和人物上具有不同于五四时期的崭新面貌，而且在语言形式上也为我国无产阶级文艺开辟了新路。（清怡）  
**文学小丛书**，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

文化大革命前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过文学小丛书，很受读者欢迎。粉碎“四人帮”后，不少读者建议恢复出版，出版社接受了这个建议。

现在重新编辑出版的这套文学小丛书，包括古今中外的优秀作品和重要作家的代表作（但不收长篇巨著），书前有简要序言，介绍时代背景、作者生平和作品说明等。

第一批已经出版和即将出版的共三十多种。

其中中国现代和古典文学有：鲁迅的《呐喊》、郭沫若的《女神》、茅

盾的《林家铺子》、夏衍的《包身工》、巴金的《海的梦》、老舍的《龙须沟》、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孙犁的《荷花淀》、马烽的《我的第一个上级》、峻青的《黎明的河边》、李准的《不能走那条路》、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以及《诗经选译》（余冠英译）、《离骚今译》、《九歌》、《史记选》、《杜甫诗选》、《唐宋传奇选》、《苏东坡诗词选》、《关汉卿杂剧选》、《杜十娘》、《聊斋志异选》。

外国文学有法国莫泊桑的《羊脂球》、德国《海涅诗选》、挪威易卜生的戏剧《玩偶之家》、英国莎士比亚的戏剧《柔密欧和幽莉叶》、法国巴尔扎克的《高利贷者》、梅里美的《嘉尔曼》、俄国普希金的《杜布罗夫斯基》、《果戈理小说选》、托尔斯泰的《哈泽穆拉特》、《契诃夫小说选》、《高尔基早期作品选》。（文）

《我的履历书：大平正芳》，日本产经新闻社出版，194页。

大平正芳生于1910年香川县，1936年毕业于东京商大（现在的一桥大学）。1951年起投入政界，于1960年任池田内阁的官房长官，后任外务大臣、通商产业大臣、政调会长等要职，于1978年竞选中获胜，出任自由民主党总裁及日本国总理大臣。

此书是作为日本产经新闻社特邀稿先在《产经新闻》连载，后汇编

为单行本出书的。书中简述了作者本人的阅历和政界生涯，并自豪地回顾了日中建交和与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历史性的会见。他满怀深情地赞扬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历史功绩，写道：“如果没有这两位伟大领导人的见识与决策”，那时肯定不能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

大平正芳也是酷爱读书的人。书中自述，事情再忙，他也要每周一次、两次去书店买新书来，有时甚至站在书摊前读完一本书。他博览群书，手不释卷，认为，读书是“吟味生的喜悦的瞬间”。（益民）

《鉴真》，安藤更生著，日本吉川弘文馆出版，1978年第四版，252页。

鉴真法师（公元688—763）是盛唐时期我国扬州大明寺高僧，后于玄宗天宝元年受日本留学僧的聘请，决意东渡，六次起行，五次失败，航海三次，历尽艰辛，终于天宝十二年渡日成功。当时他已是双目失明的六十六岁的老人，但他在日十年如一日，讲经传法，兴建佛寺，推广汉文，又亲自行医临症，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本书作者早有《鉴真大和上传之研究》（平凡社）、《鉴真》（美术出版社），这一本是为日本历史学会《人物丛书》而写的第三本，省略了繁琐的考证，但也补充了一些新的材料。（益民）

# 漫谈鲁迅研究

荒芜

“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耻之徒，谬托知己，是非遽起，既以自炫，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

以上是鲁迅纪念韦素园的几句话。这几句话说得沉痛极了。但是鲁迅又哪里会知道，在他一瞑之后，他自己的尸首也成了无耻之徒的沽名获利之具呢？

远的且不必说，一九六六年纪念鲁迅逝世三十周年大会上，那个政治骗子陈伯达，就谬托知己，大放厥词，胡吹一通。那个还没有资格谬托知己的文痞姚文元，也以研究鲁迅专家自居，在那次会议上，小放厥词，胡吹一通。批林批孔了，“四人帮”就拿《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来攻击总理。评论《水浒》了，他们就拿《流氓的变迁》来攻击邓副总理。“反右倾翻案风”了，那个特务张春桥就大谈《风波》里的辫子，把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请看，

这不是拿鲁迅的死尸当作他们篡党窃国的工具吗？鲁迅死而有知，岂但悲哀而已。

从表面上看，这些年来，鲁迅比韦素园走运多了。全集出版了。每隔五年、十年纪念一次。有些大城市里，还建立了纪念馆；有些机关、工厂里，还设有鲁迅研究室、鲁迅研究小组。不但没有被冷落到言行两亡的程度，好像还很热闹。但是如果认真地、实事求是地去加以考察，看看上述的那些热闹活动，有多少起是被大大小小的谬托知己的无耻之徒和骗子利用了，成为他们自炫、沽名、卖钱、获利、篡党、窃国的工具，统计出来的数字，一定惊人。

今天，研究鲁迅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保卫鲁迅，使他不受和少受那些骗子和无耻之徒的糟蹋。

政治骗子陈伯达的老底，知道的人也许不多。但是鲁迅在《三月的租界》里批判的狄克是谁，不是没有人知道；姚文元的那本“权威”著作兜售的是什么货色，也不是没

有人知道。可是，说来真怪，在“四人帮”垮台以前，没有听见专家们吭一声，而曲意逢迎，摇旗呐喊的，却大有人在。翻翻当时的报刊，那种谄媚的嘴脸，不是无案可查的。

前些年，苏修御用文人费德林、齐赫文斯基、艾德林之流，也趁火打劫，三番五次，拿鲁迅这张牌来挑战，骂上门来。而姚文元之徒却充耳不闻，笑骂由他笑骂，陶醉在自我封锁中，深怕我们的太平学术空气被扰乱了。鲁迅死而有知，岂但悲哀而已。

以上说的是那些别有用心的人们。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也并不是毫无问题的。我以为，研究鲁迅的生活、思想和作品，就要脚踏实地、实事求是，越是棘手问题，越要迎难而上；决不能看风使舵、因人论事，甚至弄虚作假、颠倒黑白，使鲁迅蒙冤地下。这就是马克思主义。

比如，鲁迅与瞿秋白的友谊关系是个客观存在，有鲁迅的文章、书信、日记、言论和行动为证。能不能因为瞿秋白出了问题（且不说究竟是什么问题），就抹煞历史事实，把我们今天对瞿的看法，强加在去世三十多年的鲁迅身上呢？不行吧。然而，在我们的评论中，有的干脆避开这个问题，闭口不谈；有的千方百计论证，鲁迅早在那时

就已嗅出瞿秋白的叛徒气味了。这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并不要求鲁迅充当一名算命先生。

一九七三年，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鲁迅作品选集《无声的中国》。编译者在前言里提到鲁迅的一件轶事：一九三五年，上海苏联领事馆为纪念十月革命节，举行了一个小型招待会，鲁迅出席了。散会时，他发现他那顶有名的破呢帽，掉在衣帽架后面去了。他把帽子掏了出来，踢了它一脚，然后拾起，拍打两下，在戴上头以前，对他身边的人说：“这是一顶黄包车夫的帽子。我呢，也就是那么一种人，一个拉车的。”这个轶事不但极有风趣，而且形象地表达了鲁迅的思想、感情和性格，连语言都有个性。有人把这个故事告诉一位研究鲁迅的同志，那位同志却很不以为然地说：“我就不知道有这回事。这是对鲁迅的歪曲。”事有凑巧，不久前出版的一本鲁迅研究资料里，有茅盾先生的一篇文章，讲到那次小型招待会。他记得，被邀出席的只有宋庆龄、鲁迅、斯沫特莱、路易·艾黎少数几个人。另据《无声的中国》编译者说，说出上述轶事的就是艾黎。由此看来，那位同志不知道那回事，情有可原。至于断言那是对鲁迅的歪曲，就未免太主观。研究一个作家，哪怕只是那个作家的一个生活细节，还是虚

心一点的好。不然的话，究竟谁歪曲了谁，可就难说了。

鲁迅留下的旧体诗，为数不多。有人认为，这一部分作品，问题不大，容易研究。其实不然。举一个例。鲁迅最早的一首诗《白题小像》是大家所熟知的。这首诗的头一句，“灵台无计逃神矢”中的“神矢”，向来解释纷纭。有丘比德说，典出于罗马神话；有罗罗说，典出于拜伦长诗。但都象借来的衣服，套上总不合身，而研究鲁迅的专家们又不屑于一顾。前年，一位

搞外国文学的人，谈起这个“神矢”问题。他认为典就出在鲁迅从小就爱看的《山海经》里。灵台就是《大荒西经》里的轩辕台，神矢就是《海外西经》里的穷山族不敢用以西射的利箭。他还认为那些坚持丘比德、罗罗说者，实在是冤枉了鲁迅。不知专家们以为如何？

套用鲁迅《忆韦素园》的最后一句话，“现在我写这两千字……但愿没有营私肥己的处所，此外也别无话说了。”

## 《日本人论 鲁迅》论文集

鲁迅早年曾留学日本，和日本人民有着深厚的友谊，因此，日本不仅是翻译出版鲁迅著作最早和最多的国家，同时也是研究鲁迅和出版鲁迅研究的论著最早和最多的国家。

日本研究鲁迅的论著，我国翻译和介绍的还不多，现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和吉林师范大学外国问题研究所日本文学研究室合作，编选了一本《日本人论鲁迅》的论文

集，将在某出版社出版。主编是戈宝权同志。

《日本人论鲁迅》收集了五十年来日本人研究和论述鲁迅的文章五十余篇，其中绝大部分是战后写成的。共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日本研究者对鲁迅的评价和对鲁迅的论述；第二部分是关于鲁迅生平的资料和回忆鲁迅的文章；第三部分是关于鲁迅手稿在日本发现的资料。书后附有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期的年谱，鲁迅著作的日译本目录和日本研究鲁迅的论著的目录等。

---

# “幽岩”质疑

陈江

---

“椒焚桂折佳人老，独托幽岩展素心。”

岂惜芳馨遗远者，故乡如醉有荆榛。”

这首《送O.E.君携兰归国》是鲁迅先生的旧诗中最著名的诗篇之一。近几年来，这首诗虽然没有像《自题小像》、《湘灵歌》和《秋夜有感》进行热烈的讨论，但是从一些同志所写的书和文章中提到这首诗的情况来看，各家对本诗前两句的解释很不一致，特别是对“独托幽岩展素心”这一句或“幽岩”这一个词的解释，更是众说纷纭。从1959年出版的张向天同志的《鲁迅旧诗笺注》到1978年第三期《社会科学战线》上周振甫同志的《关于〈湘灵歌〉的问题》一文，对“幽岩”一词的解释近二十年来一直在继续探讨。笔者不是鲁迅诗歌的研究者，作为一个读者和一个鲁迅诗歌的爱好者，在读了各家的解释以后，有一个疑问始终没解决，现在提出来供读者，尤其是专家们参考和指正。

就笔者看到的，各家对“幽岩”一词的解释，大致有下面三种情况。第一，认为是指革命根据地。例如鲁歌同志说：“‘独托幽岩展素心’，就是（鲁迅）把希望寄托在湘赣山区的幽深岩嶂中从事革命伟业

的毛主席身上，向毛主席献出自己的一片冰心”。①倪墨炎同志的解释大致相同，他说：“在深山幽谷之中，革命者仍然在为他们的伟大理想而战斗。读到这一句，人们是很容易联想到战斗在革命根据地的工农红军和革命人民的。”②对于这两种解释，我认为都是值得商榷的。首先，“展素心”不能解释为“向毛主席献出自己的一片冰心”，“展”不能解作“献出”，其次，“独托”不能解释为众多的“革命者”、“工农红军和革命人民”。“独托幽岩展素心”是鲁迅在“椒焚桂折佳人老”的艰苦环境下的言志、述怀和自白，不“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鲁迅语），和鲁迅当时写作本诗时的思想情况，这样来解诗，显然只会走

---

① 鲁歌：《杨开慧同志的就义和鲁迅的几首诗》，《天津师院学报》，1977年第四期。

② 倪墨炎：《鲁迅旧诗浅说》，上海人民出版社，第75页。



失诗句的原意。

第二种情况是：如张向天同志认为“幽岩”是“鲁迅先生在花园庄所住的简陋狭小的住室”；①王延令同志认为，花园庄这家“旅馆前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海军陆战队的高大的钢骨水泥建筑，宛如悬崖陡壁横亘在前，使这家旅馆阴暗犹如幽谷”。②也有的同志认为，“幽岩”就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的“小楼”。对于这些解释，近于机械的比喻，把原诗丰富的内涵简单地归结为生活记录。这样来解诗，势必要把“诗美”杀掉。

第三种情况是，认为“幽岩”就是“如醉”的“故乡”。这是最近由周振甫同志提出来的，他说：“《送O.E.君携兰归国》里说：‘岂惜芳馨遗远者，故乡如醉有荆榛’。这个故乡，就是‘独托幽岩展素心’的‘幽岩’，也就类似‘水碧沙明两岸苔’的‘潇湘’，但因为‘故乡如醉’，那里在反动派的压迫下‘有荆榛’，也就是使人‘不胜清怨’，所以‘岂惜芳馨遗远者’，让它离开‘幽岩’。”③我觉得这样解释，对“托”

这个字未免忽略了。“托”是“依托”的意思，这样，“独托幽岩”就成为独自依托“如醉的”“故乡”，这恐怕是不符合原诗的意思的。

我觉得没有必要对“幽岩”这个词作这样或那样的解释，“独托幽岩展素心”这一句用的是一个很常见的典故。“素心”一语双关，既指“本心”或“本意”，如江淹诗：“素心本如此”；素心也指素心兰，即兰花的一种。“独托幽岩展素心”整句诗用的是空谷幽兰这个常见的典故。不知道各家何以都不从典故来解释这句诗？是忽略了，还是别的缘故？这也是我把我的看法写出来希望指正的原因。

诚然，鲁迅说过这样的话：李商隐“用典太多，则为我所不满”。（《致杨霁云信》，1934年12月20日）这里，鲁迅不满意的是“用典太多”，即“掉书袋子”，并不是一般地反对在诗中运用典故。写旧诗用典是很普通的，在鲁迅的旧诗中就有不少典故，而且从鲁迅修改的诗句来看，有的时候还有意用典。比如“破帽遮颜过闹市”这一句，“破帽”原本写作“旧帽”，后来改成“破帽”，为什么要改呢？原因就在于“破帽”是有典的。在古代的诗词中，有不少诗人用“破帽”来自嘲，比如辛弃疾《贺新郎》中的“何处飞来林间鹊，蹙踏松间微雪，要破帽多添华发”；黄遵宪的“青鞋破帽闇无光，时或

① 张向天：《鲁迅旧诗笺注》，广东人民出版社版第57页。

② 王延令：《浅谈如何解释鲁迅诗歌》。

③ 周振甫：《关于〈湘灵歌〉的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3期。

彳亍书贾坊》(《别赖芸云同年》)。这里的“破帽”也都含有自嘲的意味。鲁迅把“旧”字改成“破”字，一字之改，正说明他熟悉典故，有意用典，使之符合写作旧诗的要求。因此，解释鲁迅的旧诗，从典故上来考虑不能认为如有的同志所说的是刻意求典，还是很必要的。对于鲁迅诗歌中的典故我们先要弄清典故的原意，然后再分析鲁迅怎样用典，有没有赋予新意；当然，这里必须结合写作的时代背景，鲁迅当时的思想来研究，这才较为确凿。

所以，我认为对“独托幽岩展素心”这一句应当从空谷幽兰这一典故来考虑，从而作出解释。实际上鲁迅在这句诗中也是有意用典的。这一典故出自蔡邕的《琴操》：“孔子聘诸侯莫能任，自卫反鲁，隐谷之中，见香兰独秀，喟然叹曰：夫兰当为王者香，今乃独茂，与众草为伍。乃上车援琴鼓之，自伤不逢时，托辞于香兰云。”(《艺文类聚》卷八)典故的原意是孔丘感叹贤者“不逢时”，但是后来历代诗人运用这个典故时，意思却有了变化，把兰与松、梅、菊、莲等并列，作为坚韧不拔、忠贞不渝的象征加以吟咏。比如李白在《于五松山赠南陵常赞府》一诗中写道：“为草当作兰，为木当作松。兰幽香风远，松寒不改容”。黄仲则也有诗云：“风致菊艳霜，诗境梅破冻；莲思火地开，兰

拟幽谷种”。(《赠陈秋士》)另外，还可举一些例子，但这里就不列举了。历代诗人对于兰的这种吟咏，鲁迅无疑是很熟悉的，他对中国古典文学具有很高的修养，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在我看来，鲁迅在“独托幽岩展素心”这句诗中运用空谷幽兰这一典故，没有赋予特别的含义，仅仅是利用历代诗人咏兰的传统含义所唤起的意境，来为现实斗争服务，表示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鲁迅和其他革命者始终坚韧不拔，忠贞不渝的高尚品质，和战斗到底的决心。

这首诗写于1931年2月12日，时间在柔石等烈士被秘密杀害后五天，地点在鲁迅避难的花园庆。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封锁消息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密，鲁迅不可能立刻得到柔石等烈士就义的消息。因此，在写本诗时，鲁迅可能还不知道柔石等就义消息，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对于柔石等革命青年被捕，鲁迅估计一定凶多吉少。冯雪峰在《回忆鲁迅》中说：“那时候不说也可以知道，被捕者是没有被释放的希望，谁也不会存什么幻想。”①“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鲁迅就以写作这首《送O.E.君携兰归国》，“就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鲁迅语)，以抒发他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愤恨和压在他心头沉重

① 冯雪峰：《回忆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第38页。

---

## 鲁迅和章锡琛

振甫

赵景深先生在《鲁迅给我的指导、教育和支持》(《新文学史料》一, 47页)里说:“我在海丰中学教了半年语文,就回到上海。当时章锡琛本来是在商务印书馆编《妇女杂志》的,据说商务为了该刊登了性知识,认为猥亵,批评了他,他就辞职出来,自己办了《新女性》,又开了开明书店。”赵先生的“据说”,想是听来的,有不够确切的地方,这里想补充一下。

五四运动后,在反封建礼教的呼声中,关于性道德问题引起了一

些人的重视和讨论。一九二五年一月的《妇女杂志》上,周建人同志发表了《性道德之科学的标准》,章锡琛发表了《新性道德是什么》。主张一种摆脱封建礼教束缚的新的科学的性道德。这两篇文章发表后,

北京大学教授陈百年(大齐)在三月十四日《现代评论》第一卷十四期上发表《一夫多妻的新护符》,抹煞周、章两文中主张“男女平等”、“不能把异性的一方作为自己的占有物”的积极方面,把两文曲解为“一夫多妻的新护符”。陈百年的文章发表以后,商务就不让章锡琛主编《妇女杂志》,把他调到国文部去。周、章两位写了《答〈一夫多妻的新护符〉》、《驳陈百年教授〈一夫多妻的新护符〉》两文,已经不能在《妇女杂志》上发表了,就把两文投到

---

的感情。因此,本诗与柔石烈士有关,而不是如鲁歌同志所说的与杨开慧烈士有关。

在“故乡如醉有荆榛”的恶劣政治条件下,“椒焚桂折佳人老”了,“独托幽岩展素心”,空谷幽兰仍然鲜艳怒放,这里主要是鲁迅自己的言志,述怀和自白,但是也写出了革命者的崇高品质。这里的“独”不是“孤独”,在抒情诗中,革命诗人

的“我”一般是代表着广大的革命者,寓共性于个性之中。因此,从“独托幽岩展素心”这一句,既表示了鲁迅的革命硬骨头精神,也使人看到广大革命者高尚品格的写照。诗中的“幽岩”与“故乡”也不是互文同意,从这点上讲,把“幽岩”解释成“故乡”也是可商榷的。至于把“幽岩”作简单的比附,似乎也都是与诗的原意不相符合的。

《现代评论》。《现代评论》把两文大加删节，排在《通讯栏》里，把题目改为《恋爱自由与一夫多妻》、《新性道德与多妻》，副标题是《答陈百年先生》。同时，在正文里发表了陈百年《答章周二先生论一夫多妻》。刊在五月九日《现代评论》第一卷二十二期上。周、章两位怕《现代评论》不登他们的文章，又另抄一份寄给鲁迅。鲁迅看到《现代评论》那样对待周、章两位的文章，就把两篇全文在五月十五日《莽原》周刊第四期上发表了，还在《编完写起》里说：“诚然，《妇女杂志》上再不见这一类文章了，想起来毛骨悚然，悚然于阶级很不同的两类人，在中国竟会联成一气。”鲁迅又说：“但待到看见印成的《现代评论》的时候，我却又决计将它登出来，因为比那挂在那边的尾巴上的一点痒得多”。“可是我总觉得陈先生满口‘流弊流弊’，是论利害，不像论是非，莫

明其妙。”（《集外集》）

章锡琛在国文部编《文史通义》选注。到一九二六年一月，用开明书店名义出版《新女性》。商务里有一个规定，商务里的职工不准在外搞有损于商务业务的事。商务要章或者停办《新女性》，或者离开商务。章因此决意离开，去创办开明书店了。

在写《编完写起》的十年以后，鲁迅对《编完写起》又写了案语，说：“《现代评论》是学者们的喉舌，经它一喝，章锡琛先生的确不久就失去《妇女杂志》的编辑的椅子，终于从商务印书馆走出，——但积久却做了开明书店的老板，反而获得予夺别人的椅子的威权，听说现在还在编辑所的大门口也站起了巡警，陈百年先生是经理考试去了。这真教人不胜今昔之感。”（《集外集拾遗》）在这里看到鲁迅的鲜明的爱憎感情。

---

## 《鲁迅小说 插图集》

以中国的传统“绣像画”作底子，运用西洋技法，描绘了鲁迅的《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明天》、《一件小事》、《头发的故事》、《风波》、《故乡》、《阿Q正传》、《端午节》、《白光》、《兔和猫》、《鸭

的喜剧》、《社戏》、《祝福》、《在酒楼上》、《幸福的家庭》、《肥皂》、《长明灯》、《示众》、《高老夫子》、《孤独者》、《伤逝》、《弟兄》、《离婚》、《采薇》、《铸剑》、《出关》、《非攻》中的人物，共四十二图。外鲁迅造像二图。

作者范曾，北京荣宝斋出版。时在一九七八年。定价八角五分。

---

王 蒙

---

##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琐谈

---

差不多二十三年前的一篇习作《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发表时题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收入1956年《短篇小说选》时恢复了原稿的这个名称，即将出版的建国以来的短篇小说选中，所收也是后一个版本），最近被宣布“落实政策”了。这里，我暂不想谈小说的短长、作者的感想，只想说明几个曾被误解的情况。

### 影 射

1957年初，有一篇批评文章写道：“作品的影射，还不止于此……”，当时，有一些朋友读后对影射二字颇表愤慨。但我一点也没愤慨，原因是——说来惭愧，我当时还不懂得什么叫影射，嗅不出这两个字后面的血腥气味。我的小说就是写了缺陷、阴暗面，而且是写的一级党委的组织部门，大胆直书，百无禁忌，影射于我，何用之有？按，影射的目的无非是遮掩，影射的规律则是借古讽今，以远喻近，说自然现象而实指政治生活；却不会是相反。“帮兇”诬画三虎是为林彪翻案，瘦骆驼是攻击国民经济；却不会反过来指责哪一篇谈林彪的文章是有意与北京动物园里的小老虎过不去。那么，五十年代的中共××区委员会又会是影射什么呢？难道是影射唐宋官府？语近梦呓了。作者自幼受到党的

教育，视党为亲娘，孩子在亲娘面前容易放肆，也不妨给以教训，但孩子不会动心眼来影射母亲。

说实话，当时不足二十二岁的作者要真知道影射和陷人影射之类的把戏，提高点警惕，倒说不定好一些；含蓄一些，周密一些，分寸感强一些，辫子和空子少留一些。例如，全篇除一处提到《北京日报》以外再无一处提到过故事发生在北京，而仅仅为了北京有没有官僚主义就引起了那么多指责，以至惊动了毛泽东同志他老人家讲话，才得以平息（暂时平息了）。如果作者成熟一点，本来完全不必提北京，并从而可以少找许多麻烦的。

不知道解放以后陷人影射之说是否从那篇文章开始的，反正影射这个概念既超出了文艺批评的范畴，也突破了法学的范畴，陷人影射不需要证据和逻辑，自我辩护未曾影射也无法剖胸献心。桃峰就是桃园，三虎就是林彪，作这种判断的人比陆峥嵘都不如，陆峥嵘总还手提着一个（哪怕是假的）“忠诚探测器”，还要探测一下的嘛。

## 比 喻

小说中的人物赵慧文有一处提到洋槐花，说这花“比桃李浓馥，比牡丹清雅”。一位前辈分析说，作品用牡丹比喻党政领导干部，用桃李比喻芸芸众生，而赵慧文自诩清高，自我比附为小白花。

看了这个分析我深深为这位前辈的思想的深邃与敏锐、想象力的丰富与奇妙而赞叹。而且，我也觉得这种分析并非凭空得来。确实，小说中的林震、赵慧文就是有某种清高思想，他们实该在群众斗争中经风雨、见世面、改造世界观，逐步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但我也惭愧，因为我写花时只不过信手拈来，写那时的季节，写赵慧文的女性的细心，写“感情的波流”，总之，我写的是花，没有将花比君子，没有微言大义。形象思维有自己的规律，形象

思维不是图解，如果认为描写花鸟虫鱼、风霜雨露、山水沟坎都在比喻什么，请试试看，写出来会是什么虚伪造作的货色！读者和批评家可能从作品的形象中得到某种启示、联想和引申，然而，这只能是读者和批评家在“兴”，却不是作者在“比”。顺便说一句，比兴经常连用，但比兴是颇为有别的。视兴为比，难免失诸胶柱鼓瑟。

与此类似，有人说刘世吾的谐音是刘事务，可见作者视刘世吾为事务主义者。这对于作者也无异于说梦。作者当时根本不懂得用谐音来帮助自己的人物亮相，如先进人物姓洪、坏蛋姓刁之类。这篇小说里人物的名称是这样起的：作者有一批老战友，作者取他们的名字，改换了姓氏，乱点鸳鸯谱，便成了小说人物的姓名。作者在这里和他的老友们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就那么回事。

还有人问，雨夜吃馄饨一节为何写到一个小女孩进饭铺避雨；听意大利随想曲一节为何要写音乐节目后是剧场实况；是废笔吗？败笔吗？别有奥妙吗？答：都不是。写避雨才有雨意，写广播剧场实况才有周末感。作品是写生活；生活的画面和音响就是如此。

## 查 究

小说一发表，引起了许多好同志的不安。他写的是谁？他对哪个领导不满？他写的是哪个区委组织部？他要干什么？谁向他透露了组织部的情况？难道××同志或××区委是这样的吗？舆论如此之强烈，直接影响了作者与他的一些老同志、老上级、老战友的关系。

甚至一位对小说倍加赞扬的读者也著文断言，林震显然是作者的化身。

还有一位同志自称是林震的模特儿，并因而遭受了批判。  
呜呼！

## 《一八艺社五十周年纪念画册》

“一八艺社”在民国十八年（1929）成立于杭州，故称“一八”。后于上海参加“左翼美术家联盟”。一九三一年“一八艺社”在上海举办习作展览会时，鲁迅写过一篇《一八艺社习作展览会小引》，积极赞助。同年夏，鲁迅邀内山完造之弟内山嘉吉举办木刻讲习会，艺社

有不少社员参加，对我国新兴木刻运动起了很大作用。

人民美术出版社前曾邀原艺社在京老社员江丰、艾青、李可染等研究出版纪念画册的计划。听说这本纪念画册的内容，将包括序文、作品、鲁迅文章和文字史料等四个部分，预定于一九七九年出版。

小说来自生活，它有生活的影子，有生活的气息，但它不是生活的复制。面包来自小麦，小麦来自泥土，但三者互有质的差别；当人们为一块面包是否烤得好而忧虑、而争执的时候，大可不必组织土壤学家去考察麦地。而写小说的人只要不是一个卑劣的恶棍，总不会利用小说攻击某个人、某个单位；同时我们也可以相信，企图挟嫌泄愤的恶棍一般不会写出什么象样的小说来吧？文艺创作和刀笔词讼，毕竟是“隔行”，所以“如隔山”。

如果你感到小说中的某人某事象生活中的某人某事，这也只是象其一点而已；我们可以从作品中得到共鸣、得到启示，也可以对小说有所不满足，有所批评或者反对，但不要按照新闻报道来要求小说吧，要相信小说是虚构，虚构就不是真人真事。否则，这不但会给作者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也影响百花的盛开。造成“余悸”的不仅有坏人的棍子，也还有好同志的误解。

附注：作者手边既无小说也无当年的评论文字，这篇小文纯系按记忆所写，错讹难免，望读者指正。

七九年元月三日



艾 青

---



## 在汽笛的 长鸣声中

《艾青诗选》自序

---

—

“我们找你找了二十年，我们等你等了二十年……”

“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不知你怎么样了，我总是想：大概死了……”

上面引的都是读者来信中的话，这样的话几乎每封信里都有。这是今年四月底，我发表了第一首诗之后，读者对我的关切。

“作家没有作品，或者没有发表作品，等于不存在……”  
不存在等于死亡，而我并没有死亡。

多少年来，林彪、“四人帮”总想禁锢歌声，他们把不属于自己帮派体系的作品全都列为禁书束之高阁。

但是，只要歌声是属于人民的，人民就会保护歌声。

“为了买你的诗集，我曾跑遍很多地方也没有买到……”

“我们到处找你的诗集，找到了就互相传抄，抄好了就

东藏西藏……”

“为了保存你的诗集，我用塑料布裹起来，藏在米缸里……”

“唐山地震之后，我在柜子底下找到你的诗集……”

最近一个朋友给我看了四十二年前出版的《大堰河》，并且要我签名作为纪念。

我在那本书的扉页上写了一首“诗”：

好象一个孤儿  
失落在人间  
经历了多少烽火硝烟  
经历了多少折磨和苦难  
相隔了四十多年  
终于重新相见——  
身上粘满斑斑点点  
却保持了完好的容颜——  
可真不简单！

开滦煤矿的一个工人来信说：

“我不懂诗，我是一个生在农村的人，看到你的诗会勾起我回忆童年时代的农村和可怜我童年时代的农村……为什么诗的魅力这么大呢？……我只知我这个普通工人经常怀念你，经常关心你！……只要你收到这封信，看到一个二十多年来经常把你怀念的人的感情，也就使我心安理得了……”

几乎所有来信都对我写诗表示高兴：“现在好了”、“你终于出来了”、“你还健在，你应该歌唱！”

我今年六十八岁。按年龄说并不算老，但是，有许多年轻的朋友都死在我的前面，而我却象一个核桃似的遗失在某个角落——活着过来了。

## 二

我生于一九一〇年阴历二月十七日，是浙江金华人，老家在山区。

据说我是难产的，一个算卦的又说我的命是“克父母”的，我成了一个不受欢迎的人，甚至不许叫父母“爸爸妈妈”，只许叫“叔叔婶婶”。我等于没有父母。这就使我讨厌算卦、反对迷信，成了“无神论者”。

从少年时代起，我从美术中寻求安慰。

“五·四运动”开始的时候，我已经九岁。小学课本里已有启蒙思想——要求民主和科学。

女学生们开始“放足”了。

中学老师第一次出的作文题是“自修室随笔”，我写了一篇“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反对念文言文。老师的批语是：“一知半解，不能把胡适、鲁迅的话当作金科玉律。”老师的批语并没有错，我却在他的批语上打了一个“大八叉”！

“山雨欲来风满楼”。学生们经常上街游行、摇旗呐喊，捣毁卖仇货的商店，冲进卖鸦片的“禁烟处”……革命的风暴震撼着南方的古城。不知哪儿来的一本油印的《唯物史观浅说》，使我第一次获得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观念——这个观念终于和我的命运结合起来，构成了我一生的悲欢离合。

一九二八年暑假初中毕业后，我考入国立西湖艺术院（即现在的杭州美术学院）绘画系。没有念完一个学期，院长发现了我。他说：“你在这里学不到什么，你到外国去吧。”

第二年春天，我就怀着浪漫主义的思想到法国去了。

我在巴黎是一个穷学生。家里不愿意接济我，我就在一家工艺美术的小厂工作，一边进行自学，到蒙巴那斯一个“自由画室”

去画人体速写。我也读了一些中文翻译的哲学和文学的书；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的小说、苏维埃十月革命的小说和诗歌；有时也到工人区的“列宁厅”看禁演的电影。同时也读了一些法文现代的诗。而我最喜欢、受影响较深的是比利时大诗人凡尔哈仑的诗，它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大都市的无限扩张和广大农村濒于破灭的景象。总之，我在巴黎度过了精神上自由、物质上贫困的三年。

### 三

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变”，中国的民族危机深刻化了。

一九三二年的“一·二八事变”那一天，正好是我从马赛动身回国的那一天。

但是，四月上旬炮船到香港停了四天——国民党忙于和日本帝国主义谈判“淞沪协定”。

到上海的时候战争已结束——祖国依然呻吟在屈辱中……我茫然回到老家，住了不到一个月就离开了。

五月我到上海，加入“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和大家一同组织了一个“春地画会”。

早在巴黎的时候，我就试着写诗，在速写本里记下一些偶然从脑际闪过的句子。

在从巴黎回国的途中也写了一些短诗。但从来没有想要当一个“诗人”。

一天，同房住的一个诗人在桌子上看到我写的一首诗《会合》，是记录反帝大同盟东方支部在巴黎开会的场景的，他自作主张地写了个条子：“编辑先生，寄上诗一首，如不录用，请退回原处”，寄到当时“左联”的刊物《北斗》里，想不到居然发表了。这件小事，却使我开始从美术向文学移动，最后献身于文学。

六月，“春地画会”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楼上举行展览会，得到了鲁迅的支持，把他珍藏的德国女画家珂勒惠支的版画借来一

同展出。鲁迅自己也来参观，签了一个很小的名。看完之后捐了五元——会场要出租钱。我把“收条”给他，他悄悄一揉就扔掉了。

我和鲁迅见面只这一次。

七月十二日晚上，“春地画会”正在上世界语课，突然遭到法租界巡捕房密探的袭击，进行了半个小时的搜查之后，我和其它十二个美术青年一同被捕。

国民党以臭名昭著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控告这一群手无寸铁的青年“颠覆政府”！

在看守所的时间特别长。我写了不少诗。有些诗通过律师的谈话、亲友的探望，偷偷把稿子带到外面发表。

为了避免监狱方面的注意，从一九三三年开始，我改用“艾青”这个笔名；写了《大堰河我的褓姆》。这个笔名到今天，已整整用了四十五年。

一九三五年十月我出狱；一九三六年出版了第一本诗集《大堰河》。

#### 四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爆发了“抗日战争”。我在前一天在预感中，写了《复活的土地》：

.....

我们曾经死了的大地  
在明朗的天空下  
已复活了！  
——苦难也已成为记忆  
在它温热的胸膛里  
重新旋流着的  
将是战斗者的血液。  
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民族，以自己的鲜血来洗刷近百年来

被奴役的耻辱。

我从上海到武汉，从武汉到山西临汾，从临汾到西安，又折回到武汉，到桂林，在《广西日报》编付刊《南方》。出版了诗集《北方》。

一九三九年下半年在湖南新宁教了一个学期的书之后到重庆。

一九四〇年春天，我带了长诗《火把》到重庆——当时的所谓“大后方”的文化中心。

不久，我得到周恩来同志的会见。那是在重庆郊区北碚，在事先约定的时刻，他从浓荫复盖的高高的石阶上健步下来，穿一身浅灰色的洋布干部服，显得非常整洁。

他在“育才学校”的讲话中，明确地提出希望我到延安去“可以安心写作”。那时，大家都亲切地称他“周副主席”（军委副主席）。

一九四一年初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民党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在重庆的进步作家受到了恐吓与监视。我幸亏得到周恩来同志的帮助，和另外的四个作家一起，摆脱了国民党特务的跟踪，沿途经过四十七次的检查，安然到达延安。

初夏的一个夜晚，得到通知，我们在杨家岭的窑洞里，第一次见到了自己所生活的时代的杰出的人物——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在我的脑子里留下了永远不会消失的一个既魁梧又和霭的身影与笑容。

十一月，我被选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参议员。我第一次写了歌颂领袖的诗《毛泽东》。

一九四二年春天，毛主席多次接见我。最初他来约我“有事商量”，我去了。

他和我谈了“有些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你看怎么办？”老实说，我当时并没有看出有什么严重性。我很天真地说：“开个会，

你出来讲讲话。”他说：“我说话有人听吗？”我说：“至少我是听的。”

接着他来信说：“前日所谈文艺方针的问题，请代我收集反面的意见……”在“反面的”三个字下面加了三个圈。

我没有收集什么反面的意见，只是把自己的意见正面提出了。

他看了我的意见之后来信说：“深愿一谈”。在谈话中，他提出包括文艺与政治、暴露与歌颂等等问题。我根据他的指示进行了修改，以《我对目前文艺工作的意见》为题发表了。

五月，以毛主席的名义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会议进行了好多天，讨论也很热烈。

在会上，我记得的是朱总司令对我在文章中引用的李白的两句话：“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作了最精辟的解释：“我们的韩荆州是工农兵。”实际上指出了文艺工作者的方向。

在会议结束的那一天黄昏，毛主席发表了著名的、经典性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把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发展了，也明白无误地重申了列宁对文学艺术的党性原则。

在座谈会之后，我写信给毛主席提出想到前方去。他回信说：“赞成你去晋西北，但不宜走得太远，因同蒲路不好过”；“目前这个阶段希望你顿在延安学习一下马列，主要是历史唯物论，然后到前方，切实研究一下农村阶级关系，不然对中国战况总是不很明晰的……”

他指示我学习马列——主要是历史唯物论，实际上叫我投入接着不久就来到的“整风运动”，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去战胜一切领域中的唯心主义。

## 五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

十月，我随“华北文艺工作团”到张家口，文工团併到“华北

联合大学”作为“文艺学院”。不久就撤出张家口，转移到冀中、冀南一带。整个解放战争期间，我都在“文艺学院”搞行政工作。也曾参加过几次土地改革工作。写过组诗《布谷鸟》。

一九四九年初北京解放。我在进城后的第一件工作就是以“接管人员”的身份接管“中央美术学院”；参加全国文联和作家协会的筹备工作；参加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最后当了《人民文学》的副主编。

一九五〇年随中共中央的一个代表团访问苏联，所写的诗均收入《宝石的红星》里。

一九五三年回老家一次。收集了抗日战争期间在浙东一带的历史，但以民歌体写的叙事长诗《藏枪记》却失败了。

一九五四年七月，得到智利众议院的邀请到智利访问，写了《南美洲的旅行》的组诗以及后来补写的长诗《大西洋》。

一九五六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第二个选集《春天》，我在“后记”中说：

“……我的作品并不能反映这个伟大的时代。这个时代是要用许多的大合唱和交响乐来反映的。我只不过是无数的乐队中的一个吹笛子的人，只是为这个时代所兴奋，对光明的远景寄予无限的祝福而已。”

一九五七年，我先是计划写“匈牙利事件”，已完成《茱洛拉》、《巴拉顿湖》两个章段，因材料不足搁下了。接着到上海，收集了有关帝国主义在经济上侵略中国的历史资料，才写了《外滩》一节，又因事搁下了。

一九五八年四月，得到一个将军的帮助，并经周恩来总理的同意，我到东北国营农场去“体验生活”，当了一个林场的副场长，和伐木工人们一起生活了一年半；曾写了长诗《踏破荒原千里雪》



和《蛤蚂通河上的朝霞》，可惜都已丢失了。

一九五九年冬天我到新疆，在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个垦区度过了十六年。

我认识了不少新朋友。我也下决心要歌颂这些改造大自然的战士们。我为了要写这个机械化程度较高的垦区积累了几十万字的材料。

一九七二年，经医生检查发现我的左眼因白内障而失明已经有四五年之久了。

一九七五年春天，我经上级批准到北京医治眼疾。

难忘的一九七六年！我国人民先后失去了三个领导人，整个国家处在危急中——万恶的“四人帮”从四面八方伸出了黑手……感谢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使伟大的祖国转危为安。我也得到了第二次解放。

## 六

诗人必须说真话。

常常有这样的议论：某人的诗受欢迎，因为他说了人们心里的话。我以为这种议论不够全面。全面的说，某人的诗受欢迎，因为某人说了真话——说了心里的话。

人人喜欢听真话。诗人只能以他的由衷之言去震撼人们的心。诗人也只有和人民在一起，喜怒哀乐都和人民相一致，智慧和勇气都来自人民，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

人民不喜欢假话。哪怕多么装腔作势、多么冠冕堂皇的假话都不会打动人们的心。

人人心中都有一架衡量语言的天平。

也有人夸耀自己的“政治敏感性”，谁“得势”了就捧谁，谁“倒霉”了就骂谁。

这种人好象是看天气预报在写“诗”的。

但是，我们的世界是风云变幻的世界。这就使得“诗人”手忙脚乱，象一个投机商似的奔走在市场上，虽然具有市侩的鬼精，也常常下错了赌注。

“政治敏感性”当然需要——越敏感越好。但是这种“敏感性”又必须和人民的愿望相一致。以个人自私的动机是嗅不出正确的东西的。

这就要求诗人既要有和人民一致的“政治敏感性”，更要求诗人要有和人民一致的“政治坚定性”。

“不倒翁”只能当玩具，却不宜作为做人的样板。

谁也不可能对什么都兴奋。连知了也知道什么时候才兴奋。

有人反对写诗要有“灵感”。这种人可能是“人工授精”的提倡者，但不一定是诗人。

把自己不理解的、或者是不能解释的东西，一律当做不存在、或者是认为非科学，这样的人只能居住在螺丝壳里。

外面的世界是瞬息万变的：有时刮风、有时下雨，人的感情也有时高兴、有时悲哀。

所谓“灵感”，无非是诗人对事物发生新的激动、突然感到的兴奋、瞬即消逝的心灵的闪耀。所谓“灵感”是诗人的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最愉快的邂逅。“灵感”应该是诗人的朋友，为什么要把它放逐到唯心主义的沙漠里去呢？

无差别即无矛盾。

对一切都兴奋就是对一切都不兴奋。

诗人要忠于自己的感受。所谓感受就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

并不是每首诗都在写自己，但是，每首诗都由自己去写——就是通过自己的心去写。

没有兴奋而要装出兴奋，必然学会撒谎。自己没有感动的事

不可能去感动别人。

当然，说真话会惹出麻烦、甚至会遇到危险；但是，既然要写诗，就不应该昧着良心说假话。

## 七

不要为玩弄技巧而写诗，写诗又必须有技巧。连说话也有说得中听的和不中听的。

人的思维活动所产生的联想、想象，无非是生活经验的复合。在这种复合的过程中产生了比喻。比喻的目的是经验与经验的互相印证。

“触觉和视觉是如此地互相补充，以致我们往往可以根据某一物的外形来预言它在触觉上的性质。”

好一个“互相补充”！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互相补充”虽然只是不同感官间的事，但它也同样存在于事物与事物之间、思维与思维之间。它使世界万物取得了沟通与联系。

形象思维的活动，在于使一切难于捕捉的东西、一切飘忽的东西固定起来，鲜明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象印子打在纸上一样地清楚。

形象思维的活动，在于把一切抽象的东西，转化为具体的东西——可感触的东西。

形象思维的活动，在于使所有滞重的物质长上翅膀；反之，也可以使流动的物质凝固起来。

通过形象思维，可以使相距万里的携起手来；反之，也可以使原来在一起的挥手告别。

形象思维的方法，是抽象与具体之间的“互相补充”的方法。形象思维的方法，是诗、也是一切文学创作的基本的方法。甚至在理论文章（也就是依靠“逻辑思维”所进行的文章）里，

也可以遇见形象思维的表达方法。例如在《宣言》里：

……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做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

至于莎士比亚，那是一个离开形象思维就不能工作的人。在他的所有的作品中，无时不在闪耀着形象思维的光辉。

例如“金钱”两个字只是一个概念，但在他的《雅典的泰门》里，“金钱”转化为许多具体的“人”了：

啊，你可爱的凶手，帝王逃不过你的掌握，

亲生的父子会被你离间！

你灿烂的奸夫，淫污了纯洁的婚床！

你勇敢的战神！

你永远年青韶秀、永远被人爱恋的娇美的情郎，你的羞颜可以融化了黛安娜女神膝上的冰雪！

你有形的神明，你会使冰炭化为胶漆，仇敌互相亲吻！

……………

这就是通过一连串的比较，对为资本所统治的世界所发出的最深刻、也是最辛辣的咒骂！

诗只有通过形象思维的方法才能产生持久的魅力。

写诗的人常常为表达一个观念而寻找形象。例如拙作《珠子》：

在碧绿的海水里

吸取太阳的精华

你是虹彩的化身

璀璨如一片朝霞

凝思花露的形状

喜爱水晶的素质  
观念在心里孕育  
结成了粒粒真珠

“观念”是抽象的，结成“粒粒真珠”，就成了明亮的、可以把握得住的物质了。

“反抗”两个字是属于精神范畴的、抽象的名词。“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反抗天然地产生于受迫害的人。

难道还有迫害人的人需要什么反抗吗？

作为一个民族，作为一个要求生存权利的个人，遇到连续的迫害该怎么办呢？

一个浪，一个浪  
无休止地扑过来  
每一个浪都在它脚下  
被打成碎沫、散开……

它的脸上和身上  
象刀砍过的一样  
但它依然站在那里  
含着微笑，看着海洋……

这也只是从受到“无休止地扑过来”的“礁石”的角度上所应采取的态度——它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然而有人说礁石是“与大大小小的航船为敌的”——“自傲的态度”，按照这位先生的说法，礁石应该“自己消灭”和对一切“大大小小的航船”——自觉地让开。这位先生完全忘掉礁石是不可能移动的，应该由“大大小小的航船”不要去碰那顽固不化的礁石。这就是从两种不同的角度看问题不同的结果。

由形象思维的活动所产生的一切比喻，都不是原来的事，所

以列宁说“比喻是跛脚的”。正因为这样，比喻也最容易被人歪曲甚至诬陷——历史上不少“文字狱”都由比喻构成。

## 八

我所经历的时代，是一个波澜壮阔、绚丽多彩的时代。我和同我差不多年纪的人们一样，度过了各种类型、不同性质的战争也遇见了各种类型、不同性质的敌人，真是变幻莫测！

我在一九四一年冬天写的“时代”那首诗里的许多话，里面最重要的话，这些年都得到了应验：

——纵然我知道由它所带给我的  
并不是节日的狂欢  
和什么杂耍场上的哄笑  
却是比一千个屠场更残酷的景象，  
而我却依然奔向它  
带着一个生命所能发挥的热情。

.....

我要迎接更高的赞扬，更大的毁谤  
更不可解的怨讎，和更致命的打击——  
都为了我想从时间的深沟里升腾起来……

.....

我忠实于时代，献身于时代，而我却沉默着  
不甘心地，象一个被俘虏的囚徒  
在押送到刑场之前沉默着  
我沉默着，为了没有足够响亮的语言  
象初夏的雷霆滚过阴云密布的天空  
抒发我的激情于我的狂暴的呼喊  
奉献给那使我如此兴奋、如此惊喜的东西

我爱它胜过我曾经爱过的一切  
为了它的到来，我愿意交付我的生命  
交付给它从我的肉体直到我的灵魂  
我在它的面前显得如此卑微  
甚至想仰卧在地面上  
让它的脚象马蹄一样踩过我的胸膛

这样的一首诗，再明显不过的是一首歌颂时代的诗，歌颂的是我们为之战斗、为之献身的时代，“我在它面前显得如此卑微”，“甚至想仰卧在地面上让它的脚象马蹄一样踩过我的胸膛”！

这样的一首诗却被文痞姚文元之流恣意歪曲，污蔑为“个人主义者自我扩张的嘶喊”，而且明目张胆地说成是一首攻击延安的诗！

也是这个文痞，竟说我从来没有歌颂过无产阶级！可是在我的四首诗里曾提到第一个无产阶级的政权“巴黎公社”：

一九三二年的《巴黎》里，有“公社的诞生”；一九四〇年的《哀巴黎》里，有“将有第二公社的诞生”；一九四五年的《悼罗曼·罗兰》里，有“把公社的子孙出卖变成俘虏”；一九四二年的《土伦的反抗》里，有“公社的子孙将重新得到解放”！

这个冒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早在二十年前，已暴露他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

就在这个文痞的文章发表之后，我收到一个将军给我的信鼓励我：“你是歌颂过公社的子孙的，你应该继续写诗。”

这两件事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照！

我曾不知多少次地提到无产阶级的领导人，提到无产阶级的武装部队……怎能说我从不歌颂无产阶级——难道只有贴上“无产阶级”四个字的标签才算是无产阶级吗？

文痞同样歪曲我的长诗《向太阳》中《太阳之歌》里的话：

太阳  
使我想起……

……

想起 马赛曲 国际歌  
想起 华盛顿 列宁 孙逸仙  
和一切把人类从苦难里拯救出来的  
人物的名字

文痞说：“但国际歌和列宁是平列在马赛曲、华盛顿和孙逸仙中间，并不突出”，因而对我做了个政治性的“结论”：“所神往的不过是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而已”！好一个“而已”！

我的长诗《向太阳》写于一九三八年四月，地点是国民党统治下的武昌。那时正是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时期，我提出自由民主难道也不应该吗？

这个文痞在整整过了二十年之后，在一九五八年的上海，住在特务父亲姚蓬子经营的“作家书屋”里，大腿叠二腿地坐在沙发上嘲笑一首在白色恐怖中所写的诗，显得多么得意啊！他而且说我把“列宁”和“国际歌”写上去，只是为了“点缀”！这样的人，却享有乱打棍子、乱扣帽子的自由！

今天有机会重温这个文痞发迹的历史，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些年来“四人帮”所实行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早在二十年前已经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演习了。

象这样的一个流氓竟能如入无人之境地横冲直撞，成了“庞然大物”，骗取了我国文学艺术领域里生杀予夺之权这么长的时间，这件事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可庆幸的是，这一切总算过去了。

如今，时代的洪流把我卷带到一个新的充满阳光的港口，在汽笛的长鸣声中，我的生命开始了新的航程。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旬



# 《天平之薨》 重译记



楼适夷

根据原作1977年新版，我把日本井上靖先生的著名历史小说《天平之薨》，又重新翻译了一次。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多年被剥夺工作权力之后，重新拿起久别的笔，深深体会到工作的愉快。

第一次翻译此书于1963年的春季。这一年，中日两国有关文化与宗教团体，联合举行唐鉴真和尚逝世1200周年的纪念。作为纪念活动的一个项目，我受世界文学社的委托，接受了介绍此书的任务。我觉得我不仅应该为中日文化交流的有意义的纪念尽一点力，同时也由于这部以中国封建文化最繁荣的唐代长安、洛阳、扬州等都市为背景的历史小说，大大地吸引了我，丰富了

我对历史的感性知识。我以为这样的作品本应当由中国作家自己来写，而现在日本作家却代我们写了，因此也使我带了感谢的心情，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一口气把它译出来了。我应该感谢刊物和出版社的编辑同志，对我急就的译文作了许多细心的帮助，使它得以及时地发表和出版。但这个译本的得以出版，也不是没有斗争的。由于作品所

写的历史文化交流事业，是通过宗教传播的形式来进行的；作品写的是古代宗教人物的传奇式的英雄事迹；为了增加作品的艺术气氛和时代形式，作者又引入了一些神话式的插话，这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上完全可以允许的事情。不料却因此而触动了某些同志的脆弱的神经，他们习惯从条条框框中来观看事物，于是就害怕了：“这不是在宣传宗教迷信吗？”他们是把自己当做“无神论者”的，脑子里却还统治着一尊形而上学的神道。出于他们的好心，始终以为群众永远是幼儿园的小班生，又娇又嫩，禁不得一点风吹草动，就会伤风感冒，受害中毒的。于是在文学艺术上最安全的方法，当然也只有

规定每个作品，必须写什么样的人，写什么样的事，怎样写法都得有一个谱，有一个“样板”，然后把四周围密密封闭，做到人人目不旁视，心无杂念，才能使他们放心。

幸而这种观点没有能阻挠这个译本的出版，而得到的却是广大读者热烈的反应，使我作为此书的介绍者获得不少的朋友。尤其不能忘怀的，由于翻译过程中与作者的通信，又由于作者为参加纪念活动来华访问，使我得与井上先生建立了友谊，并因此而幸运地读到他更多的作品。

但是过了不久，“黑云压城城欲摧”，袭来了林彪、“四人帮”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的风暴，和其它优秀的外国文学的译本一样，《天平之薨》也被戴上“封资修大毒草”的帽子，卷进在黑色的风暴里，遭到了封锁禁止的处分。作为当然的“黑线人物”，我的罪名本来已经够多，作为此书的译者，也成为我的十大罪状之一。无意中在劫余的文书中发现了一份当时的所谓“批判”稿，现在把它摘几句在这儿，或者也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楼适夷在本文（指我为《文艺报》所写的一篇介绍）中大肆替他所翻译的外国大毒草《天平之薨》吹捧……把这个唐代的和尚捧为“光辉的历史人物”。尤其令人难以容忍的，楼

适夷在替这株毒草充当吹鼓手时，还以肯定的口气重复了原作侮辱中国人民的那句话：“象天上的行云，象黄河的流水一样，飘泊于大地上的难民之群。”更使人感到愤慨的是：共产党员楼适夷在替这个唐代和尚吹嘘时，竟然大肆宣传宗教迷信，说日本与中国是“有缘的国家”，把鉴真捧成“学养深湛，德高望重，弟子遍天下，声誉满全国的高僧。楼适夷竟然完全丧失起码的立场，说鉴真“救世为怀，深入群众，是与人民有血肉连系的一位大宗教家！”……把他渡海去日本传佛教说成是“崇高事业”。说这株毒草“表现了这位历史人物的崇高的精神面貌！”

在“牛棚”里低着头亮听这样的所谓“批判”，又不准有一句申辩，那味道是可想而知的。可是想到挨“批判”的人和做“批判”的人只是形式上的不同，实质上是同样的受害者，对那时的所谓言论，本来也没有记起来的必要了。但从这儿明显地看出来，由于原来在脑子里多的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遇到文化专制主义的黑云，当然就会一拍即合。原来在心里嘀咕着的宣传迷信呀，封建毒草呀之类的想法，就畅通无阻地说了出来。更奇怪的，这位批判者对历史人物的阶级观点好

象非常鲜明，为什么作品中写到了在封建统治下，尽管表面的繁荣，仍掩不住人民的苦难……这种对封建王朝的揭露，却又成了对中国人民的侮辱了呢，好象他的阶级立场一下子又与唐明皇站到一起去了。现在重温一下过去这样的言论，倒不是为了秋后算账，而是借此当一面镜子，看看通过这样一场伟大的文化大革命，我们大家识别真假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水平，是不是有所提高？

我觉得很抱歉，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由于我的译本使一位国际友人的作者也平白无辜地受了波及，我应表示深深的歉仄。我更衷心地感谢，作者几年来多次访华中对我的关念。

现在黑云消散，天开日出，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的时期，文学艺术重新开展了百花齐放的盛况，

和许多世界优秀文学作品的译本一起，《天平之薨》有了重新出版的机会。井上先生把作了若干修订的新版赠送给我，希望我们重出的译本能依照新版加以订正。我把旧版和新版对读了一次，发现新版所修订的，大抵是关于作品故事发生时间的考订，及作者近年多次来华，访问了故事发生地点后，对自然风物、季候节气描写的若干修润，象这样经过修改的地方，也是极个别的。原来我准备只在旧译上作些修补，但重读十多年前自以为译得还可以的译文，却觉得处处都不顺眼了。更重要的是，由于自己和这本译书共同遭受过来的一番沧桑，想想最后的胜利毕竟属于毛主席的革命文艺政策，而对此书特别增厚了感情，便改变了自己从未重译一书的习惯，又把它作了第二次的翻译。

1979元旦于北京

---

## 《草叶集》的命运

十九世纪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草叶集》于1855年初次出版。当时出版社拒不接受这个诗集，并且也没有书店愿意卖他的书。惠特曼只好自己排版，自己写书评，并且把书拿到专卖骨相学、水疗法等书的店里去出售。

可是，诗集受到读者的欢迎。当时的著名作家爱默生热情地写信

给作者：“在这伟大前程的开端，我祝贺你。”直到1892年（惠特曼逝世的一年），诗集出版了第八版。

惠特曼逝世以后，大出版社才大量出版他的《草叶集》等书，因为他的作品价值已被社会公认，大出版社可以大捞一把了。美国的出版商就是这样对待作家的。（扬）

# 1978年诺贝尔 奖金获得者 艾萨克·辛格

梅绍武



“人不应该轻视任何情感。哲学家都轻视情感，尤其是斯宾诺莎，他认为人的一切情感都是罪恶。我却自信我们头脑里闪现的念头，不管多么微不足道，多么愚蠢，或者多么可怕，都具有一些价值。换句话说，抽掉人的各种情感，这个人不管他的思维多么合乎逻辑，也不过是个生活呆板单调的木头人。情感和人是同一性的。我特别对那种变为激情的情感感到兴趣。”

波兰裔美国作家艾萨克·巴什维希·辛格 (Isaac Bashevis Singer) 最近在谈到自己的作品时这样说道。他承认他的作品中心思想就是情感和激情。

艾萨克·辛格1904年出生在波兰当时为沙皇俄国所统治的地区，祖父和父亲都是犹太教长老。他本

人年轻时也在犹太教神学院里受过教育，但是他说，“我产生了怀疑，并不是对上帝的威力，而是针对犹太教所有的传统和教义。”十二岁时，他被陀斯妥也夫斯基的《罪与罚》这部小说吸引住了，立志宁愿做个作家，而不当教士。他十五岁开始用希伯来文写诗和短篇故事，后又改用意弟绪文为波兰的犹太报刊撰稿，另外还把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托马斯·曼的《魔山》等德文小说译成意弟绪文。1935年，他移居美国，任美国犹太人创办的《前进》日报社的编辑，并积极从事文学创作，1943年归化为美国公民。

辛格的意弟绪文作品大都先在《前进》日报上发表，然后再经他本人和一些译者的合作译成英文，登载在《评论》、《绅士》、《哈泼斯》、

《星期六晚邮报》、《纽约客》等报刊上。著名美国犹太作家索尔·贝娄也是他的作品英译者之一。

几十年来，他创作了大量的短篇小说和几部长篇小说，此外也写剧本和儿童故事。主要作品有：

1. 《撒旦在哥瑞》(长篇小说) (Satan in Goray), 1935年;
2. 《莫斯卡特一家》(长篇小说) (The Family Moskat), 1950年;
3. 《傻瓜金贝尔和其他故事》(Gimpel The Fool and Other Stories), 1957年;
4. 《卢布林的魔法师》(长篇小说) (The Magician of

Lublin), 1960年;

5. 《市场大街的斯宾诺莎》(短篇小说集) (The Spinoza of Market street), 1961年;
6. 《奴隶》(长篇小说) (The Slave), 1962年;
7. 《短暂的星期五和其他故事》(Short Friday and Other Stories), 1964年;
8. 《在我父亲的庭院里》(回忆录) (In My Father's Court), 1967年;
9. 《庄园》第一部(长篇小说) (The Manor), 1967年;
10. 《降神会和其他故事》(Seance and Other Sto-

· 西书随笔 ·

卡  
静  
论  
辛  
格

冯  
亦  
代

197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美国犹太作家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原是波兰人，1904年生，三十年代从德国纳粹的魔掌中逃出波兰，移居美国。他一生用意第绪\*语写作，再由他自己或其它作家译成英语，广为传播。他在作品中，借写神画鬼，对犹太人传统生活与美国现代生活的冲突，作了深入的哲理探讨，显示了故事巧妙安排的魅力，所以不止在美国拥有大量的读者，世界上懂意第绪语和英语的人中，对他顶礼膜拜的也大

\* 犹太人通用的国际语。

ries), 1968年;

11. 《产业》(The Estate), 1969年(《庄园》第二部);
12. 《卡夫卡的朋友和其他故事》(Friend of Kafka and Other Stories), 1970年;
13. 《仇敌: 一个爱情故事》(长篇小说)(Enemies, A Love Story), 1972年;
14. 《羽毛的皇冠》(短篇小说集)(Acrown of Feathers), 1978年;
15. 《舒莎》(长篇小说)(Shosha), 1978年;

辛格的作品情节生动, 富有趣味性, 文笔清晰简炼, 大都是描写波兰犹太人往昔的遭遇和美国犹太

人现今的生活, 其中也有不少是神秘的灵学和鬼怪故事。他说, “我最了解犹太人, 最熟悉意第绪语文, 所以我的故事的主人公和人物总是犹太人, 讲意第绪语。我跟那些人在一起感到自在。但是我并不单单因为他们讲意第绪语, 是犹太人, 才写他们。我对于人们所感兴趣的的东西同样感兴趣, 那就是爱情、背叛、希望和失望。”尽管辛格不承认自己是个十分受大众欢迎的作家, 但是他的读者范围却很广, 许多国家无论年龄大小、社会背景和信仰多么不同的读者都爱阅读他的长短篇小说。他的作品已被译成多种文字, 日本几乎把他的作品全部翻译出版了, 还出版过他的作品英文

有人在。

最近读美国文学批评家阿弗雷·卡静的《生活的灿烂之书》中有一段论到辛格, 颇为中肯, 有助于我们理解辛格的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今年将出版辛格的短篇小说选)。

卡静说, “……艾萨克·巴什维希·辛格把犹太人的全部历史转化而成为小说、寓言、故事。他按照自己的需要, 接受了这一历史。他是个怀疑宗教教条的人, 虽然承受了他所赖以成长的世界。在现代犹太人的作品中, 没有一个象他这样全面导源于正统犹太教的概念, 甚至是

东欧不可理解的传统。从来没有人把这种传统应付裕如地写入小说, 把故事说得机智、诙谐而又真实。辛格, 作为一个传统的小说作家, 用他超然的宿命论的平易语调, 总结了东欧意第绪的传统, 在犹太人小说的写作中, 表现了一种独特的一泻千里的笔触, 与索尔·贝娄和诺曼·梅勒\* 行文之波涛汹涌恰成对比。这是由于辛格虽具有犹太人的正统观念, 却对这一观念毫无信仰。他细致地描绘千百万人的生活

\* 二人都是美国犹太作家, 前者是197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版，附加日文注释。

在创作方法上，辛格不赞成人们模仿先锋派作家。他说，“一支卡夫卡式的队伍将把文学扼杀。”“卡夫卡和乔伊斯这样的先锋派作家对自己说：‘我不关心读者，或者评论家，或者任何别的人。我要说我想说的话。我只取悦于自己而不是任何别的人。’……如果一个作家模仿托尔斯泰——我觉得索尔仁尼津就在那样做——那不会出现什么灾难，因为他如果有天赋，试学托尔斯泰，即使不是百分之百的相像，也仍然是好的。可是你如果试想模拟卡夫卡和乔伊斯，而又没有他们那样的天赋，写出来的东西肯定很糟糕，因为只有一个了不起的天才

方式，却不带一点儿犹太人的多愁善感，事实上这一生活正是与这些生活于其中的人终会同归于尽的。辛格写东欧的叙述中十分突出魔鬼与精灵。他写‘美国’的生活中活着的犹太人所需要的东西。V. S. 波列希特曾经提到，‘当听了他的[辛格]所写的鬼魂因流离失所而作祟无门时，不免令人不寒而栗。’”

辛格作品中使人难以理解的精灵，究竟是什么呢？说出来也很简单，即信奉犹太教的教徒们要把犹太教的古老教条与规章，渗透到现代生活中去的全部努力的象征。一古一今，古的是刻板拘泥，今的则

有资格说：‘我只对自己说话。’”

辛格说他宁愿读十九世纪古典作家的作品，而不看毫无文学价值的侦探小说。他认为一篇故事应该富有趣味性以及让人一读就放不下的魅力。当今西方有些作家觉得只提供乐趣的作品是低级的写作，辛格却不以为然，他说，“十九世纪的许多伟大作家，如托尔斯泰、陀斯妥也夫斯基、果戈理和狄更斯，都提供读者以乐趣。巴尔扎克也如此。他们写一部长篇小说或一个短篇故事，都使用一些使读者悬念的宕笔法，使你一开始读它，就想知道下面是什么情节。”

辛格说他在写一篇故事之前，必须具备三个先决条件。第一得有

放荡不羁，这两者犹如水火之不相容，却又硬要揉在一起。这就引起了犹太人心智中的矛盾与危机。魔鬼要控制现代的犹太人，而上帝却又要在他的子民中间设置重重樊篱。人们感到迷惘，于是有的追索“自我”，有的则将一切归之于神灵或魔鬼。辛格可能是后一种人吧？因此，卡静在论辛格时便说，“辛格作品中这种难以理解的精灵，表现了在人世中成长的辛格对又一世界的信仰，但是这又一世界已经不一定非代表‘上帝’不可了。也许宇宙间的确有个上帝，因为我们被一种力量所掌握，而这种力量既超乎我

个情节，第二得有写那个故事的愿望，或者说激情，第三得有一种幻觉，认为只有自己能写出那样一个故事来。写完后，“我就把它交给读者或者评论家去评判，让他们作出结论。有时他们会从中发现有些可取之处，……换句话说，一篇故事一旦写就，就不再是你私人的财富了。如果有人以社会或心理的角度从中发现了真理，他是有权利这样作的。”辛格对读者的鉴赏和辨别能力深有信心，他说，“人与人尽管不同，总有许多共同之处。通过这一点，你理解哪个作家在说真话，哪个作家在编造谎言。……我甚至猜疑如果别的星球上也在写书，地球上设若有人能把它译出来，一个读者

也会辨别出它的好坏来。”他感谢读者经常指出他的作品中的错误和缺点。“我记得有一次我的一个故事中有点性爱的描写，只不过是‘于是她遵从了他的意志’这样的辞句，结果收到一个男人愤怒的来信，指责道，‘你怎么竟敢说出这样的话来？我们大家都有女儿，这些姑娘们有时也浏览你的作品。’”所以他说，“有读者在你的面前是件好事，正如舞台上的演员面前有观众一样。”

西方评论家认为辛格象一位摄影师，在保存那已消逝的犹太文化的最后一部分。辛格本人认为他仅有一刹那这样的感觉。“我从来没有怀着这种想法坐下来写作。如果我坐下来是为了保存意第绪语文，

---

们的理解力，又不是我们能改变它的。无论是属于上帝的，或是属于它的，奥秘都是一种象征而已。辛格只是把其名称变换，却并未与之叛离。”

辛格是波兰的犹太人，而东欧犹太人几千年来一直保留着极为浓重的犹太教传统。特别辛格的父亲是个笃信犹太传统教义的教士，因此他自幼深受犹太教规的熏陶。这种宗教熏陶，成为辛格内在的“真实”存在，而且似乎已深入到辛格连篇累牍的作品中去，变成了他的一种精神实体。犹太教把世俗世界看成是种“不洁”的存在，对之具有

戒心，因此宁愿远而避之，或视而不见，只顾自身精神的洁净，使一己可以超凡入圣。辛格在那篇《在我父亲的庭院里》，曾经描写他父亲一听见华沙街头受糟塌妇女的呼救声，便把书斋的窗户严扃起来。但是身为儿子的辛格，却对世俗好奇而又留恋，因之终于有一天，走到面临华沙街头的阳台，去一睹世俗的生活，而且把此亲眼所见的世俗，一丝不移地写了下来。他似乎在刹那间发现除了上帝的世界还有个世俗的世界，这一发现使他离开了犹太教的教义，而且他写来那样得心应手。他无法弥补这两个世



或者波兰的生活，或者在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或者带来和平，我就不成其为一个作家了。我没有这种幻觉。……我在写作时并没有那种好象自己在从事什么伟大事业的幻想，我只觉得自己非要讲个故事不可而已。”美国文艺评论家斯坦莱·爱·海曼把辛格同十九世纪的美国作家霍桑相比，因为两位“与其说是小说家，毋宁说是霍桑称之为‘传奇故事’的作家，与其说是短篇小说家，毋宁说是道德寓言和讽喻的作家。”也有的评论家认为辛格的短篇小说颇具契诃夫的风格。

在世界观上，辛格对于共产主义和斯大林抱有某些不正确的看法，但是他在《祖父和孙儿》这篇短

篇小说中却也真实地刻划了一个年轻的波兰共产党人的形象，由于他参加革命活动，不幸被捕而株连到他的祖父——一个虔诚的犹太教长老，老人在被押送入狱的途中也对宗教和上帝的公道产生了怀疑。

辛格最近出版的长篇小说《舒莎》，据1978年7月23日一期的《纽约时报书评》说，“是描写一个青年作家对他幼年的女友——思想迟钝、身体不发育的舒莎坚守不渝的爱情故事。……这部小说具有自传性质，记录了波兰三十年代大屠杀前夕犹太人居住区的生活情况，是一部华沙喧嚣的文学和政治生活的编年史，它也反映了犹太青年头脑中存在着异端的共产主义思

---

界的间隔，便只能用他出色的天赋和超然的观点，使犹太教的传统——接受上帝的法律，上帝的意志，甚至上帝的杀戮——转化为故事、传说和幻想。卡静说，“辛格是用他的轻松、平易、机智来说服读者的。”

由于辛格生活在美国，接触到美国的犹太人，这些犹太移民不自觉地自囿于祖先的习俗，但这些祖先的习俗却不见容于现实的美国生活，辛格就抓住这一矛盾加以讽刺讥嘲，得到读者的欣赏，终于由一个用意第绪语写作的人，一跃而成为美国的名作家。辛格笔下的犹太

人体现了犹太人的真正精神面貌：固然“我”有一定之规，现实既然不合我的“规”，唯一办法就是加以接受。犹太人原来就是种“逆来顺受”的人，因此这个民族虽然到处受异族人的歧视迫害，他们终能随遇而安，在人类好斗的夹缝里生存下来。辛格小说里的人物活着受上帝权力的主宰，死了则是应了上帝的感召。

所以，卡静说，辛格笔下的人物“这种神秘的忠诚，彻头彻尾的责任感，不只是个别的人物，而是他们的生活方式，成了辛格小说里的一种扎扎实实的东西。读者所看到

想和犹太教经文守则之间的斗争。主人公是个年轻的新闻记者、初露锋芒的小说家、长老的儿子和宗教怀疑论者、意第绪语言学家和追求女色的人——也许就是辛格这位艺术家年轻时的肖像。”这小说已是美国1978年下半年度畅销书之一。

1978年，辛格还根据他的同名短篇小说改写了一个剧本《颜特尔》在百老汇上演，颇受青年学生的欢迎。剧情是年轻妇女颜特尔由于笃信犹太教经文而女扮男装，希望成为长老的学生。后来，当颜特尔同美丽的哈达黛结婚的时候，后者却一直不知道她的丈夫也是个女人，事情就此变得复杂化了……。

辛格曾两次获得美国路易士·

兰姆德文学奖，又于1970年获得美国布兰代斯大学创作艺术奖和全国图书奖，1978年荣获瑞典诺贝尔文学奖。他现在是美国全国艺术和文学学会和美国艺术和科学院的会员，目前正在创作另一个剧本《泰贝勒和她的魔鬼》。

1978年夏季，辛格答一位他的作品英译者问时说，“如果他们（指中国人——梅）在最近几年学会了如何制造机关枪和飞机，他们也会懂得我所要说的话。我担心的只是我的作品是否值得翻译或阅读。”

据悉我国不久就将出版辛格的短篇小说选中译本，相信他的作品也会受到我国广大读者的欢迎。

---

的不是个别人物决定他一己生活的努力，而是经常为左右这个人物所受的文化力量在起着主宰作用……”

辛格也写一些犯罪的人，但是伴着这些人的却是魔鬼、精灵。这些魔鬼、精灵在辛格的小说中进进出出，自然得象是犹太人的亲友在串门子。至于他写的那些备受损害而又贪得无厌的美国犹太人角色，固然身在物质文明的美国，而他们赖以生活的源泉，还是东欧犹太人的古老传统。他们在这个邪恶的世俗世界里受尽了折磨苦难，但他们觉得自己并不生活在这个世界里，他

们只是“生活在一己想象之中，正如过去他们信教时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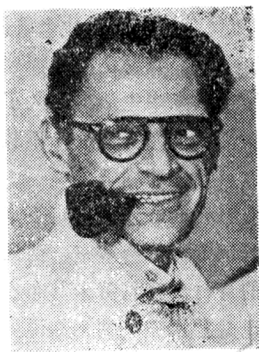
我读的辛格作品不多，但我认为卡静对辛格的剖析是很有见地的。因为当我在读美国其它犹太作家如索尔·贝娄的《霍佐格》，或是菲利普·劳斯的《管不了》，或是倍纳德·马拉默德的《伙计》时，我总感到这些小说中的人物，只是偶而寄居美国的犹太人，而不是已经渗透美国生活的美国犹太人。他们自有一个小天地，这个小天地与周围的美国生活气氛是多么的格格不入。

---

# 人类总会 走向大同

——记和美国剧作家  
阿瑟·密勒的谈话

苏叔阳



---

深夜，灯下，收音机播送着中美建交公报。这消息给人们带来喜悦和欣慰。中美两个伟大民族终于填平了沟壑，铺展开通往对方的道路。人类总是相通的，最终必将走向大同。互相隔膜岁月不管多么长久，在人类历史中毕竟是短暂的一瞬。我不由得想起今年秋天和美国著名戏剧家阿瑟·密勒先生的一次谈话。那时候我们就议论过这个题目，满怀深情地翘盼着太平洋两岸坚实的土地上早日搭起人民来往的天桥。这座桥出乎意料之快地搭起来了。我想，密勒先生和他的夫人也一定在大洋彼岸抚额称庆吧！

那是一个秋风飒飒的早晨，在对外友协的一间会客室里，我随剧

作家兰光、乔羽二位老师等待着和密勒夫妇见面。阿瑟·密勒先生是美国极负盛誉的剧作家，已经六十三岁了。他的剧本《都是我的儿子》、《推销员之死》、《维希事件》都是杰出的作品。和这样一位应当称之为老师的美国前辈交谈，我这个初出茅庐浑沌无知的后生，心情更多的是忐忑。不安的原因很多，一是因为我对于当代美国戏剧的知识等于零，怕没有交谈的资格；二是鉴于刚刚消逝的那段日子里凡涉外事务均需格外提心吊胆，我怕嘴上的哨兵失职，留下什么后患。所以，事先一再探询注意事项，临场又请二位老师予以“现场指导”。谁知剧协、友协的同志和两位前辈都说：

“随便交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一来，我反倒更其惶惑。人们在反常状态中生活得太久了，一旦恢复常态倒无所适从，不胜其恍惚，这也是个悲剧吧。

我的心还没有定下来，密勒夫妇就走进了会客室。两人都是高高的身材，穿着黄卡其布衣裤，与其说是艺术家，倒不如说更象普通的旅行家。密勒先生两眼炯炯有神，看上去十分健壮。他的夫人、摄影家英格·莫拉什更有着少年般活泼的性格，使人忘记她已经五十多岁了。她的汉语说得相当准确。据说为了这次访华，她专门到大学里去学习了两年汉语。这股热诚劲头就使我颇为感慨。

密勒先生看来很留心我们当代的戏剧。他一抓住我的手，听完我自报家门，立即就问我是否还在医学部门工作。接着就连珠炮似地向我发问，自生活至创作，乃至文学上的“禁区”，例如男女间的爱情，无不问个周详，使本来就紧张的我不禁汗颜。再加上莫拉什女士不断地以立式、蹲式、跪式从各个角度拍照，我简直希望这次谈话快快结束。北京的秋天暑气已退，会客室的温度绝不能说很高；冒着蒸气的热茶足以润口，但绝不至于使人出汗。然而我的手心却流出水来。可是密勒先生还要拍着我的肩膀兴致

勃勃地向我提问。突然，他提出“稿费”问题，对中国作家都有固定的工资表示不理解，说：“那么，中国作家不都成了业余作着了吗？”他对中国作家不能依靠稿费生活简直想不通，瞪大眼睛看着我们，解释再三，仍然耸着他宽大的肩膀。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国情。他的不明白正如我们不懂何以美国没有文化部一样。

接着，我们问起他美国戏剧界的情况。他侃侃而谈，我才渐渐松弛下来。据他说，美国的剧作家有这样几类：一种人把文艺当商品，他们的作品总是适应市民的低级趣味，这种作品没有什么真正的价值；一种人则是为统治者传言，作品也没什么好看；严肃的剧作家却总是不受到社会的欢迎，因为他们总是在批判社会，批判某些观念。他认为真正有价值的作品正是这些作家的著作。然而，严肃的艺术家实在苦闷，因为他们时时生活在同社会的斗争之中。在他看来，美国和中国的剧作家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在拚命地破坏某种观念，特别是统治者的观念；而我们则是极力维护或树立某种观念，这观念也正是我们的政府所需要的。从这里开始，谈话进入了哲学问题的探讨。他说：在美国，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机械更多地替代了人们生活中不少事

情。人们之间的依赖关系越来越淡薄，因此人们之间变得隔膜和冷淡。不少美国作家开始探讨人在社会和自然界中的地位与价值，不少人陷于悲观。他说中国目前是发展中国家，这个问题不突出，他不知中国现代化以后会不会产生同样的痛苦和弊病。我们告诉他，我们是乐观的，相信集体主义的精神会使人们之间永远温暖。他高兴地点头，长吁着气说：“但愿如此。”

这个问题引起我的深思。技术发达国家的生活，我没有亲身体会。科学的发展会不会使人的价值降低，也需要认真的考虑才能作出回答。但我知道，在剥削阶级社会里，人的尊严在金钱面前屈服却是实在的。高尔基在他的作品中不断讴歌人的价值与尊严，鞭挞践踏人的旧制度，真不愧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战斗作家。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毛主席早就指出人是最可宝贵的。然而林彪、“四人帮”猖獗之时，人的尊严与价值难道不是荡然无存了吗？诬陷、迫害，四处皆有，冤狱遍于国中，连那些功绩卓著的老一辈革命家都不能求得自身的安全。人的生命不被重视，灵魂也要受到蹂躏和扭曲。在我们的作品中提倡点“革命人道主义”，讴歌人的价值与尊严，揭露和批判“把人当作鬼”的“四人帮”，有什么不可以呢？！

惜乎我们有些同志一看见“人”、“人道主义”、“人性”这类字眼，不加任何分析就丹田火起，一概斥之为“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似乎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有八亿人口，就可以不重视人的价值。为什么我们要把尊重人的旗帜交给资产阶级呢？难道不正是为了要做人，无产阶级才起而革命的吗？难道“四人帮”那套法西斯摧残人民的罪恶行径还不应该遗臭万年吗？社会主义最重视人的价值也应当成为我们文学的主题，假如不是永恒的主题的话。

从人的价值说开去，我们谈到了人类光明的前途。我们说：美国的前辈剧作家同中国戏剧工作者坐在一起，彼此有很多共同的话题，这件事本身就证明对人类前途悲观的想法是没有道理的。追求美好未来的理想会把全世界的人最终连结在一起。人类总是要走向大同，相互之间的隔膜不管多么长久总是暂时的。人类有一个长长的光明的未来。密勒夫妇十分赞同这一点，他们都是乐观主义者。

会见就要结束了。我们请密勒先生告诉我们美国最近最有影响的文学作品。他热情地说了许多，可惜我们一本都没听说过。我们也列举了一些我们国内的译本，密勒先生也觉得茫然。可见我们“供批判用”的翻译外国文艺作品的办法，

实在欠妥当。翻译的既不是最新的，又不是最有影响和有代表性的作品，那“批判”也就失去了意义。知己知彼，不但应是克敌之诀，也应是交友之道。

短暂的谈话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它使我知道，当破除了精神枷锁之后，严肃的人们总是可以找到共同的谈资。我们不必强求人家改变自己的观点，却可以从中汲取有益的东西。文化是人类共同创造的，也只有在同外部世界的交流中才能更好地发展本民族的文化。现

在，科学的发展，使得我们这个星球显得狭窄了，宇宙间的联系也不再是纯粹的幻想。把别人的长处学来，把我们的优点赠给别人，“环球同此凉热”，才是既符合现实又合乎共产主义思想的态度。

写到这里，听见远处的收音机里播送着《国际歌》。这歌声所唱颂的理想，总有一天会实现。理想的实现要靠一步步的奋斗。我们的工作正多，道路也已经开辟，现在需要的是努力，努力，再努力！

1978年12月于北京。

\*  
\* \*

## 牛津大学出版社

英国的牛津大学出版社，成立于1478年，到1978年恰好是五百周年。它规模庞大，以出版《牛津英语词典》、《牛津英文引语词典》和大学教科书、学术参考书而负盛名。

牛津大学出版社是牛津大学的一个部门，属牛津大学所有。出版社没有股东，利润完全用于资助研究，以及负担出版小范围需要的或不能赚钱的学术著作的费用。如果遇到收支不能平衡，由牛津大学提

供资助。1978年交税后纯利润三百余万英镑。

出版社每年出版图书约八百五十种，经销图书约一千七百万册。分社和经售处，分布在纽约、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印度、巴基斯坦、日本等处。国内外雇用人员共约三千人。

1857年，迪安·特伦奇首次建议编辑《牛津英语词典》。1884年出版第一卷，至1928年全书出齐（主编约翰·默里）。增补本四卷在编辑中，预计1983年完成。二次大战后出版有《现代牛津高级英语词典》（已售出七百万册）和《牛津图解词典》等。（扬）

爱德华·卡德尔

## 《论新型的社会主义民主》

(金作善节述)

《论新型的社会主义民主》\*，是南斯拉夫已故著名理论家、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爱德华·卡德尔最近几年的新著之一。三联书店已选录于《南斯拉夫工人自治制度与经济发展概况》一书，将于1979年出版。

作者在“当代社会主义实践的两个中心问题”、“取消所有制的任何垄断形式”、“南斯拉夫社会所有制制度的实质”、“整个社会制度的变化和发展”等标题下，从理论上阐明了联合劳动法公布后社会自治制度中的一系列问题。兹节述如下。

### 当代社会主义实践 的两个中心问题

历史向当代社会主义实践连续提出两个问题：

首先，以作为劳动力和劳动场所活劳动的体现者的工人一方，同以支配社会资金的经济与政治权力的体现者为另一方的相互关系中的基本矛盾，这一矛盾不仅包含着一些非社会主义关系的因素，而且是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技术至上主义、国家专制主义、国家所有制的保守主义、大国霸权主义、个人崇拜等的根源。如果不解决这一

矛盾，就会损害社会主义发展的前景，社会主义社会就会停留在其过渡形式（虽然在社会主义革命后这种过渡形式是必要的）上，而社会主义的革命力量是不能满足于把这种过渡形式当作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和社会主义的理想。不仅如此，这种过渡形式已大大耗尽其内在力量，以至成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样的所有制外部形式才是社会主义自治的社

\* 贝尔格莱德社会主义思想和实践出版社1976年版。

会所必需的？也就是说，在存在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的条件下，在社会主义自治的条件下，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我们认为，国家所有制作为公有制的一种形式，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定阶段上是必需的，即使在将来，特别在马克思、恩格斯称之为剥夺剥夺者的阶段，这种形式的公有制也仍然是其他许多国家所必需的。但是，从历史观点来看，国家所有制的垄断，作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依旧同劳动力在一部分人手中而生产资料则在另一部分人手中的社会经济形态下的所有制范畴有牢固的联系。

但是，国家所有制的垄断，作为社会经济的和法律的范畴，仍然是所有制的经典范畴，而这就意味着国家所有制的生产资料并不同时是工人所有制的，也许只是由国家适度地体现着工人阶级的集体利益罢了。其实，在实践中，这种所有制的真正主体是国家、国家机构和国家机关，而不是工人。这就会出现这样的倾向：用国家机构以至国家机关的意志来代替工人的集体意志，由此就造成了消极的社会经济后果与政治后果。

联合劳动法为解决上述矛盾提供了更为有效的手段。

社会所有制要比任何时候任何其他形式的所有制，更能表现为人

与人之间关系的制度，而不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社会所有制是不会成为社会的某个主体如国家、劳动集体或个别工人的垄断权的。因此，社会所有制就是全体劳动者的共同的所有制，从而也就是每个个别劳动者的所有制，它保证劳动者使用社会资金从事劳动的权利以及由这个基本劳动权利决定的一切不可分割的权利。从积极意义上来说，社会所有制的确已成为人人有份的和属于大家的所有制，即共同的和个人的所有制。

但是，所有制原则本身不会因此而废除，由按劳动占有资金的权利所决定的那些所有制关系也不会因此而废除，只是这些关系的社会经济本质在发生变化。由于社会所有制是所有参加劳动的人和归根到底、至少在将来是社会全体成员共同的所有制，所以任何人都不应该依据这种所有制实行私人或集团占有，和在对其他工人的关系上谋求发号施令的地位。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到社会所有制问题时指出：“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



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32页）

### 取消所有制的 任何垄断形式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等著作中谈到所有制时，指出并不是要用国家所有制的垄断制来代替私人资本主义的垄断制，而是提出了这样一种见解：公有制应该成为集体的财富，更确切地说，应该成为社会全体劳动者的共同财富，而且归根到底应该成为社会全体成员的财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曾指出有可能出现的公有制的形式，并提到，公有制在开始时是以工人的阶级所有制形式出现的，之后是以社会全体成员所有制的形式出现的，开始是在一国范围内，最后是在国际范围内。同时，马克思还预见到，在革命过程中，在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有可能建立国家所有制，作为工人阶级在改变生产关系方面迈出的革命的第一步。国家所有制不是社会主义的目的，而是工人阶级的革命手段。

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确立，是

一个复杂的、漫长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是无止境的。在当代社会主义实践的条件下，正是社会所有制关系的发展，才是这个过程的基本动力，在这一发展过程中，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力量和主观力量有能力逐步取消任何形式的垄断制。

新的联合劳动法摒弃下述观点：国家所有制的垄断之所以有必要，是因为只有国家才能对社会的发展集中地加以协调和作出规划。在联合劳动中，只有业务管理机构才能支配社会资金。联合劳动法正在消除产生任何形式的生产资料垄断制的可能性，正在把这种可能性减少到最低限度，同时，把决定社会资金的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交给联合劳动基层组织的工人。

当然，根据法令规定，作为整个社会政治共同体的国家，将在各个方面继续发挥一定的作用，特别是在通过自治协议或社会协定不能顺利地处理由客观情况引起的利益冲突时，国家就会发挥一定的作用。

关于社会所有制关系的主要特征，有以下几点：

首先，工人有使用社会所有制生产资料从事劳动的权利，以及由此而产生工人的一系列其他不可剥夺的权利。如果工人自己行使与其他工人同等的权利，谁都不得使工人的这些权利受到损害。

其次，由社会所有制关系产生一个联合劳动基层组织的工人对其他联合劳动基层组织的工人和整个联合劳动的义务，以保证全体工人在行使自己利用社会资金从事劳动的权利（包括根据本人的劳动和按照共同规定的劳动定额获得个人消费资料）时，拥有相同的条件和同等的权利。

此外，工人要通过自己在联合劳动基层组织中的收入和自治权利，对扩大的和整个社会的再生产过程实行直接的监督与指导，并获得一部分收入。

这一切，使工人对社会的集体利益和公共利益负有责任。

### 南斯拉夫社会所有制 制度的实质

以自治为基础的联合劳动参加者与整个社会之间的这些关系的总和，就是我国社会所有制制度的实质。任何人（不管是个人、集体，还是国家机构）都不应单独地支配社会所有制的生产资料和再生产资料，不应不认真地对待他人的平等权利而单独占有某一部分的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保证参加联合劳动的每个工人有可能实现其使用社会生产资料从事劳动的权利，使每个工人在自由利用这一条件的基础上获得自己的个人收入，而这部分收入是同他现在劳动和过去劳动为社

会劳动总成果所作的贡献一致的。这样的社会所有制制度，是消灭任何形式的所有制的核心和开端。因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集体的即社会的所有制，将越来越多地反映按需分配的关系，而越来越少地反映按劳分配的关系。因而社会所有制就其实质而言，将越来越不再是限制按个人需要实行个人占有的一个因素。

在社会所有制的条件下，工人剩余劳动变动的方向已经改变。在存在着所有制的垄断制的社会，社会资金的流通，使资金不断地集中于经济或国家的上层人物手中，这种情况使剩余劳动与工人相分离，与民族相分离，并使经济与政治权力的垄断中心不断巩固，这种垄断中心越来越不受来自社会真正的监督。

新的联合劳动法确定了这样的关系：它把整个社会资金的循环归于联合劳动基层组织的工人指导。在任何阶段中实现的总收入，应该经常集中在联合劳动基层组织中。因此，在社会再生产这一过程范围内取得的一切成果，都应归于联合劳动基层组织的工人。这样，就可以不断增加收入，从而为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和整个社会条件扩大物质资源。

作为人与人之间阶级关系的因素的剩余劳动，实际上已不存在，

因为工人是把它当作社会生产总价值中用他自己的劳动所创造的那部分价值来支配的。这种作为剩余劳动的价值，已成为收入的组成部分，成为联合劳动基层组织的工人自己支配的社会资金的组成部分。

因此，全部新创造的价值，又不断返回物质生产领域的联合劳动基层组织，同时，其中一部分根据自治协议和社会协定，根据联合劳动法中规定的义务，和在自由交换劳动的基础上，变成物质生产领域以外的各个社会活动领域的收入，以用于满足共同的社会需要，另一部分则变成联合劳动基层组织的纯收入。而纯收入乃是个人消费和集体消费的源泉，也是积累的源泉。

在联合劳动法中，联合劳动基层组织的总收入或纯收入，并不是单纯被看作某个联合劳动基层组织的工人的劳动成果。这种收入是在商品生产的客观经济规律与市场的基础上和在社会再生产的过程中形成的。这就是说，较高的劳动生产率，通常会“提供”较高的收入，因而个别联合劳动基层组织的收入，与该组织工人的个人劳动量是有区别的。实际上可以说，在正常的经营条件下，联合劳动基层组织主要是根据某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实现自己的收入。因此，在一些联合劳动基层组织中，生产单位产品所耗费的时间会多于社会必要劳动时

间，而在另一些联合劳动基层组织中，则会少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种情况不仅取决于工人个人的劳动生产率及其主观意志，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生产要素的有机构成和工艺的性质。因此，联合劳动法不许可把一个联合劳动基层组织实现的一定量的收入，自动地用来作为个人收入量的标准，因为这样做会使不同的联合劳动基层组织的工人的收入水平之间出现很大差别。为此联合劳动法规定，原则上由联合劳动基层组织的工人独立地决定个人收入与集体消费的数量，但在这种情况下应遵守社会规定的关于劳动数量与质量的一定标准，这些标准可以使个人收入的变动最符合下列原则：等量劳动取得等量收入。

社会劳动的全部成果，都是集中于联合劳动基层组织、地方共同体和区里。因此，一切公民都可以观察和监督社会资金的变化及其使用情况。

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中，不应该对工人实行物质鼓励与精神鼓励？有的认为，物质鼓励是非道德的、非教育性的措施；有的则认为精神鼓励不过是一句空话，对工人毫无所得。实际上，这种抉择只有在这样的生产关系下才能进行：只有在工人只能支配自己的劳动力，而社会资金则处于工人经济上

与政治上的监督之外这样的生产关系下才能进行。在这种条件下，物质鼓励常常被归结为人们的特殊行贿，归结为为金钱而斗争和助长利己主义思想。但在另一方面，我们根据自己的经验而很好地懂得，在实践中，所谓的精神鼓励，常常变成强制手段，以实现唯意志地加以解释和编造的某种“崇高目的”和“崇高价值”。而在这种情况下，这种目的和价值或者是由国家机关，或者是由某种社会权威，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利益，而决不是根据工人的需要与利益而决定的。

早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初期，我们就曾强调指出，工人成为独立的、有思维的创造者，并且在其创造性的劳动过程中成为自由人，这种情况对于工人来说具有最大的鼓舞作用。但是，为此就应当自己支配物质资料，支配自己的劳动条件和成果。我国工人之所以在精神上得到鼓励，原则上是因为他通过自己的联合劳动基层组织，自己的收入和由运用社会生产资料从事劳动的权利中产生的自治权，在这样的物质基础上，他可以独立地和自由地发挥自己创造性才能。因此，工人在物质上也得到鼓励，因为所有他的全部创造性努力和成就，都会使其创造性活动的物质基础不断得到巩固，从而也使其个人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的物质基础

不断得到巩固。

同时，他在物质和精神上得到鼓励，还因为在他自由支配的资金的基础上来签订自治协议和社会协定，即把资金用于经济与政治领域、文化与教育领域的发展，使他所生活与依赖的社会环境得到全面的改善。因为使他得到最大鼓励的事情，就是每个工人和每个劳动者都能为建立这样的生产者自由共同体而奋斗。在这种生产者自由共同体中，他将成为一个同其他工人处于平等地位的有创造性的人。同时，他个人创造性努力的结果，以及整个生产者自由共同体的努力，将不断地创造出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使每个人尽可能地成为“自由幸福之创造者”。

这是一个历史过程，而不是今明两天就能完成的任务。

### 整个社会制度的 变化和发展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民主关系得不到发展，社会主义社会也就不可能前进。我们在同来自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自治的敌人的进攻作斗争的同时，为新型的民主和社会主义自治民主制度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在这种民主制度下，各党派之间开展竞争的必要性已经消除。同时，无论是劳动还是社会资金，都掌握在联合起来的工人

手中，掌握在他们的联合劳动基层组织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联合劳动和自治共同体中。

我们始终强调指出，共产主义者联盟并非一党制的体现者，并非典型的政党。换句话说，共产主义者联盟并不同其他政党争夺政权，它为之奋斗的是使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者一起，在社会中以直接的民主自治的形式而拥有真正的权力。不言而喻，共产主义者联盟作为工人阶级的思想和政治力量，作为这个阶级和全体劳动者有组织的先锋队，应当为之奋斗的就是要使这个政权的主要阵地掌握在坚定地站在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自治制度一边的那些主观力量的手中。

我们始终强调指出，我们所理解的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国家机关的专政，并不是国家专制主义的专政；就其实质而言，是反映无可争辩的工人阶级主导作用的革命形式，反映工人阶级管理社会这一历史的阶级利益之主导作用的革命形式。无产阶级专政在我国并不是被理解为防止社会民主化的权力，而是被理解为应当为这种民主广泛开辟道路并维护这一民主化的权力，但不是通过复辟资产阶级民主的方法，而是以社会主义自治为基础。

在我国社会中，不能不同所谓的绝对自由的辩护士们发生冲突，这些人实际上就是用所谓绝对自由

的口号来武装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自治的敌人的；不能不同对于民主自治的教条主义、保守主义的批评家们发生冲突，这些人力图用狭隘的集团的垄断，即官僚主义的一党制来取代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权。我们应当坚持这一斗争，并给这两种人以有力的回击。

无论是在自治制度中，还是在我国民主自治的机构中，都应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阵地出发，即从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自治的阵地出发，为创造性地发表意见提供更广泛的可能性。还应确定一些组织形式，以吸引最广大的群众参加决定社会政策；罢免和选举干部；自由地、创造性地解决与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自治社会进一步发展有关的思想上和科学上的问题；开展社会批评，其目的不是为狭隘集团的权力而斗争，而是为社会主义自治制度的发展；办好这样的刊物，这种刊物将自由地反映所有这些过程，但要在思想和政治上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自治制度负责。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不能以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道路去衡量别个国家的社会主义道路。如果那样做，就是强加于人，一定行不通。

《西行漫记》选录

## 彭 德 怀

斯 诺

本文是从《西行漫记》的新译本中选录的。新译本  
根据 1972 年版，并根据 1937 年版补充。——编者

### 彭德怀印象

我在八、九两月访问前线的时候，一、二、四方面军统一指挥的工作还没有开始。一方面军有八个“师”，当时驻守从宁夏的长城到甘肃的固原和平凉一线。一军团派出一支先遣部队向南向西移动，为当时领导二、四方面军从西康和四川北上，在甘肃南部突破南京部队纵深封锁的朱德开辟一条道路。预旺堡是位于宁夏东南部的一个古老的回民城池，现在成了一方面军司令部的驻地，我在这里找到了该军的参谋部和司令员彭德怀。\*

彭德怀的“赤匪”生涯是快十年前开始的，他当时在多妻的军阀省主席何键将军的国民党军队中领导了一次起义。彭德怀是行伍出身，先在湖南，后在南昌进过军校，毕业后，他因才能出众，迅获提升，一九二七年年方二十八岁就已任旅长，在湘军中以“自由派”军官著称，因为他办事真的同士兵委员会商量。

彭德怀当时在国民党左派中、在军队中、在湖南军校中的影

\* 我旅行到了这里，有黄华（王汝梅）前来作伴，他是燕京大学学生，是我要他来帮助我采访的。

响，使何键极为头痛。何键将军在一九二七年冬天开始大举清洗他的军队中的左派分子，发动了有名的湖南“农民大屠杀”，把成千上万的激进农民和工人当作共产党惨杀。但是因为彭德怀极孚众望，他不敢贸然下手。这一迟疑，给他带来了很大损失。一九二八年七月彭德怀以他自己的著名第一团为核心，联合二、三团部分官兵和军校学生，举行平江起义，又同起义的农民会合，成立了湖南的第一个苏维埃政府。

两年以后，彭德怀积聚了一支约有八千个兄弟的“铁社”（iron brotherhood），这就是红军第五军团。他以这支部队攻占了湖南省会长沙这个大城市，把何键的六万军队赶跑——他们大多数都是鸦片鬼。红军守城十日，抵御宁湘联军的反攻，最后因寡不敌众，又受到日、英、美炮舰的轰击，才被迫撤出。

不久以后，蒋介石就开始对赤匪进行第一次“大围剿”。这些围剿经过，前文已有概述。南方红军长征时，彭德怀是打先锋的第一军团司令员。他突破了几万敌军的层层防线，在进军途上一路攻克战略要冲，为主力部队保证交通，最后胜利进入陕西，在西北苏区根据地找到了栖身之地。他的部下告诉我说，六千英里的长征，大部分他是步行过来的，常常把他的马让给走累了的或受了伤的同志骑。

彭德怀过去既有这样一种斗争历史，我原来以为他是个疲惫的、板着脸的狂热领袖，身体也许已经垮了。结果我却发现彭德怀是个愉快爱笑的人，身体极为健康，只是肚子不好，这是在长征途上有一个星期硬着头皮吃没有煮过的麦粒和野草，又吃带有毒性的食物和几天滴粒不进的结果。他身经百战，只受过一次伤，而且只是表面的。

我住在彭德怀设在预旺堡的司令部的院子里，因此我在前线常常看到他。附带说一句，司令部——当时指挥三万多军队——不过是一间简单的屋子，内设一张桌子和一条板凳，两只铁的文

件箱，红军自绘的地图，一台野战电话，一条毛巾，一只脸盆，和铺了他的毯子的炕。他同部下一样，只有两套制服，他们都不佩军衔领章。他有一件个人衣服，孩子气地感到很得意，那是用在长征途上击下的敌机中缴获的降落伞做的背心。

我们在一起吃过好几顿饭。他吃的很少很简单，伙食同部下一样，一般是白菜、面条、豆、羊肉，有时有馒头。宁夏产瓜，种类很多，彭德怀很爱吃。可是，好吃惯了的作者却发现彭德怀在吃瓜方面并不是什么对手，但是在彭德怀参谋部里的一位医生前面只好低头认输，他的吃瓜能力已为他博得了个“韩吃瓜”的美名。

我必须承认彭德怀给我的印象很深。他的谈话举止里有一种开门见山、直截了当、不转弯抹角的作风很使我喜欢，这是中国人中不可多得的品质。他的身体健康、动作矫捷，为人幽默风趣，善于驰骋，又能吃苦耐劳。这也许一半是由于他不吸烟、也不喝酒的缘故。有一天红二师进行演习，我正好同他在一起，要爬一座很陡峭的小山。“冲到顶上去！”彭德怀突然向他气喘吁吁的部下和我叫道。他象兔子一般窜了出去，在我们之前到达山顶。又有一次，我们在骑马的时候，他又这样叫了一声，提出挑战。从这一点和其他方面可以看出他精力过人。

彭德怀迟睡早起，不象毛泽东那样迟睡也迟起。就我所知，彭德怀每天晚上平均只睡四、五小时。他从来都是不急不忙的，但总是很忙碌。我记得那天早上第一军团接到命令要前进二百里到敌区的海原，我多么吃惊：彭德怀在早饭以前发完了一切必要的命令后，下来同我一起吃饭，饭后他就马上上路，好象是到乡下去郊游一样，带着他的参谋人员走过预旺堡的大街，停下来同出来向他道别的穆斯林阿訇说话。大军似乎是自己管理自己的。

政府军飞机常常在红军前线扔传单，悬赏五万到十万元要缉拿彭德怀，不论死擒活捉，但是他的司令部门外只有一个哨兵站



岗，在街上走时也不带警卫。我在那里的时候，看到有成千上万张传单空投下来要悬赏缉拿他、徐海东、毛泽东。彭德怀下令要保存这些传单。这些传单都是单面印的，当时红军缺纸，就用空白的一面来印红军的宣传品。

我注意到，彭德怀很喜欢孩子，他的身后常常有一群孩子跟着。许多孩子充当勤务员、通讯员、号兵、马夫，作为红军正规部队组织起来，叫做少年先锋队。我常常见到彭德怀和两三个“红小鬼”坐在一起，认真地向他们讲政治和他们的个人问题。他很尊重他们。

一天我同彭德怀和他一部分参谋人员到前线去参观一所小兵工厂，视察工人的文娱室，也就是他们的列宁堂即列宁俱乐部。在屋子里的一道墙上有工人画的一幅大漫画，上面是一个穿和服的日本人双脚踩着满洲、热河、河北，举起一把沾满鲜血的刀，向其余的中国劈去。漫画中的日本人鼻子很大。

“哪是谁？”彭德怀问一个负责管理列宁俱乐部的少先队员。

“那是日本帝国主义者！”那个孩子回答。

“你怎么知道的？”彭德怀问。

“你瞧那个大鼻子就行了！”

彭德怀听了大笑，看看我。“好吧，”他指着我说，“这里有个洋鬼子，他是帝国主义者吗？”

“他是个洋鬼子，那没问题，”那个少先队员说，“但不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他有个大鼻子，但要做日本帝国主义者还不够大！”

彭德怀高兴地大笑，后来就开玩笑地叫我大鼻子。事实上，我的大鼻子在西方人的社会中是正常的，并不惹眼，但在中国人看来，外国人都是大鼻子。我向彭德怀指出，当红军真的与日本人接触后，发现日本人的鼻子同他们自己的鼻子一般大时，这种漫画可能使他们感到极其失望。他们可能认不出敌人，而不愿打仗。

“不用担心！”司令员说。“我们会认出日本人来的，不管他有没有鼻子。”

有一次我同彭德怀一起去看第一军团抗日剧团的演出，我们同其他战士一起在临时搭成的舞台前面的草地上坐下来。他似乎很欣赏那些演出，带头要求唱一个喜欢听的歌。天黑后天气开始凉起来，虽然还只八月底。我把棉袄裹紧。在演出中途，我突然奇怪地发现彭德怀却已脱了棉衣。这时我才看到他已把棉衣披在坐在他身旁的一个小号手身上。

我后来了解彭德怀为什么喜欢这些“小鬼”，那是他向我的再三要求让步，把他自己的童年的一些情况告诉了我的时候。他在自己的童年所受的苦，可能使西方人听来感到惊奇，但是却是够典型的背景材料，可以说明为什么许多中国青年象他那样投奔红军。

### 为什么当红军？

彭德怀生于湘潭县的一个农村，离毛泽东的诞生地不远。这个村子是靠湘江的蓝色江水旁边的一个富裕的农村，离长沙约九十里地。湘潭是湖南风景最好的一个地方，深深的稻田和茂密的竹林绣成一片绿色的田野。人口稠密，一县就有一百多万。湘潭土地虽然肥沃，大多数农民却穷得可怜，没有文化。据彭德怀说，“比农奴好不了多少”。那里的地主权力极大，拥有最好的地，租税高得吓人，因为他们许多人也是做官的——豪绅。

湘潭有些大地主一年收入有四、五万担谷子，湖南省有些最富有的米商就住在那里。

彭德怀自己的家庭是富农。他六岁那年死了母亲，他的父亲续弦后，后母憎嫌彭德怀，因为他使她想起了她的前任。她送他到一所老式私塾去念书，在那里常常挨老师打。彭德怀显然很有能力照顾自己：有一次挨打时，他举起一条板凳，揍了老师一下，

就逃之夭夭。老师在本地法院告他，他的后母把他赶了出来。

他的父亲对这次吵架并不怎么在意，但是为了迁就妻子，把这个摔凳子的年青人送去同他喜欢的一个婶母那里去住。这位婶母把他送进了所谓新学堂。他在那里遇到了一个“激进派”教师，是不信孝敬父母的。有一天彭德怀在公园里玩耍的时候，那个教师过来，坐下来同他谈话。彭德怀问他孝敬不孝敬父母，问他是否认为彭德怀应该孝敬父母？那位教师说，从他本人来说，他不相信这种胡说八道。孩子们是在他们父母在作乐的时候诞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正如彭德怀在公园里作乐一样。

“我很赞成这种看法，”彭德怀说，“我回家后便向婶母说了。她吓了一大跳，第二天就不让我去上学受这种可恶的‘外国影响’。”他的祖母——看来是个嗜血的专制魔王——听到他反对孝敬父母的话以后，“每逢初一月半、逢年过节，或者刮风下雨的日子”就跪下来祷告，祈求天雷打死这个不孝孽子。

接着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这最好用彭德怀自己的话来说：

“我的祖母把我们统统看做是她的奴隶。她抽鸦片烟很凶。

---

## 胡愈之谈

---

### 《西行漫记》

---

#### 中译本

---

#### 翻译出版情况

---

《西行漫记》中译本是一九三八年一月在上海出版的。当时，胡愈之同志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采取群众自己组织出版、发行的办法，用“复社”名义出版了这一著作。出版以后，流传极广，对于宣传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政策特别是关于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丰功伟绩，起了重要的作用。最近胡愈之同志回忆了当时的情况，向三联书店同志作了介绍。这里发表的是由三联书店同志整理的谈话记录，曾经胡愈之同志审阅。

我不喜欢闻鸦片烟，有一天晚上我再也忍受不住了，起身把她的烟盘从炉子上踢了下来。她大发脾气，把全族都叫来开了会，正式要求把我溺死，因为我是孝的孩子。她对我提出了一大串罪状。

“当时族人已准备执行她的要求。我的继母赞成把我溺死，我的父亲说，既然这是一家的意见，他也不反对。这时我的舅舅站了出来，狠狠地责备我的父母没有把我教养好。他说这是他们的过失，因此孩子没有责任。

“我的命就得了救，但是我得离家。我当时才九岁，十月里天气很冷，我除了一身衣裤外身无长物。我的继母还想把我身上的衣裤留下，但我证明这不是她的，这是我生身的母亲给我做的。”

这就是彭德怀闯世界的生活的开始。他起先当放牛娃娃，后来又做矿工，一天拉十四小时风箱。工作时间这么长使他吃不消，于是他就离开煤矿，去当鞋匠学徒，一天只工作十二小时，这已是个大改善了。他没有工资，过了八个月他又逃跑了，这次去到

---

一九三七年“八一三”前后，上海成为前线。上海人民抗日情绪很热烈，很多外国记者来到上海采访抗日消息。国民党反动政府当时被迫抗日，在上海搞了个文化界救亡协会，由潘公展主持。为了装点门面，也请我们的同志参加。在这以前，抗日救亡是被禁止的。现在国民党不得不抗日了，要想欺骗群众，就成立救亡协会。救亡协会与救国会名称差不多，一般群众不易识别。而实际上救国会的沈老等人当时还在狱中。这个救亡协会成立

不到二个月，十月间，国民党军队从淞沪撤退，也就无形解散了。但是由中共和救国会人士所组成的地下抗日团体依然存在。

救亡协会成立后，我们决定参加进去。他们不让我们搞国内宣传，我们就想了一个办法，在救亡协会下面成立一个国际宣传委员会，专门对外国记者发布消息，由我们掌握。我是这个委员会的负责人。每天下午三时，在上海国际饭店楼顶召开茶话会，招待外国记者。上海的中国报纸的总编辑也参

烧碱矿做工。矿井歇业后，他再一次得去找工作。身上除了一身破烂以外仍一无长物。他去修水渠，终于有了个“好差使”，拿到了工资。二年攒了一千五百文——大约十二元钱，但换了军阀后，原来的纸币成了废纸，他又一文不名。灰心丧气之下，他决定回家乡。

彭德怀现在十六岁，他去找一个有钱的舅舅，就是那个救了他一命的舅舅。那人自己的儿子刚死，他过去一直很喜欢彭德怀，就欢迎他去，留他在家。彭德怀爱上了自己的表妹，舅舅对婚事也颇赞同。他们请一个古文先生上课，在一起嬉戏，计划将来的共同生活。

但是这些计划被彭德怀的无法抑制的暴躁脾气所打断了。第二年，湖南发生大饥荒，成千上万的农民赤贫无依。彭德怀的舅舅救了许多农民，但是最大的一所米店是一个大地主开的，靠此大发横财。有一天有二百多个农民拥到他家中，要求他把大米平价卖给他们——这是在饥荒之年一向要大善士做的事。但这个有钱人拒绝讨论，把人们赶走，闭上了大门。

---

加。会上我们请国民党部队的代表来报告战讯，公布消息。当然，他们都是吹牛，没有什么真实的报道，外国记者也不感兴趣。那么我们怎么做工作呢？我们把从当时秘密的中共临时办事处（即八路军办事处的前身）那里得到及听到的军事消息，编成文稿，立即译为英文，印成单张。等到国民党部队的代表一讲完，就把这材料分送给记者，他们非常欢迎。通过这办法，我认识了很多外国记者。

我同斯诺也就是这么认识的。

当时斯诺的公开身份是燕京大学教授，由于北京沦陷，他来上海当记者，替英美报刊写稿。我知道他住的地方离我家不远，就常去看他。他对我说去过陕北，还给我看过许多照片。有一天他说，刚得到英国航空寄来他的一本著作的样本。外国出版社有规矩，要把印出的第一本样书送给作者审查，所以这在当时是很难得的。我就向他借阅。他答应了，但说我也只有一本，看完还我。这就是后来闻名世界的《西行漫记》英文原本。

彭德怀继续说：“我正好走过他家，便停下来看示威。我看到有许多人都已饿得半死，我知道那个人的米仓里有一万担大米，可是他却一点也不肯帮穷人的忙。我生气起来，便带领农民攻打他的家，他们把他的存粮都运走了。我事后想起来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做。我只知道，他应该把米卖给穷人，要是不卖，他们把米拿走是应该的。”

彭德怀又得逃命，这次他已够年岁可以当兵。他的军人生涯由此开始。不久之后他就成了一个革命家。

他十八岁上当了排长，参加了推翻当时的省长、一个姓胡的督军的密谋。彭德怀当时受到军中一个学生领袖的很大影响，这个人遭到了督军的杀害。彭德怀负了刺杀督军的任务来到长沙，等他有一天上街时扔炸弹过去。这颗炸弹却是虎头蛇尾的，象中国小说中的情况一样：它没有爆炸。彭德怀逃走了。

不久之后，孙逸仙博士担任西南联军的大元帅，打败了胡督军，但后来又又被北洋军阀赶出湖南。彭德怀同孙逸仙的军队一起南逃。后来他奉孙逸仙的一个将领程潜的命令从事谍报活动，到

---

我回家读了这本书，发现真是一本难能可贵的著作。但我不知道斯诺这个人的底细，说的是否可靠，就找上海中共临时办事处刘少文同志了解。刘少文同志是从陕北来的。他说，有这回事，斯诺确实到了陕北，毛主席亲自接待他，谈了很长时间。毛主席有个把月时间每天找斯诺谈，谈完后，斯诺把英文记录整理出来，再由人译成中文送毛主席改定。刘说，斯诺这人可以相信，对我们确是朋友态度，这本书也是可以译的。于是我决心组

织力量把它翻译出版。

当时上海租界号称“中立”，各种具有革命或抗日倾向的书都不能出。大出版社都已迁往内地，抗日团体已转入地下。因此，出书很困难。当时，我们有些同志组织了一个“星二座谈会”，每星期二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地下室餐厅集会，讨论研究抗日宣传问题。我在这个会上提出了出这本书的问题，大家都同意，就由参加座谈的同志分别承译。我们当时都认识到，翻译这本书很重要，因为自从我们党长征以

了长沙以后被叛徒出卖遭到逮捕。当时湖南当权的军阀是张敬尧。彭德怀对他这段经历是这么叙述的：

“我每天受各种各样刑罚约一小时。有一天晚上我被手足反绑，在手腕上缚一根绳子吊在梁上。狱卒们在我背上堆上一块块大石头，站在周围踢我，要我招供——因为他们至今仍没有弄到我的证据。我昏过去了好几次。

“这样的刑罚继续了一个月。每次受刑后我常常想，下一次得招供了，因为我实在受不了这种刑罚。但每次我又决定不屈服，坚持到第二天再说。最后他们从我口中得不到什么东西，出乎意料地释放了我。我一生中最惬意的一件事是几年以后我们〔红军〕攻克长沙时把这个用刑室摧毁了。我们放了关在那里的好几百名政治犯——其中许多人由于挨打、虐待、挨饿已奄奄一息。”

彭德怀重获自由以后就回到他舅舅家去看他的表妹，他想同她结婚，因为他认为自己仍有婚约。他发现她已死了。他于是又去当兵，不久就第一次任军官，派到湖南军校学习。毕业后他在鲁涤平部下第二师当营长，到家乡驻防。

---

后，一般群众已不大知道党的情况，国民党又拚命造谣。通过斯诺的著作把真实情况报道出去，作用是极大的。

翻译问题解决了，怎么出版呢？决心发动群众自己来搞。大体算了一下，估计出版后定价一元。就征求预订，先交订款一元。一下子就征得了一千本订金，用这款买纸。排印问题是这么解决的：当时商务印书馆内迁了，印刷厂还有的没搬走，工人失业了，他们中间有人同我熟，找我要事做。我就请他

们印这本书，工人很高兴。我们没钱，工资只好等出书以后付。工人同志真是热情，工作进行得非常迅速。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开始翻译，到一九三八年一月出书，前后也不过一个月时间。这说明译者和排印工人都是了解出版这本书的意义的。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们遇到困难处理的地方，常常去问斯诺，得到他的帮助。他还给中译本写了序，提供了照片，有些是英文本原来所没有的。书中还有一些译名，是请刘少文同志帮助解决的。

“我的舅舅死了，我听到消息后就请假回去奔丧。路上我要经过童年时代的家。我的老祖母还活着，八十多了，身体还很健，她听说我回来，走了十里路来迎我，请我不要计较过去。她的态度非常谦恭。我对这一转变感到很奇怪。是什么原因呢？我马上想到这不是因为她个人感情有了什么转变，而是因为我在外面得了法，从一个无业游民变成一个月挣二百元大洋军饷的军官。我给老太太一些钱，她以后就在家里赞扬我是个模范‘孝子’！”

我问彭德怀受到什么书籍的影响。他说，他年青的时候读过司马光的《史记鉴》\*，第一次开始对军人应对社会负有什么责任有了一些认真的考虑。“司马光笔下的战争都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只给人民带来痛苦——很象我自己的时代里中国军阀之间的混战。为了要使我们的斗争有一些意义，为了实现长期的变革，我们能够做些什么？”

彭德怀读了梁启超、康有为以及其他许多对毛泽东也发生过

---

\* 应为《资治通鉴》。——译注

---

这本书是通过群众直接出版的，但对外总也得要一个出版名义。我临时想了一个“复社”的名义。在书上没印“复社”的地址，实际上它就在我家里。书的发行，也是群众自己办理：先发售购书券，然后凭券取书。这本书初版出后很快销掉，接着再版、二版、三版……，受到意外的欢迎。但它们都没在书店里出售，而是群众自己组织印发的。我于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八日在本书中译本前言中说过：“这是复社出版的第一本书，也

是由读者自己组织，自己编印，不以营利为目的而出版的第一本书。这种由读者自己组织出版的事业，是一种冒险的却是成功的试验。”

这里可以顺便说一下《西行漫记》书名的来历。斯诺的原书名直译过来是《中国天空上的红星》，在当时的情况下当然不能照译。我们就改用一个隐讳些的书名。为什么要叫《西行漫记》？因为在工农红军长征以后，关于我们党在西北情况的比较真实客观的报道，只有一本书：范长江同志写的《中国的西北



影响的作家的著作。有一个时期，他对无政府主义也有一些信仰。他从陈独秀的《新青年》中知道了社会主义，从此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国民革命正在酝酿中，他当时任团长，觉得有必要用一种政治学说来激励他的部下的士气。孙逸仙的三民主义“比起梁启超来是个进步”，但彭德怀感到“太含糊混乱”，虽然当时他已是国民党员。布哈林的《共产主义入门》使他觉得是“第一次提出了一个实际合理形式的社会和政府的一本书。”

到一九二六年彭德怀已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简介、《新社会》（一个著名中国共产党员著）、考茨基的《阶级斗争》以及许多对中国革命作了唯物主义解释的文章和小册子。彭德怀说，“以前我只是对社会不满，很少看到有进行根本改革的希望。在读了《共产党宣言》以后，我不再悲观，开始怀着社会是可以改造的新信念而工作。”

虽然彭德怀到一九二七年才参加共产党，他在自己的部队里吸收相信共产主义的青年，办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训练班，成立士兵委员会。一九二六年，他同一个中学生结了婚，她是社会主义

---

角》。范长江同志当时是《大公报》记者，他跟随国民党部队去了西北，写了一系列关于红军的报道，后来集印为这本书，限于当时条件，不能写得很明显，但是已经很受欢迎了。从此，“西”或“西北”就成了我们党所在地的代称。《西行漫记》这书名，一般人看了就可以连想到我们党。

《西行漫记》出版后不久，一九三八年五月我离开上海去汉口，主要是为了筹集经费准备出版鲁迅全集。但是由于郭老要我参加第三厅

的工作一直没回去。我在外面看到《西行漫记》影响很大。香港的出版商翻印了许多，远销南洋，对于华侨起了很大作用。甚至可以说，它的中译本在旧中国起了比英文本更大的作用。

斯诺原来是个资产阶级新闻记者。他之所以能写出这本书，同毛主席对他的教育帮助分不开。毛主席对斯诺做了大量工作，把他的资产阶级思想改变过来，他才能写出这本书。要不然，就是写了也不能写得这么动人。

青年团团员，但在革命期间，他们分了手。一九二八年以后彭德怀就没有见到过她。就是在那一年七月，彭德怀举行起义，占领了平江，开始了他的叛逆或土匪——看你怎么叫——的生涯。

他在把这些青年时代和斗争的情况告诉我时，他手里执着一个用蒙古马鬃做的苍蝇拍，为了强调语气，漫不经心地随手挥舞着，一边在屋子里踱来踱去，说说笑笑。这时有个通讯员送来了一束电报，他开始看电报时又突然成了一个严肃的司令员了。

“反正，要说的就是这么一些，”他最后说。“这可以说明一个人怎么变成‘赤匪’的！”

董乐山译

## 《斯诺在中国》 在编译中

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写过许多报道和著作，描述了旧中国劳动人民的苦难，介绍了毛主席的生平和革命业绩，报道了解放区的创建和新中国的成就，记载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重要谈话。他对中国革命人民和领袖的深厚感情和忠实态度，在促进中美人民之间的友谊方面起了示范的作用。作为新闻记者，他的报道态度和写作风格也值得学习。毛主席和周总理对他都有过很好的评价。

多少年来，斯诺的作品在

国际上流行，唯独中国人看不到。大家迫切希望读到斯诺的著作。但“四人帮”仇恨毛主席，迫害周总理，对斯诺求全责备；他们阻挠了斯诺著作的出版。粉碎“四人帮”之后，这种障碍扫除了。三联书店现正编译一本《斯诺在中国》的选集。内容第一部分是斯诺有关中国著作的选译，大体上以所写的史实先后为序，主要选自《西行漫记》、《河的彼岸》、《复始之旅》、《漫长的革命》等。第二部分关于斯诺的著述。另收一部分有关斯诺的照片。

本书由裘克安负责编集和审订译文，参加译校工作的还有：董乐山、汪衡、李庄藩、叶笃义等。

---

裘克安

## 埃德加·斯诺 作品介绍

---

美国友人埃德加·斯诺一九〇五年出生于堪萨斯城，父亲是一个小印刷出版商。他在密苏里大学新闻系毕业后不久，于一九二八年带着很少的钱出国。到了上海遇到《密勒士评论报》的编辑鲍威尔，被留下做助理编辑。从此一直做新闻工作，为美英报刊写过上千篇通讯稿，在二次大战期间成为报道中国、苏联和印度情况的名记者。从一九二八到一九四三年期间大部分时间他呆在中国。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美帝国主义采取对华敌视政策，斯诺和中国的关系被割断十余年。以后于一九六〇、一九六四、一九七〇年，他三次访问了新中国。现在把他发表过的十一本书介绍如下：

1.《远东前线》，一九三三年九月出版。

此书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真相。对于九一八、一二八、制造伪“满洲国”和“华北停战

协定”都有较详细的报道。斯诺的反帝立场在那时就很鲜明。他写道：“明天他们的军事理论将是：为了保卫热河，需要占领华北。昨天他们的军事理论是：为了保卫日本关东‘租借地’，必须占领满洲。更早一些，他们的军事理论是：为了保卫本国，

必须占领朝鲜。真是帝国主义的美妙逻辑！正是这样，英国在印度赢得了帝国；也正是这样，法国在印度支那赢得了帝国。”斯诺对于当时我党在江西苏区的斗争有一些传闻，他是这样写的：“共产党的革命，或者说农村的革命，在继续发展，城市知识界对它的同情在增长。但是这个运动（基本上是穷得没有办法的人为争取谋生经济条件的斗争），并无证据表明它拥有为统一和统治中国所必需的力量、知识和政治组织，虽然它具有很大的热忱。它迄今的做法表明，它的胜利大概将意味着暴民统治的胜利。”

2.《活的中国》，一九三六年出版。

这是斯诺选编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对所收作品大多附有作者的传记材料。斯诺对鲁迅的评价很高，把他同高尔基和契诃夫相比。又说：“鲁迅的性格给我印象很深，

他具有广阔的人性和热烈的同情心，对周围的生活观察敏锐，我相信他的作品所提供的（对中国社会生活的）解说一定会引起人们的兴趣。”书中除收鲁迅的《药》、《一件小事》、《孔乙己》、《祝福》、《风筝》、《他妈的》和《离婚》以外，其余柔石、茅盾、巴金、沈从文、肖乾、郁达夫、张天翼、郭沫若、沙汀等作家各收一二短篇。这是向英语国家介绍中国新文学的最早选集之一。

**3.《西行漫记》，一九三七年出版。**

这是斯诺访问我陕甘宁边区后向外界介绍我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名作。原名《红星照耀中国》，当年胡愈之等同志在国统区翻译出版时取名为《西行漫记》。除斯诺的采访报道外，书中包括毛主席自述生平珍贵史料。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当时外界对我党政策和革命实践了解很少，斯诺秘密访问以后写了此书，粉碎了国民党的封锁和诬蔑，震动很大。国内许多青年读后，走上革命的道路。国际上它成了畅销书，很快有了好几种其他外语的译本。斯诺自己说过，从此“我的写作带上了政治行动的性质”。就是说他对中国人民的斗争采取了更加积极的支持态度。这时反动派企图诋毁这本书，一些修正主义分子也攻击斯诺歪曲了中共的政策，针对这事，毛主席曾亲自作了

驳斥。一九三九年斯诺重访边区时，毛主席在一次干部大会上把斯诺介绍给大家，说他“写了一本真实地介绍我们情况的书”，肯定《西行漫记》是正确地报道了中共的政策和毛主席的主张。斯诺在一九六八年对本书作过修订，一九七一年又作了第二次的修改和补充。

**4.《为亚洲而战》，一九四一年出版。**

此书描述了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的情况，包括八一三进攻上海及其后的南京大屠杀。接着描述了武汉、广州的沦陷，重庆的遭轰炸，国民党的一片败迹。同时斯诺写了新四军的成立和抗战，说：“在这场战争中，中国正在输掉每一个战役，然而中国是处在得胜的一边”，表明了他对中国人民能够战胜侵略的信心。书的后半部介绍了工业合作社运动的缘起和发展，然后是长篇报道作者在一九三九年重访解放区的见闻，重申了民主、自由的中国必胜的信心。

**5.《人民在我们一边》，一九四四年出版。**

这本书是斯诺在珍珠港事件后直到一九四四年期间对印度、苏联和中国国统区采访的综合回顾。前两章写甘地领导的非暴力抗英和争取独立的运动；中间大部分介绍苏联人民反法西斯的艰苦斗争和斯大

林格勒的辉煌胜利；倒数第二章揭露了重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批评了蒋介石的反动著作《中国之命运》。总的意思是说印、苏、中广大人民在反法西斯的进步事业中起着巨大作用。

6.《苏联力量的格局》，一九四五年出版。

绝大部分篇幅是描写苏联人民群众反法西斯斗争的实况。也介绍苏联的内外政策，特别是对解放后的东欧的政策和即将转而对付日本帝国主义的东方政策。书的中间有一章叫“两个中国”，是关于国民党和共产党政策的对比。

7.《斯大林需要和平》，一九四七年出版。

这本小书以事实说明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人民在战后迫切需要和平，因此主张美国同苏联和平共处，反对当时西方的反苏叫嚣。

8.《红色中国杂记》，一九五七年出版。

这是斯诺应费正清等人之请而整理出版的。他在一九三六到一九四五年间有关中国解放区的零星笔记，是过去在写《西行漫记》时未曾利用的。这里有少量毛主席、周恩来和其他领导同志的谈话，我党一些领导人的简单传记资料，以及关于西安事变的情况。还有一节是美国总统罗斯福于一九四二年二月、一九四四年五月、一九四五年三月

三次接见斯诺的谈话要点，表明罗斯福读过《西行漫记》和斯诺的报道，对于中国解放区和中共领导的游击战很有兴趣，而对蒋介石国民党则逐渐失望。

9.《复始之旅》，一九五九年出版。

这是斯诺的自传，从头回顾了他的经历。书名取意于庄子的话：“消息盈虚，终则有始。”他把自己的一生分为四阶段：结婚以前的流浪不定的生活；在北京定居后对中国人民斗争的同情和支持；一九四一年回美后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观感；“冷战”的阶段。这本书穿插了一些回忆和思考，材料跟他以前的著作有所重复，不过文笔比较精炼。书中谈到，他已赢得“报道一贯准确的名声”。甘地曾对他面誉道：“我们尊重你的诚实态度”。但是正因为如此，他就遭到美国政府的指责。我们知道，由于斯诺曾经同情中国共产党，同情苏联的反法西斯斗争，因此到了“冷战”时期，特别是麦卡锡主义在美国猖獗时期，斯诺在美国就逐渐呆不下去，在新闻界也“吃不开”，最后不得不到瑞士过着寄寓他乡的寂寞生活。

10.《今日红色中国》，一九六二年出版。

这本书在美国首次出版时名为《河的彼岸》，书前引用了十七世纪法国哲学家巴斯卡尔的话：“法律正

义竟以河为界，多么可笑！……还有什么事情能比这更加可笑呢：一个人居然有权杀死我，仅仅因为他住在河的彼岸”。这里“河”只是人为国界的代名词。斯诺引用这几句话，是为了讽刺美国对华敌视的政策，主张抹掉中美人民之间的界线，说明他写这本书的目的在于向美国人民介绍“河的彼岸”的真实情况。后来为了读者容易懂一些，才换了《今日红色中国》的书名。他在前言里说到，有一段时间，中国对他也不很欢迎（主要由于苏联不欢迎他）。特别是美国政府不让他访华。他经过不少斗争，才取到护照和签证。在书中，斯诺以极大的热情介绍了我们建国十三年来各方面的成就。他记录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谈话，描述了与他们重叙旧谊的欢快。据说毛主席对斯诺说过：我们很长时间没见面了，这期间你没有变，我们也没有变。这书最末一章的标题叫做《前面的长征》，对中国的前途寄予希望，并且分析了美、日、苏同中国的关系，主张美国对华友好。本书也有一个修订本，是一九七〇年出的，斯诺加了一篇《七十年代的中国》的新序，还作了一些旁的修改。

11. 《漫长的革命》，一九七二年出版。

这是旁人整理的斯诺遗稿。斯诺夫人洛伊斯写道：“这是一本未完成的作品——一个被我的丈夫的突然逝世所打断的开端。这本书里有着中美人民新关系的种子。如果我们加以培育，种子将会成长。”这本书主要记录了毛主席和周总理在斯诺于一九六四——六五，一九七〇——七一年两次重访中国时同他的谈话，介绍了一九七〇年这次访问的某些印象。斯诺本在准备写一本篇幅大得多的关于中国的书，可惜未能实现。

斯诺的通讯文字，散见于许多美英报刊，特别是关于他在一九四七到一九六〇年间的新闻写作活动，对了解他的生平很重要。从斯诺自己的著作中了解到，他对自己有几次通讯报道是颇为得意的，认为自己尊重事实，调查详尽，所以能够正确判断形势，作出相当准确的预见。例如，一九三六年六月他预断了日本还要大举侵华，中国人民会起而抵抗，发生战争；一九四一年七月他判断希特勒侵苏是走上灭亡之路；一九四三年十月他推测苏联和日本不免一战；一九四八至四九年他根据苏南关系预测“中国不会变成俄国的卫星国”。这些地方的确说明斯诺调查研究比较踏实，能够进行独立思考。

# 一个奴才的成长

——《臣仆》中臣仆的青少年时期

傅惟慈节述

长篇讽刺小说《臣仆》是德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一部代表作。这部作品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威廉二世当政时期德国的一个小城市为背景，通过造纸厂老板赫斯林的发迹史，勾划了当时德国社会三大力量——保皇党、自由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勾结和斗争，展示给读者一幅当时德国社会生活的图画。主人公赫斯林具有帝国主义时代德国资产阶级的典型特征。他对德皇无限忠诚，对进步势力极端仇恨，为人欺软怕硬，左右逢源，是德国皇帝的忠实臣仆。但是在奈泽西这个鄙陋的小城市里，赫斯林却凭着自己两面三刀的本领扶摇直上，不仅纸厂的生意兴隆，而且当选为地方议员，成为当地炙手可热的人物。自由党同社会民主党右翼在书中也各有自己的代表人物。前者虽然对现状不满，但懦弱无能，不肯也无力同反动力量进行斗争。后者，书中描写了一个工贼式的人物。这个人热衷走议会道路，忙于作官发财，根本不关心工人的疾苦，反而同保皇势力互相勾结。《臣仆》一书的作者亨利希·曼是德国批判现实主义一位伟大的作家。在这部作品中，他以犀利的语言和漫画式的手笔为我们勾划出一个个既可惜又可笑的小丑式的人物。特别是对主人公的描写，作者用粗线条的笔触进行了无情的嘲讽，但又处处细致地写出他的内心深处的活动。读者越感到这一人物的可信，也就越感到他的灵魂的可鄙。这种对反面人物的刻划法别具一格，很值得从事文学创作的人研究。亨利希·曼(1871—1950)自上一世纪末开始写作，著有大量长短篇小说和政治论文。他的作品密切结合时代，对资本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作了比较深刻的揭露。希特勒登台后，作者流亡国外，1950年病逝于美国。长篇小说《臣仆》即将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下面是该书第一章的节要。

狄德利希·赫斯林是个懦弱的孩子，什么都害怕，最喜欢的是梦想。有时候他坐在花园里读一本童话书，偶然抬头一看，吓得魂儿几乎出了壳：他身旁的长凳上分明坐着一只癞蛤蟆，身躯足有他一半大！要不然就是一个小矮人，下半身埋在土里，正在墙脚下向他眨眼呢！

比小矮人和癞蛤蟆更加可怕的是他的父亲，动不动就抡起手杖来。但是，凭良心说，小狄德尔还是爱他父亲的。每逢他偷了嘴或者说了瞎话，就吧哒着嘴，在父亲的写字台旁含羞带愧地磨来蹭去，直到赫斯林先生发现了不对头的地方，从墙上取下手杖为止。

儿子刚刚让父亲教训了一顿，红肿着眼睛，呜呜咽咽地走过工厂，工人们都哈哈大笑起来。小狄德尔向他们吐吐舌头，跺跺脚，心里说：“不错，我是挨了打，可是那是我父亲打的。你们连挨打的资格还没有呢！”

狄德利希一会儿吓唬这些工人说，要把他们喝啤酒的事向厂主告发，一会儿又把父亲回厂的时刻透露给他们，向他们买好。女工有时候从旧衣服上拆下几颗纽扣，如果被狄德利希撞见了，就一定得送他颗作贿赂。日久天长，他的纽扣已经积攒了不少。有一天他居然异想天开，用他积攒的扣子向小贩掉换

了糖果。可是当天晚上，当他嘴里嚼着最后一块麦芽糖跪在床上作晚祷的时候，却禁不住浑身嗦嗦发抖。他乞求那可怕的上帝，不要把这件事揭穿。上帝并没有买他的账，事情还是被父亲发现了。老狄德利希不只把儿子痛打了一顿，而且气得老泪纵横，怎么，他竟养了一个作贼的儿子？

真是可怕呀，一个人竟要受这么多暴力的威胁！癞蛤蟆呀、父亲呀、亲爱的上帝呀、警察呀……可是比起这些暴力来，这回小狄德尔落到它掌心的才真正要他的命呢！他被送到学校去了！他一路走一路嚎啕大哭，而且因为哭得太厉害，连他本来会的功课也忘记了。但是这也不无好处，从此狄德利希逐渐学会，每逢他功课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就往外挤眼泪。就这样他靠着抹眼泪躲过了不少场灾难。可是对于第一次识破他这一机关的人，他却又敬佩得五体投地。他蓦地安静下来，从捂着脸的手臂后面心悦诚服地望着这位老师，心里扑腾扑腾地乱跳。但是尽管狄德利希对学校怕得要命，却并不因此而稍微有半点儿勤奋。在厉害的老师面前他总是规规矩矩，对于和善的老师他就耍耍一些小把戏。他总不让老师抓着把柄，而且事后也决不炫耀。每逢挨了严厉惩罚或者被批了最坏的分数以后，他谈起来反而有些沾沾



自喜。吃饭的时候他向家里报告：“今天贝恩克先生又揍了三个人。”要是问起打的是什么人，得到的回答是：“有一个是我。”

学校是一架把个体彻底轧碎的冷酷无情的机器，狄德利希在里面受尽折磨，但是他却因为自己也是这一权势一个渺小组成部分而非常自豪。在级任老师过生日的那天，讲台和黑板都用花束装点起来。狄德利希甚至把老师惯常用来抽打自己的一只藤棍也缠上了花枝。他对于“权势”从心坎里感到敬服。

狄德利希常常受同学欺负。在他每次被人殴打的时候，连手也不还，充其量不过说：“别打脊梁，那容易落残疾。”但是他的恶劣处境有一天终于改变过来了。那是在四年级的时候，班上有一个犹太同学，是全班学生戏弄的对象。狄德利希有一次别出心裁，想出一个惩治这个犹太鬼的花招来。他拿当绘图模型用的大木块在讲台上搭了一个十字架，用尽力气把这个犹太同学按在上面。虽然对方拚命挣扎，狄德利希却死不放手。论力气狄德利希本不如这个犹太学生大；他之所以表现得这么勇敢，是因为周围的一片喝采声和校内校外数目占绝对优势的后盾力量。行动的虽然是他个人，罪责却人人有份。

一阵陶醉消逝以后，接踵而来的是轻微的恐惧。但是在狄德利希

看到第一位老师的赞许的面孔后，心就完全放下来了，他甚至还报以谦逊的微笑。从发生这件事以后，他博得了级任老师的欢心，成了班上一名优秀的学生和专门打小报告的人。他跟全班同学交情都不坏，听别人谈论他们的调皮行为时，他也跟着笑起来，而且笑声是那么真挚、爽朗。可是在他到老师那儿去交值日簿的时候，却把听到的一切都作了汇报——谁给老师起了外号，谁发表了叛上作乱的言论……狄德利希对那些因为他的活动而影响了学习前途的人并无个人恩怨，事情过后他甚至还对他们表示同情；他只不过毫不徇情地执行了必然规律交给他的任务而已。

由于他把在学校厮混的这一套办法摸得烂熟，他的各门功课渐渐都能对付下来。自从升入最高班以后，毕业文凭已经稳拿到手了。老师也好，父亲也好，都开始考虑让他深造的问题。毕业后，狄德利希到柏林去进了大学。

在刚到柏林的一段日子里，狄德利希有时想家想得掉眼泪。因为害怕走迷了路，除非万不得已，总是足不出户。平时他连饭也不敢吃饱，生怕在月底以前把钱化亏空了。此外，他还常常摸摸衣服口袋，看看钱是不是还在里面。但是，逐渐地狄德利希开始习惯于这一陌生的环境了。休假日，他开始

到父亲的一位老友家去串门，陪这一家人逛动物园，甚至还同这家的姑娘发生了一点儿爱情的纠葛。但是他这时的胆怯和自卑束缚了他的手脚。狄德利希在情场上的得意，是他性格成熟以后的事。这是后话，此处暂且不提。

通过一个中学老同学的介绍，狄德利希参加了柏林的一个大学生社团“新条顿社”。“新条顿社”是一个誓忠德皇、培养爱国思想、锻炼坚毅性格的“非常高贵的”组织，对狄德利希政治观的形成和性格的发展大有裨益。开始的一段日子，狄德利希所要做的只是陪着其他社员坐在一家啤酒馆里唱爱国歌曲，不断往肚子里灌啤酒，常常醉得人事不省，滚到桌子底下去。狄德利希在这个社团里感到怡然自得，因为他在这里一举手、一投足都只要随大流就成了，不用自己抛头露面。更重要的是，他既然是这样一个组织的成员，躲在人群里，谁也伤害他不得。但是过了一段日子，祸事来了：狄德利希被要求参加一次击剑，因为只有通过击剑才能成为正式社员。狄德利希看到别的社员挥舞棍子给他表演刺杀动作，有时还看见哪个人脸上刻划上伤疤，散发着一股碘仿的气味，不禁吓得毛骨悚然。但是现在要想逃出来，为时已经太晚了。他被戴上头盔和护眼镜，开始练习击剑。第一次被人

刺中的时候，狄德利希差点儿晕倒。经过一段练习，他的心才逐渐安定下来。这些人只是想培养锻炼他，谁也没有伤害他的意思。而且正是那个他平日最害怕的人，担任了他的教练和保护人。

狄德利希在“新条顿社”学会了上流社会的礼规，培养了忠君爱国的坚贞思想。他的保护人，后来当了检察官的一个极富于贵族风度的大学生，开口就是“德皇陛下”，闭口就是“颠覆思想”、“祖国的敌人”，对狄德利希的思想影响很大。不只是思想，就是他现在的仪容和举止，也都是这个团体培育出来的。比如说，他的白团团的面孔，他的令一年级新生肃然起敬的凸出来的肚皮，他有资格在节日穿的高统皮靴和戴的三色帽。特别是他脸上落下的几道剑疤，直贯面颊，是他的忠君思想和尚武精神的不容置疑的标记！

可惜好景不长，欢乐的大学生生活就要结束了。狄德利希要去服军役了。在检查身体这一天，他站在一群年轻人中间，衣服脱得精光，等着军医过来检查。军医官的目光落到狄德利希的肉皮通红的大肚子上，脸上现出讥嘲的神情。周围的人随着望去，也都吃吃地笑起来。“我们会把您身上的肥肉治好的。四个星期的军役，保证您象一个基督徒的样子。”军医官威胁

说。狄德利希不禁吓得胆战心惊，回去以后马上给一位开业医生写了封信，请求开一张证书给他，证明他患有癩瘰和软骨症，不适合服军役。医生拒绝了。狄德利希别无他法，只好硬着头皮把房子退掉，拎着一只手提包到兵营去报到。哪怕只在兵营里待两周呢，也能节省半个月房租。

单杠、跳高、跳远以及诸如此类的令人喘不过气来的操练马上开始了。各种操练唯一的目的是使入伍的士兵手脚片刻不得停闲，免得你去胡思乱想。军队里的原则和理想跟“新条顿社”实际上没有什么两样，都是要把个人的尊严践踏净尽，只不过体现的方式更加残酷无情而已。谁要是稍有反抗的意图，就意味着疯狂和毁灭。人们所能做的，最多也不过是偶而装装病罢了。有一次狄德利希在跑步的时候摔倒了，把腿跌了一下。本来不致于就跛起脚来，但是他却一瘸一拐地走不好路了。他到连长面前请求免除出操：“报告连长……”。真是罪该万死，狄德利希竟一时糊涂越级向这样至高无上的权力搭起话来！连长大发雷霆，班长们一个个吓得面无人色，结果狄德利希跛得更加厉害了，不得不停止出操一天。

在餐厅里聊天的时候，狄德利希常常对他的班长说，士兵的生活使他感到欢欣鼓舞，如果能一辈子

待在队伍里，他就不虚度此生了。他当时这样说倒不完全是违心之论，可是这并不妨碍他在野外操练时又产生另外一种愿望：但愿他能永远躺在壕沟里让世界再也没有自己这个人。他非常希望自己的脚严重起来，能够严重到这种地步，不再出操，干脆让他回家去。

最后，狄德利希在一个星期天去拜访了一个过去社友的父亲，这个人是卫生部的谘议，凑巧同军医官有些交情。费了不少周折，狄德利希总算办好了因脚病免役的手续。在班长正式通知他退伍的时候，狄德利希难过得落下泪来。“这种事怎么会偏偏挨到我头上啊？我在部队里是那么从心坎里感到高兴，我真想一辈子……”。他已经泣不成声了。

他在家闭门待了几个星期，之后，又重新在“新条顿社”社员跟前露了面。“你们没有服过役的人是想象不出来的。在部队里一个人学会了从新的立场看待一切。我本来都想干它一辈子了，我的一些长官都对我说，我非常适合干这一行。可是，咳！……”狄德利希同大家讲了他的脚如何被一匹劣马踢伤的故事，也搭着他自己没有把这只病脚搁在心上，过早就参加操练，这才落得……。所有的人都非常感动。狄德利希神气十足地向周围打量了一遍，不胜感慨地说：

“咳，没有法子，现在又得重新过老百姓的生活了。来，干一杯吧！”

狄德利希一生所要扮演的伟大角色——忠诚的臣仆——，化妆已经完毕，就等他粉墨登场了。要知道我们的主人公大学毕业，回到故

乡奈泽西城以后，如何继承父业，用爱国主义思想经营整顿造纸厂，如何坑害别人爬上议员的位置，如何巧计夺取了别人的未婚妻……，一句话，如何施展全副损人利己、两面三刀的本领，青云直上，《臣仆》一书会一一向您交待的。

## 编者的话

我们这个月刊是以书为主题的思想评论刊物。它将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为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而服务。

我们这个月刊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自己的指导思想，要坚决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要解放思想，敢于打破条条框框，敢于接触多数读者所感所思的问题。

我们这个月刊，要有评论、《笔谈》、书的评介、新书序跋、作者介绍、读书札记、《书讯》、书摘、装帧评价、出版界消息，以及关于书和出版工作的知识小品等等项目。希望能够做到新颖、鲜明、生动、活泼，有文有图；希望能够成为读者和作者之间的桥梁。

我们主张改进文风，反对穿靴戴帽，反对空话套话，反

对八股腔调，提倡实事求是，言之有物。

我们这里发表的各种文章，文责由作者自负，决不以我们的观点强加于人。

我们自知力薄，想的和做的之间有一段距离。希望读者和作者们能给我们支持，提供宝贵的意见，共同办好这个刊物。

## 稿约

本刊各个项目都欢迎来稿。

编者对来稿如有修改意见，当提请作者考虑。如作者不同意修改，编者当尊重作者意见，可以不加修改。

引文、引用的材料和数目字等，请作者自行核对。

来稿望用有格稿纸书写。

来稿一经发表，酌致薄酬。

# 文史工具书及其用法(一)

武 雷

初读古书的人，特别是刚刚学习文史等专业的青年人，在阅读古籍时，常常被书中的一些人名、地名、官名、典章制度和典故等所困惑，不了解以上这些专名和典制的具体内容，就谈不上对文章内容的理解。要了解这些专名和典制的内容，除去广泛地阅读有关史料和文章获取阅读古籍的基本知识外，还必须善于利用各种工具书。

工具书种类繁多，有综合性的工具书，各学科乃至各个专题性的工具书，各有各的用途。这里只能就最一般的、常用的关于查人名、地名、年代和典章制度的工具书及其使用向初学的读者作一介绍。

## 一、怎样查找历史人物及传记资料

读一篇文章或研究某一个问题的，首先就会碰到一连串的人名，如果对文章中提到的人物的事迹一无

所知，非但不能很好地理解文章的内容，简直就不能读下去。如《司马迁报任安书》中有一段话：“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这段文字，若不清楚文中提到的各个人的事迹，就不可能理解司马迁所表达的思想感情。就拿“孙子膑脚，《兵法》修列”这句来说，“孙子”是谁呢？我国古代军事家有两个“孙子”，一个是孙武，一个是孙臧。这里说“孙子膑脚”，当然就是孙臧了。孙臧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如果我们对他是哪个时代的人也不清楚，那么就需要先查一下人名辞典。

最通行的查人名的辞典是臧励觥等编的《中国人名大辞典》。其他各科的人名辞典有谭正壁编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孙毓公编的《中

《中国音乐舞蹈戏曲人名辞典》等。这里着重介绍一下《中国人名大辞典》。这部辞典所收中国人名，上起远古，下迄清末，收入人名约四万余条，我们读书时，所遇到的人名，在这部辞典里一般都能查到。此书在每一人名下都注明姓名、字号、时代、籍贯、生平事迹，有著作的还扼要举出书名。书后附有《姓氏考略》和《异名表》。现以上举的“孙臧”为例，我们用四角号码检字法，查得孙臧条：“孙臧[战国齐]武后，生阿鄆间，与庞涓俱学兵法于鬼谷。庞为魏将，嫉臧之能，阴使召臧，至则以法断其足。齐淳于髡使魏，窃载归，威王以为师。齐伐魏以救赵，臧坐辎车中计谋，大破梁军。后魏攻韩，韩告急于齐。齐将田忌直走大梁，涓去韩而归。臧使齐军入魏地，涓倍日并行逐之，臧度其行，暮当至马陵，令善射者夹道伏。涓至，万弩俱发，乃自刭。齐乘胜大破其军。臧以此名显天下。”从这里我们已经对孙臧的事迹有了一个概括的了解。但这部辞典的体例是，关于人物事迹，并不注出处。若要详细了解人物的事迹，并查找原始资料，那就不是这部辞典能够解决的，需要去查传记索引一类的工具书。

常用的传记索引一类的工具书，有二十五史刊行委员会编的

《二十五史人名索引》，梁启雄编的《二十四史传目引得》，朱士嘉编的《宋元方志传记索引》，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编的《四十七种宋代传记综合引得》、《辽金元传记三十种综合引得》、《八十九种明代传记综合引得》、《三十三种清代传记综合引得》，陈乃乾编的《清代碑传文通检》等。我们要查的人物，凡是二十四史里有传或有专载的，都可以在《二十五史人名索引》或《二十四史传目索引》里查到。如上所举“孙臧”，我们通过《二十五史人名索引》查到孙臧的传记在《史记》六十五卷孙武的附传即有孙臧的长篇传记。如果我们要查的人物，在二十四史里没有传记，可按时代查以上所举引得或索引。

为了解决查阅二十四史中不列传的人名和便于查阅一人在某一史的所有资料，中华书局正在出版各史的人名索引，已出版的有鍾华编的《史记人名索引》、张忱石编的《晋书人名索引》。例如：前几年发掘的长沙马王堆墓，墓主是“轶侯利仓”，由于《史记》《汉书》没有他的传记，在《二十五史人名索引》里查不到，但一翻《史记人名索引》，就查到在《史记》十九卷九百七十八页（标点本）上有。此外，这本索引，在每一名字之下详列人物的字号、封号、谥号、别名等，从哪一个角度都能查到，使用起来很方便。

古代人除姓名之外，又有字号、别号、室名。特别是文人，一人往往有许多别名、别号。如明末清初的学者傅山，一人竟有三、四十个别名、别号。这样的别名别号经常在著作、文章、题跋、书信中出现，给读者造成一定的困难。这里即以“傅山”为例，来介绍怎样查找别名、别号。

傅山，初名鼎臣，字青竹。后改名山，字青主，一字仁仲，别署公之它、公他、朱衣道人。又字斋庐。又号石道人、随厉、六持、丹产翁、丹产子、浊堂老人、青羊庵主、不夜庵老人、傅侨山、侨黄山、侨黄老人、侨黄之人、酒道人、酒肉道人、老孽禅、真山、侨黄真山、五峰道人、龙池道人、龙池闻道下士、观代翁、大笑下士等。如我们在读书时遇上“青羊庵主”这一别号，我们就应去查《古今人物别名索引》（陈德芸编）、《室名别号索引》（陈乃乾编）、《中国历代书画篆刻家字号索引》（商承祚、黄华编）等书。现以《室名别号索引》为例。我们在该书的八画“青”字条下找到“青羊庵 明阳曲 傅山”。用同样的方法，也可查到其他的别号、室名。但由于此书所收不足两万条，有的室名、别号在这里找不到，就需要和其他同类的工具书参互使用。

除去室名、别号之外，封建时

代的帝王将相又有谥号。所谓谥号，即人死之后，根据他的一生行事给以适当的称号以表示褒贬。后世的封建文人往往对他的前辈不称名号而称谥号，以示尊崇。常用的有关这方面的书如[清]刘长华编的《历代名臣谥法彙考》、[清]陆费墀编的《历代帝王庙谥年诤谱》等。

查找人名还必须注意避讳问题。在封建社会里臣工晚辈是不能称谓君主和尊长的名字的。说话临文，凡遇上君主和尊长的名字，就要采取各种办法回避。避讳的办法大致有三：一是空字，如唐太宗名李世民，“徐世勣”的“世”字犯讳，就空作“徐勣”。二是缺笔，如孔子，名丘，后人写丘字作“丘”，丘姓也改做“邱”。清宣宗名“旻宁”，“宁”字也写作“寧”。三是改字，如汉文帝名“刘恒”，改“恒”字为“常”，于是“恒山”改为“常山”，“田恒”改为“田常”。唐玄宗名“李隆基”，因“基”与“几”同音，就把唐代著名的史学家“刘知几”，改称字，作“刘子玄”。但到了清代清圣祖名“玄烨”，又把“刘子玄”改作“刘子元”。这种例子并不少见。这样改来改去，给古代文献造成不必要的淆乱。

封建时代的文人还要避“家讳”。所谓“家讳”即指父祖的名字。如《司马迁报任安书》中有这样几句话：“昔卫灵公与雍渠载，孔子适

陈；商鞅因景监见，赵良寒心；同子参乘，爰孙变色；自古而耻之。”其中“同子参乘”的“同子”是谁呢？一查《汉书》，原来“同子”指的是“赵谈”。因司马迁的父亲叫“司马谈”，司马迁为了避家讳，就把“赵谈”改为“赵同”，亦称“同子”。象这样的例子，古书里是不少见的。

诚然由于历代避讳，造成文字混乱，给读者带来不少困难。但后来的学者，利用避讳的时代特点及其规律，来辨明古书的时代和版本的真伪，成为校勘辨伪的一种手段。

关于避讳方面的常用工具书有：[清]黄木骥编的《避讳录》、[清]周槃编的《二十二史讳略》、陈垣著的《史讳举例》等书。《史讳举例》一书是避讳学总结性的著作，对读者最为有用。全书共分八卷。卷一，避讳所用之方法；卷二，避讳之种类；卷三，避讳改史实；卷四，因避讳而生之讹异；卷五，避讳学应注意之事项；卷六，不讲避讳学之贻误；卷七，避讳学之利用；卷八，历朝讳例。此书关于避讳一门学问全面系统，读者从这本书里可以得到避讳学的基本知识，又可作为工具书来使用。

不懂避讳，往往会闹出笑话。《后汉书·儒林传》：“孔僖因读吴王夫差时事，废书叹曰：‘若是所谓画龙不成反为狗者。’”刘敞注曰：“按

古语皆云画虎不成，此误。”刘敞不知此是避讳，还以为“龙”字误。《后汉书》为章怀太子李贤所注，唐室的祖先名“李虎”，李贤避家讳，改“虎”为“龙”。《野客丛书》三十指出：“此非误，盖章怀太子避唐讳所改尔。正如令狐德棻《后周书》引韦昭，古人称‘不入兽穴，焉得兽子’同意，亦避虎字，非误也。”刘敞是宋代有名的史学家，因不明避讳，竟闹出这样的笑话。避讳之学的重要，于此可见一斑。

关于人名的称谓，除上举各种异称外，还有以封号、姓氏加官名以为称呼的，如汉朝的张良，也可称“留侯”、“张丞相”，韩信可通称“淮阴侯”等。也有以姓氏加地望郡望以为称谓的，如明代的张居正，因系江陵人，也称之为“张江陵”。凡此，都需要在读书时认真注意。

在读书和研究某一问题时，往往需要了解某一人物的生卒年齿、字号、籍贯等，当然去查他的本传会得到详细系统的材料。若只是为了知道一下以上的情况，简便的办法是去查关于人物生卒年表的工具书。常用的这类工具书有姜亮夫编的《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梁廷灿编的《历代名人生卒年表》、张帷骧编的《疑年录汇编》等。这里以《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一书为例，介绍它的用法。此书自上古至一九一九年，共收一万二千余人，



按生卒年的次序排列。每人之下注出姓名、字号、籍贯、岁数、生年、卒年、备注等六项，在生、卒两项内又注明帝号、年号、年数、干支、公元等项，备注栏内注明资料的出处。例如我们要查东汉时科学家张衡的生卒情况，先在书后索引里十一画“张”字下找到“张衡”，后面注明生于公元78年，我们在正文里按

顺序就能找到。

关于张衡生卒的简略情况，表里已经交代清楚了，同时也为进一步查考详细资料提供了线索。若需要，可按备考所注去查后汉书张衡传和张衡年谱。这里需要注意一点，若写书、写文章引用年表里的资料，应当再去和原始资料核查，以免以讹传讹。 (待续)

## 美国一九七七年 书籍出版种数的统计数字

据美国《出版商周刊》1978年8月一期的报道，美国1977年出版的书籍种类比1976年略有增长，许多门类的书籍平均价格大幅度上涨。该年，美国共出版各科门类的书籍42780种，其中包括再版书9488种。按种类分，详见下表：

	新书	再版书
农业	455	139
艺术	1481	314
传记	1563	541
商业	839	238
教育	997	197
小说	2317	1364
辞书	1151	297
历史	1427	595
家政学	695	100
儿童读物	2626	292

语言	407	149
法律	725	223
文学总类	1200	666
医学	2233	600
音乐	207	166
哲学、心理	1089	283
诗歌、戏剧	1043	394
宗教	1736	385
科学	2474	541
社会学、经济	5602	1212
体育、娱乐	907	212
技术	1784	434
旅行	334	146
总计	33292	9488

以上统计数字未包括美国政府出版物和各大大学的博士论文在内。

(梅)

---

# 一九七九年新书部分目录

-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成仿吾译) 人民 0.21
-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  
论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编译局编) 人民 0.29
- 辩证唯物主义讲座(裘麟等) 青年 0.17
- 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黑格尔)(贺麟、王太庆译) 商务 1.80
-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费尔巴哈)(涂纪亮译) 商务 1.05
- 学点逻辑(哲学社会科学基础读物)(倪鼎夫等编) 人民 0.29
- 赋税论;献给英明人士;货币略论(威廉·配第)(陈冬野等译) 商务 0.45
- 战后美国第六次经济危机(武汉大学经济系) 商务 0.33
- 历史辩证法论集(吴江) 人民 1.20
- 理想·情操·精神生活(陶铸) 青年 0.26
- 青春与理想(赵政民) 青年 0.24
- 美好的青春属于谁(方文) 青年 0.21
- 青年运动回忆录(一)(张爱萍等) 青年 0.45
- 有法才能治国 人民 0.15
- 尉缭子注释(八六九五五部队理论组等注) 上海古籍 0.43
- 官渡之战(中国历史小丛书)(张习孔) 中华 0.08
- 中国近代史稿(一)(近代史研究所) 人民 0.98
- 祖冲之(中国历史小丛书)(曹增祥) 中华 0.10
- 吴玉章回忆录(吴玉章) 青年 0.65
- 磨难虽多心无暇(怀念罗瑞卿同志) 人民 0.46
- 印度尼西亚简史(厦门大学历史系) 商务 0.26
- 日中友好运动史(日中友协中央本部编)(吴晓新等译) 商务 0.74
- 莫尔和他的《乌托邦》(外国历史小丛书)(施茂铭等) 商务 0.12
- 林肯传(卡尔·桑德堡)(云京译) 三联 1.90
- 尼克松回忆录(中)(尼克松) 商务 1.45
- 文史(第五辑)(中华书局编) 中华 1.50

论文学(卢那察尔斯基)(蒋路译)	文学 1.60
文心雕龙注(刘勰)(范文澜注)	文学 2.40
茅盾评论文集(茅盾)	文学 1.95
论短篇小说创作(《人民文学》等编)	文学 0.54
美国文学简史(上)(董衡巽等编著)	文学 0.55
关于电影的特殊表现手段(张骏祥)	文学 0.36
杜甫诗选(文学小丛书)(黄肃秋选,虞行辑注)	文学 0.22
周恩来青年时代诗选	文学 0.28
天安门诗抄(童怀周编)	文学 0.83
革命诗抄(自动化研究所等编)	青年 0.80
倪焕之(叶圣陶)	文学 0.79
骆驼祥子(老舍)	文学 0.70
沙汀短篇小说选(沙汀)	文学 0.68
艾芜短篇小说选(艾芜)	文学 0.84
林家铺子(文学小丛书)(茅盾)	文学 0.28
海的梦(文学小丛书)(巴金)	文学 0.33
我的第一个上级(文学小丛书)(马烽)	文学 0.27
荷花淀(文学小丛书)(孙犁)	文学 0.13
黎明的河边(文学小丛书)(峻青)	文学 0.23
李有才板话(赵树理)	文学 0.23
基度山伯爵(共四册)(大仲马)(蒋学模译)	文学 4.00
契诃夫小说选(文学小丛书)(契诃夫)(汝龙译)	文学 0.32
法国短篇小说选(赵少侯主编)	青年 1.70
元人杂剧选(顾肇仓选注)	文学 1.75
柔蜜欧与幽丽叶(文学小丛书)(莎士比亚)(曹禺译)	文学 0.31
威廉·退尔(席勒)(钱春琦译)	文学 0.66
我的一家(陶承)	文学 0.24
松柏长青(吴南生)	文学 0.49
“我热爱中国”(洛伊斯·惠勒·斯诺)(董乐山译)	三联 0.47
明徐渭青天歌卷(艺苑掇英丛书)(苏州文管会编)	上海人美 2.00
中国现代书法选	河北人民 1.50

---

中国人名地名汉语拼音拼写法	文改 0.08
鲁迅著作中方言集释(倪大白编著)	辽宁人民 0.39
蒙文分类辞典	民族 1.25
汉英词典(北京外语学院英语系编写组编)	商务 7.60
英语新词词典(辽宁外专编写组编)	商务 2.10
英汉道路工程词汇(修订第二版)(赵祖康等编)	人民交通 7.30
西方宇宙理论译述(中国科技大学天体物理组编)	科学 0.95
* * *	
中国古代战争故事(张习孔)	中国少儿 0.32
永恒的纪念——周总理的文物(钟庆编)	中国少儿 0.22
陈毅在赣南(杨尚奎)	中国少儿 0.21
李四光的故事(杨世铎等)	中国少儿 0.48
外国文学家的故事(许加利)	中国少儿 0.30
新同学(叶君健)	文学 0.57
小溪流的歌(严文井)	文学 0.81
长长的流水(刘真)	文学 0.46
儿童文学丛刊(六)	中国少儿 0.35
优秀作文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	中国少儿 0.15
我们爱科学丛刊(一九七九年一)	中国少儿 0.20
开发富饶的海洋(朱志尧编)	中国少儿 0.29

---

《读书》编辑部编辑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1979年4月出版 定价0.37元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价○·  
七二九

**廖寥集** 沈钧儒著

沈钧儒先生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和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在以后的时期中，为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奋斗一生。周恩来总理曾说：“沈老是民主人士和左派的旗帜。”

《寥寥集》是沈钧儒先生的诗集，经重新编辑出版，增加了解放战争时期和全国解放以

## 经历 韬奋著

本书是我国杰出的新闻记者、政论家和出版家，民主战士邹韬奋同志的著作《经历》、《抗战以来》和《患难余生记》的合集，是韬奋用他的独特风格写的一生的自述。这些自传体的文章，充满了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对革命的无限忠诚。同时，韬奋也如实地、深刻地写出了他自己的思想斗争过程。（定价 1.25 元）

## 回忆孙中山和廖仲恺

何香凝著

廖仲恺先生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政治活动家，年青时代即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运动。他曾协同孙先生奔走上海、广东等地，拥护孙先生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以进行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革命斗争。何香凝先生在她的回忆文章中，详细叙述了孙中山、廖仲恺先生革命活动的事迹，真挚动人，是珍贵的历史资料。（定价 0.25 元）

## 百年心聲

中国民主革命诗话  
许涤新著（在排印中）

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一百零九年，中国人民为打倒外国侵略者和反动统治阶级，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在斗争中出现了无数动人心弦的诗篇。为了使后代的人们知道革命得来不容易，把一百年来，特别是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建立以来，革命领导者、战士们、烈士们以及诗人们从心里迸发出来的声音，约成诗话，称之为《百年心声》。

新华书店发行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 我的一家

陶承口述 赵洁整理  
何家栋 赵洁整理  
本书原由工人出版社出版，  
曾遭窃居中央文革小组领导职  
务的那个人诬蔑中伤，禁锢十  
多年。现修订再版。

## 保卫延安

本书描写毛主席所领导的保  
卫延安的战争。曾因书中写了彭  
德怀同志在指挥战斗中的形象，  
被停止发行。现由原作者稍作修  
订，增加了冯雪峰同志所写的代  
序。

上海的早晨  
三家巷  
小城春秋  
李有才板话

周而复  
欧阳山  
高云览  
赵树理

## 总工程师和他的女儿

这是一部反映工厂和工程技术人  
员生活、生活理想、爱情与家庭所  
展开的矛盾冲突，再现了绚丽  
多彩的工厂生活，展示了工程技术  
队伍的成长壮大，表现了知识  
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作  
用。

焦祖尧 一·一〇元

## 雾

## 雳

杨佩瑾

(即将出版)

一九二七年，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了震撼中国的秋收暴  
动。小说描绘了几个纸工和农民，在湘赣边一个小山区，掀开这  
历史事件的一角。

## 桥隆飙

曲波

(即将出版)

这部长篇小说以抗日战争初期的山东沿海地区为背景，塑造  
了一个带有草莽英雄色彩的农民起义首领的艺术形象，描绘了他  
从自发的革命斗争到接受党的领导这一曲折复杂的过程。

新华书店发行

文学小丛书

女神  
包身工  
谁是最可爱的人  
不能走那条路  
王贵与李香香  
离骚今译  
诗经选译  
聊斋志异选  
杜十娘  
海涅诗选  
羊脂球  
高尔基早期作品选

郭沫若	沫若	若	0.32元
夏衍	沫若	若	0.10元
魏巍	魏巍	谁是最可爱的人	0.30元
李季	李季	不能走那条路	0.30元
李季	李季	王贵与李香香	0.13元
郭沫若	郭沫若	离骚今译	0.15元
余冠英	余冠英	诗经选译	0.18元
蒲松龄	蒲松龄	聊斋志异选	0.19元
冯梦龙	冯梦龙	杜十娘	0.27元
冯至	冯至	海涅诗选	0.16元
(法)莫泊桑	(法)莫泊桑	羊脂球	0.24元
赵少侯	赵少侯	高尔基早期作品选	0.24元
都雷	都雷		0.18元
(法)巴尔扎克	(法)巴尔扎克		0.26元
傅雷	傅雷		0.26元
(挪威)易卜生	(挪威)易卜生		0.21元
潘梓年	潘梓年		0.21元
巴金	巴金		0.21元
伊信	伊信		0.21元
戈宝权	戈宝权		0.21元

定价 0.37 元